



图书馆特色信息快报

FACULTY-ORIENTED INFORMATION EXPRESS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主办

- ◆ 经贸动态
- ◆ 金融动态
- ◆ 商务英语动态
- ◆ 法学动态
- ◆ 高教动态

8 Vol.4

2008



图书馆特色信息快报

(2008 年第 8 期 • 总第 28 期)

顾问: 叶兴国 胡雪梅

主编: 罗玉英

副主编: 王群 谢丹迎

编辑: 田文夫 唐永辉

向玲 李岩 孔凡娟

责任编辑: 谢 蓉

制作: 艾 致

Email: library@shift.edu.cn

目 录

一、经贸动态

11 月权威视点.....	1
11 月热点透视.....	4
吴敬琏: 中国如何应对世界金融危机?	7
李佐军: 警惕“权贵市场经济”.....	7
张承惠: 认识与妥善应对海外投资风险.....	9
过度出口造成空洞和气泡.....	11
外贸进出口指标 8 年来首次同时负增长.....	12
前 11 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26.8%.....	1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分析.....	14
国际反倾销的趋势分析.....	17

二、金融动态

马丁·沃尔夫: 中国的金融困局.....	20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若干意见.....	24
中国是全球金融危机一个例外吗.....	27
重商主义的局限.....	28
中国要安度金融海啸, 不能靠摸着石头过河.....	30
人民币汇率该升还是该降?	31
高盛开“油价赌场” 中国企业付高昂学费	32
中国远洋押注运费失误酿成巨亏.....	34
马多夫欺诈案 更多投资者承认被坑	34
沈联涛: 世界金融秩序的三种可能	34
体制之殇注定中投勇气丧失	35

三、商务英语动态

Business English: An Individualised Learning Programme —an Effective but Defective ESP Program	37
Non-native and Native Speaker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a Team-teaching Approach: Case of the JET Programme	42

四、法学动态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答记者问.....	57
国际经济法正面临挑战和机遇.....	61
论我国保险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64
两岸直航面临的若干法律问题思考.....	66
决议延期能解决索马里问题吗.....	68
每位法律人都应该有点哲学品味.....	69

五、高教动态

教育部传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部署明年教育工作.....	73
李卫红: 立足创新 提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	74
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将规范学术博客.....	74
高校目标管理的主要特征及实施策略.....	75
上海理工大学校长许晓鸣访谈: 百年老校的创新追求.....	82
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中国成长报告·教育篇.....	84
深圳市多所大学设置高校计划特聘教授岗位.....	88
两年来上海高校社团数量增长 37%.....	89
世界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发展背景、模式和趋势.....	90

S I F T |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经贸动态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2008 年 12 月

第 8 期[总第二十八期]

本期要目

- 11 月权威视点、热点透视
- 吴敬琏：中国如何应对世界金融危机？
- 李佐军：警惕“权贵市场经济”
- 张承惠：认识与妥善应对海外投资风险
- 过度出口造成空洞和气泡
- 外贸进出口指标 8 年来首次同时负增长
- 前 11 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26.8%
-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分析
- 国际反倾销的趋势分析

11 月 权威 视点

林毅夫：4 万亿投资足够中国经济维持高增长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11 月 11 日表示，中国最近推出的规模创纪录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足以确保中国经济实现 8%至 9%的较快增长，这也是中国在当前的特定时期对世界经济作出的最大贡献。

对于中国，林毅夫表示，中国最新出台的 4 万亿元财政刺激方案，有助于确保中国经济维持 8%至 9%的较快增速。他进一步指出，如同温家宝总理所言，中国通过采取积极措施确保自身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这已经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

林毅夫分析说，要保持这样的快速增长，中国无疑要进口大量的自然资源，这相当于间接给那些资源出口国提供了经济刺激；与此同时，维持经济增长还需要进口中间产品、资本商品，这也会给其他中高收入国家带来市场机会。

林毅夫表示，4 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已经足够了”，这已经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计划。暂时不需要推出更多稳定经济措施，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规划和落实好这些投资。

在全球面临衰退风险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是应对的一种手段，但也不能忽视财政政策。他表示，实施适当的财政扩张，对于实现经济增长的长期目标非常有益，比如在基础设施、环境等方面的投入。

点评：世行把对发展中国家 2009 年的增长预测调低到 4.5%，而此前的预测为 6.4%，原因是金融风暴、出口放缓、商品价格趋弱三重因素相结合的结果。新兴市场经济的持续恶化，香港可见一斑，继新西兰和新加坡之后，香港已经成为亚太区第 3 个陷入技术性衰退的新兴经济体。

反观中国，经济形势比 1998 年要更加严峻。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10 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消费和投资增长同时放缓，出口增速下滑，内需放缓以及产能过剩导致工业增加值大幅下降，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CPI 继续回落，工业生产萎缩导致 PPI 大幅放缓至 6.6%；投资意愿下降和存款定期化加剧，致使 M1 与 M2 剪刀差进一步扩大。同时，许多个“第一次”令经济界人士意识到，经济下滑形势远比 10 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更为严峻。比如，10 月发电量出现 10 年来首次负增长；主要重工业产品(如钢铁等)产量创历史最大跌幅；70 大中城市房价环比创历史最大跌幅；外商直接投资(FDI)出现今年来首次负增长；财政收入出现 1996 年以来首次负增长，等等。工业增加值跳水至 7 年以来最低，跌幅最大的多为占整体工业利润超过 70%的重工业产品，企业利润面临实实在在的“硬着陆”。

而在 10 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公布前，我国政府出台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宣布推出 4 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次明确，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并要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增值税转型改革则是十项措施中十分引人注目的一项，此项改革将为企业减轻负担 1200 亿元。对此，国内外各界均认为很有必要，也是意料之中。在通胀尚处高位时，就应尽早准备财政扩张，从而提高投资的质量，以避免需要经济明显下滑之际临时寻找投资项目的仓促性，防止重复建设的风险。十项措施的出台对于恢复和提振市场信心起到了关键作用。多数业内人士认为，在财政刺激拉动下，中国经济 2009 年“保八”有望。

宋国青：金融危机或改善贸易条件

如同硬币的两面，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影响中国的出口需求的同时，由于全球对原材料、能源等商品的需求减少，导致大部分大宗商品的价格急剧下跌，反而改善了中国的贸易条件。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称，2003～2007 年的国际经济景气和国内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进口指数的大幅度上升和贸易条件的迅速恶化。由于中国外汇资产大幅度增加，进口价格迅速上升隐含着巨大损失。

宋国青表示，从 2002 年 1 月份算到 2008 年 6 月份的 6 年半时间，进口价格指数上升 64%，平均每年上升 8.6%，这意味着中国的外汇储备在每年都在不断的贬值。因为价格涨了，钱不值钱了，这个道理跟通货膨胀率上升银行存款贬值一模一样，钱不是放在家里看的，最后要通过买货来实现价值。

而今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恶化反而引起贸易条件的改善或相对改善以及进口价格的下降。国内进口的原油价格从 9 月份开始下降 10%，这意味着中国的外汇储备在增值，宋国青认为，今年进口价格指数很有可能跌 20%，这意味着 2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增值了 4000 亿美元。

宋国青认为，从中短期看，对中国出口的需求与中国贸易条件的反向变化，出口越不好贸易条件越好。如果内需能够较快恢复，目前的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中国有利。

点评：全球金融危机虽然还远远没有结束，但是危机的高潮或者已经过去，中国应抓住危机带来的贸易条件改善的机会促进经济增长。

国际市场继续恶化，消费出现负增长，这是多年来没有过的。预计明年美国、英国经济是负增长，法国、德国都是零增长。

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企业来说是危机也是机遇。企业要危中寻机，积极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附加值，在产品结构上求新求变，不断升级，才是渡过危机之道。一方面，企业要看准政策机会转内销，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到海外投资建厂。在尽量维持传统市场份额的基础上，积极开拓国际潜在市场。外贸企业可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巴西、印度、东盟等新兴市场，弥补对欧美市场出口减少的部分。

同时，在政策层面，政府还应该努力为企业创造好的经营环境，及时提供国内外市场信息，并加强政府采购。应该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出口退税的速度需加快，在目前汇率变动频繁的时期，可适当规避企业风险。



姚景源：四大指标显示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

由于遭遇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正“面临严峻的困难和挑战”。尽管持有上述观点，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同时明确表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仍保持健康，再加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密集出台，各界应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坚定信心。





目前,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经济的最大影响表现在出口明显下滑。从数字上来看,1-9月份,全国出口虽然仍在增长,但是增幅同比回落了4.8个百分点。出口增速的回落直接导致工业增加值增速出现回落,进而导致GDP增速及财政收入回落。

该如何应对这种困难和挑战?姚景源指出,“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坚定信心”,而信心应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把握和判断;对国家整体宏观调控政策的认识。

在他看来,衡量一国经济是否健康要看四大指标,而目前中国经济的四大指标表现都算良好。

在增长速度方面,今年1-3季度,中国GDP增速是9.9%,尽管比去年同期回落2.3个百分点,但相比欧美国家等世界主要经济体,9.9%的增速依然表现亮眼。

就业率方面,今年初确定的新增就业岗位1000万的目标到9月底已经完成了94%。

通货膨胀率在去年达到10年新高后,已经连续6个月回落。

最后,国际收支平衡方面也开始转好。2006年、2007年中国都出现大额顺差,从而导致流动性过剩等重要问题,而今年前9个月贸易顺差同比已减少47亿美元,下降46%。

基于以上理由,姚景源得出结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未能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何况中国还有工业化和城市化两个最强有力的支撑经济发展的因素。

李扬:保经济增长仍需依靠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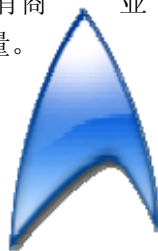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11月25日在申银万国“2009投资中国战略年会”上表示,从2008年下半年到目前,经济下行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遏制经济下滑成为当务之急,但历史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短期内难以依赖外需和国内消费,保经济增长仍需依靠投资。

李扬表示,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下行,目前经济的下行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但由于物价上涨趋势已得到遏制,中国消费端供大于求的情况也决定了PPI高企也不会向CPI有效传导,因此相对应对通胀压力来说,阻遏经济下滑才是当务之急。

从1980年到2007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难以依赖外需和国内消费。他认为,消费增长依赖国民收入增长和国民收入分配的调整,短时间内无法出现本质性改善,而扩大内需、提升消费的效果,也难以主动控制,而只能被动接受。

因此,保持中国经济增长仍需依靠投资。李扬进一步表示,启动投资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决策层应当考虑放开准入管制,允许各类资本进入传统由政府垄断的领域;投资项目也必须有商业可持续性,目前大量投资都投放在基础设施领域,相关部门应对其商业可持续性给予一定考量。

在谈到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时,李扬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过度负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无限延长的“负债-资产”链条。因此,我国应该借鉴这一教训,把握刺激市场的“度”,在市场下泻时,容易见效的措施是为企业、居民提供借款的便利,如果救市措施过度,可能会埋下今后出现过度负债的种子。李扬表示。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008到2012年经济呈现W型调整





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可能延续2008年下半年的态势,出现下滑,但在货币政策放松的作用下,通货紧缩的局面不会出现。2008年到2012年间,宏观经济或出现“W型”周期调整模式,2009年下半年和2011年出现GDP增长的双底。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6日在北京举办的“宏观经济论坛(2008-2009)”上提出了上述观点。

据人大经济学院预测,我国2008年全年GDP增长达到9.6%,同比回落2.3个百分点,名义投资增长速度达26.2%,全社会消费增速达21.6%,进出口增速分别为21.0%和25.5%,贸易顺差2650亿美元,M1和M2分别增长11.1%和16.0%。

同时,2009年宏观经济增速延续下滑态势,全年GDP增速预计为8.42%,固定投资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双双下滑,幅度分别达到7.5和1.5个百分点;同时进出口增速同步回落,名义增速回落幅度分别达到5.9和6.1个百分点。

“受经济下滑影响,2009年价格将出现持续下滑,但在货币政策全面放松的作用下,通货紧缩的局面不会出现。”报告预计。

针对决策层出台的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该报告认为该计划具有坚实的短期基础,具有及时性和必要性,短期内将有效缓和宏观经济总量的深度下滑,但其规模和投资增进型的政策特性可能在中长期无法改变经济下滑的趋势。

由此,报告提出,中国宏观经济将可能在2008到2012年间出现“W型”周期调整模式——于2009年下半年见底反弹,2010年宏观经济出现轻度复苏,随后再度探底,复苏期限可能延长。

对于2009年的宏观经济表现,报告认为,“保8”将成为宏观调控的核心目标之一,同时房地产行业可能出现全面调整,“价格调整”取代“成交量调整”成为明年地产市场的主旋律,“预计2009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将下降10到20个百分点,不排除0增长的可能。”

人民大学七大建议谏言宏观经济政策

第一,在4万亿方案基础上,安排非投资性政府支出计划,出台未来5到10年一揽子社会福利。

第二,加大国债发行力度,将未来6年的财政赤字率扩展到2.5%到3.83%之间。

第三,做一揽子推行各种税费减免计划,尽可能出台消费推动型减税政策。

第四,合理选择保障性住房投资的出台时点,避免出现对商品房投资产生过度挤出的效应。

第五,鼓励地方政府出台促进内需型结构调整政策,鼓励民间资本进入。

第六,货币政策应当根据宏观经济形势进行进一步降息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第七,出口退税不宜大规模回调,人民币汇率也不宜进行反向调整。

来源: 国研网

10月贸易顺差创新高

海关总署11月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10月我国出口总值1283.27亿美元,同比增长19.2%;进口总值930.88亿美元,同比增长15.6%;贸易顺差352.39亿美元,比9月增加58.69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11月
热点
透视





数据显示,10月我国进口和出口绝对值较9月份均有不同程度下降,进口总值下降141.12亿美元,出口总值下降80.73亿美元;进口同比增速下降5.7个百分点,出口同比增速下降2.3个百分点。进口下降幅度大于出口。

数据显示,1至10月我国进出口总值21886.69亿美元,同比增长24.4%。其中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1.9%,进口总值同比增长27.6%。1至9月,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967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2%。其中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2.3%,进口总值同比增长29%。

顺差创新高最主要的原因是进口商品价格下降,9月份因为进口商品价格大幅回落导致贸易顺差大增43亿美元,而10月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

国际经济不景气抑制了对生产资料的需求,9月份原油、铁矿石等进口原料价格大幅下降,导致进口价格指数跌幅超过10%。

点评:虽然从进出口数据来看,中国贸易顺差同比增长仍创新高,但数据有滞后性。新订单减少会在今后几个月的数据中体现出来,出口增速将继续下滑。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刺激下外需超预期下降,将进一步施压出口板块。

现在欧美等国实体经济刚刚步入负增长,其对消费动力的传导还有一个过程,如果影响完全显现,对外需的削弱将不可小觑。

对外需不能寄予太大希望,要充分启动内需来保增长。预期政府接下来一段时间会全力保增长,还将出台更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和降息措施。

10月工业增加值增幅创近七年最低

国家统计局11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低于市场预期的10.8%和9月份的11.4%,并创下了自2001年底以来的最低水平。

三季度以来,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持续回落。6月份的增速还保持在16%,7月份回落至14.7%,8月份为12.8%,9月份为11.4%,10月份比9月份又回落3.2个百分点。

统计表明,1至10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4%,比上年同期回落4.1个百分点。

统计局数据显示,10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比上年同期回落9.7个百分点。而历史数据显示,1-9月份国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2,9月份增长11.4%,这说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呈持续下滑趋势。

点评:由于工业生产是工业企业利润的最终来源,通过工业增加值数据可以初步判断,10月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速也将明显放缓。实际上,如果考虑到PPI大幅下滑,与PPIRM(原材料价格指数)之间的差距拉大,企业利润增速会更糟。

在经过国际和国内需求端冲击之后,需求进一步下滑已经成为市场一致预期。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应对未来的需求下滑,企业在10月份拼命削减存货,减少产量。大力减少存货的行为,也是导致了工业增加值增速创下新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在于市场信心。要使国内工业增加值增速回稳,首先应该重建投资者信心,而政府刚出台的4万亿投资计划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国务院公布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后,预计工业生产的低





迷状态将有所改善。4亿计划将形成大量需求，四季度的1000亿支出计划将改善11月和12月的需求，尤其是存货压力较大的投资品的需求将得到改善。因此，在消化掉存货之后，企业的生产会逐渐恢复。

10月财政收入近年首次负增长

财政部11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全国财政收入5328.95亿元，比去年同月下降0.3%。其中，中央财政收入2776.38亿元，同比下降8.4%。

据悉，10月份的全國财政收入增幅已经是连续第五个月下滑，并出现了近年来的首次同比负增长。

财政部人士表示，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政策性减税较多和经济增长放缓、企业效益下降影响税收增长。

数据还显示，10月，全国财政支出4143.17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582.92亿元，增长16.4%。

数据显示，1-10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54275.8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2.6%；同期，全国财政支出40571.31亿元，增长24.5%。这意味着，前10个月，全国财政盈余达到了13704.5亿元。

点评：在当前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的背景下，以减税和增支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势必进一步加大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虽然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变大，但是积极财政政策还有较大的操作空间。

2009年我国登记失业率或有增长



明年登记失业率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增长。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表示，虽然明年登记失业率可能有增长，但是对明年保持就业的继续增长，控制失业还是有把握、有信心的。

前10个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1020万人，为全年目标任务1000万人的102%。其中，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450万人，为全年目标任务500万人的90%；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29万人，为全年目标任务100人的129%。截至三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

从总体上来讲，目前的就业局势还是稳定的。但是进入10月份以来，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对我国的就业局势也产生了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在进一步发展。

据悉，我国今年底把城镇登记失业率完成控制在4.5%的目标没有问题。明年登记失业率可能增长。

点评：如果说今年我国经济运行受“金融海啸”影响不大的话，那么在未来一年多的时间内，这种影响将会更加明显，而就业形势也会变得越来越严峻。国际劳工组织近日表示，全球金融危机有可能使世界失业人口增加2000万。根据该组织的评估，到2009年年底，失业人口将从2007年的1.9亿人增加到2.1亿人，这是全球失业人口历史上第一次突破2.1亿人口，也是10年来全球失业人数首次突破2亿人。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已经无法独善其身。依靠经济增长拉动就业增长，创造更多新的就业岗位面临更大难度。出口放缓使中国沿海外向型企业提前进入寒冬——中国沿海一批出口加工型企业倒闭，导致大批工人被裁，或被迫无限期休假。与此同时，应届毕业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益突出。据统计，2008年的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将创历史新高——达到559万人，比2007年增加64万人，而明年将会突破600万人。如何保持就业的稳定，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来源：国研网





吴敬琏：中国如何应对世界金融危机？

12月16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教授出席北大深圳论坛，就“中国如何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发表主题演讲。

金融海啸不仅是华尔街问题

“金融海啸早期被认为是华尔街金融海啸，虽然危机的爆发和触发的因素来自美国，但这不仅是美国金融体系危机，而是世界金融体系出了问题。”

吴敬琏在演讲开场便表示，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碰到的困难全部是外生的，这种判断是很值得讨论的，中国的经济体系已经融入了全球体系。世界经济体系存在的问题在我国早有反映，根本的问题在于经济增长模式。即粗放的增长方式通过出口导向的政策，带来好处的同时存在很大问题。

“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导致增长所需要的投资率将越来越高，造成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吴敬琏表示，改革开放以后，用投资拉动增长这种方式并没有改变，但是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高增长，这也是用出口的需求来弥补的内需不足。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储蓄率低、消费率高的情况正好互补，这种互补的结果一方面维持了这个体系的运行，另一方面使我们承受了许多金融泡沫。

要发展现代服务业

吴敬琏说，由于经济增长模式的不科学，当前又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面临着出现经济衰退的危险。为了规避这种风险，中国经济必须转型到依靠创新、依靠技术进步的现代经济增长道路上来。吴敬琏举了个生动的例子，他用台湾宏基集团前董事长施振荣的“微笑曲线”解说增长模式的现代转变。制造业企业要向价值链的上下游延伸，20世纪80年代以来，“微笑曲线”的两端，即“研发、材料、采购、设计”与“品牌、渠道、物流、金融”的价值就越突出，就像向上的“嘴角”，而“加工、组装、制造”则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所以沿海地区要发展具有高知识含量的现代服务业。

吴敬琏进一步表示，发展服务业并不是越尖端越好，只要有市场需求即可。中国要应付危机，就要寻找新的市场和新的增长点。“芬兰的诺基亚原来只是一家小企业，但是由于在GSM标准兴起的同时，抓住机遇赶上这班车。我们也要有这样的眼光，现在的ICT产业里正面临革命，大有机会。”

谈到经济危机中深圳如何带动产业升级，促进进一步发展。吴敬琏特别提到了深圳有一个很好的条件，即身边的“香港”。他说，香港市场经济环境和法制系统相当好，深圳和整个珠江三角洲要把和香港的合作关系变得更紧密。

作者：易少龄 来源：深圳新闻网 2008年12月17日

李佐军：警惕“权贵市场经济”





吴敬琏在新书《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中告诫，中国改革仍然面临两种前途：一种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种是“权贵资本主义”道路。这种告诫是必要而及时的，因为中国确实还存在着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

不过，本文拟用“权贵市场经济”来替代“权贵资本主义”，原因是“权贵市场经济”与“法治市场经济”（或“人本市场经济”或“民本市场经济”）具有对称性。

简言之，“权贵市场经济”是指由权贵控制和主导的市场经济。“权贵市场经济”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拥有一个无处不在、极为强势的政府；二是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控制在少数权贵和“寡头”手中，贫富差距极大；三是“权力市场化”（或“权力搅买卖”或“权力扭曲市场”）、“腐败寻租”、垄断特权等比较普遍。当然，“权贵市场经济”也同时存在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存在大量分散的决策者，存在市场价格机制，经济主体拥有一些自主权等。

在改革前期，面对计划经济的诸多弊端和问题，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市场经济肯定比计划经济好，只要将计划经济改革为市场经济就万事大吉了。殊不知，市场经济还有各种表现形态，市场经济也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之分。改革也有可能改出“坏的市场经济”来。“权贵市场经济”就是“坏的市场经济”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也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当今世界，虽然大部分国家都选择了市场经济道路，但其中多数国家并没有顺利实现现代化。在各种各样的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部分国家（如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权贵市场经济”或“坏的市场经济”的泥坑。

“权贵市场经济”之所以难以实现现代化，其原因有：一是权贵们享有各种特权，缺乏尽力创造社会财富和不断追求创新的积极性，他们人数虽少，但控制了经济的主要方面，由此大大降低了整个社会创造财富和创新的速度；二是权贵的特权和经济垄断必然破坏公平竞争规则和平等交易市场秩序，必然损害社会大多数公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此大大降低了经济发展的动力；三是权贵的特权常常是以损害他人产权、减少他人选择自由为条件的，产权的损害和自由的减少都从制度层面上阻碍了经济发展和现代化。

从中国的改革实践来看，虽然总的来看，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目前尚不能断言已陷入“权贵市场经济”的泥坑，但确实已呈现出“权贵市场经济”的许多特征：

一是中国政府目前是一个典型的权力大、责任不对称的“强势政府”。各级政府控制着国家三分之一左右的财富，控制着土地、矿产等重要资源，拥有强势的政府财政，但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明显偏低。也就是说，官僚机构及其官员强势控制着国家的许多重要财富和资源。





二是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控制在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很大。目前，中国的财富分配已呈典型的“倒二八”现象，即80%以上的财富被控制在20%以内的少数人手中。仅统计上反映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达到3.4倍以上，基尼系数早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而且，在近年来的股市和房市“财富效应”中，“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还在发挥着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的作用。

三是“权力市场化”和“腐败寻租”等问题还比较严重。如有的政府部门通过各种下属企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介入市场交易；有的政府部门通过各种审批环节“设租”，大量收取各种费用；许多地方政府“趋利化”问题严重，通过买卖土地、招商引资等途径深度介入商业经营，获取土地交易和股权交易的巨额收入，开辟“第二财政”；一些基层政府政企不分，村长或乡长甚至县长或市长兼董事长，直接从事商业经营；还有许多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以各种方式谋取个人私利等。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很长时间以来，我们过分强调“经济体制改革优先”，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也严重滞后，没有形成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约；过分强调“效率优先”，过分偏重保护投资者和管理者的权益，没有同等重视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致使贫富差距快速拉大；虽然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但没有很好地落到实处，“权大于法”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也严重滞后，没有为弱势群体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总之，改革并不总是充满阳光，并非所有的改革都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在中国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的新时期，我们要认真总结改革三十年的经验，精心设计未来的改革方略，避免出现“权贵市场经济”。

作者：国李佐军 来源：《中国改革报》2008年12月3日第5版

张承惠：正确认识与妥善应对海外投资风险

在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我国的部分企业和机构在海外投资中蒙受一些损失。虽然损失有限、可控，但仍难免使人们对海外投资产生畏惧心理。

事实上，“投资必有风险”是一个基本常识。海外投资由于法律、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差异极大，风险当然更大。但这次金融危机也让我们看到了自身的不足：一是国有企业投资决策机制环节多、链条长，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二是一些中资机构尚不能准确把握投资方向，特别是对国际金融

市场变化敏感度不高，缺乏应变准备；三是投资风险管理能力不足，优秀国际化人才欠缺；四是公司治理不力，部分企业的高管对某些海外交易甚至一无所知；五是宏观调控部门的信息服务职能发挥不充分，对海外投资企业提供的支持不够。

针对上述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海外投资活动，采取有效措施，防患于未然。

首先，“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无论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还是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





竞争力,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四的今天,中国全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国际经济结构和经济秩序重塑是大势所趋。在“走出去”的初期阶段,由于经验和准备不足,加上国际金融经济的交易规则早已由发达国家所制定,遇到困难、遭受挫折在所难免。对此,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其次,要深入总结分析以往海外投资的经验教训,及时调整策略,提升风险管理水平。我国海外投资活动大体有三种类型,政府对之应实施有差别的投资和监管政策。

第一大类是具有主权基金性质的海外投资,包括外汇储备资产运用、中国投资公司、某些政府控制的公司或基金。由于这类资产关系全体国民的利益,安全性、稳定性和长期效益是资产管理的要点。对于这类投资的风险控制,一是要重点进行战略性投资,不宜以提高收益率为目标在市场上去追逐短期利润,因而不应以短期的盈亏作为成败标准,而要从国家战略出发来判断投资价值。二是具体投资运作,宜采用多种方式进行,特别需要探讨以委托商业机构运作的方式,以更有效率地实现投资目标。三是要充分利用当前我国的有利谈判地位,置换我国外汇储备中的风险较大资产,改善我国海外资产的结构。

第二大类是金融机构的海外投资。我国工商企业在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金融服务并没有跟上。这里有我国金融机构自身的原因,也有进入国际金融市场障碍重重的因素。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海外的大门被开大了,过去的政治歧视等障碍可能会有所减少,同时外国资产价格大跌也为我国入资外国金融机构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

仅仅因为外国金融机构股权已经很“便宜”而去盲目“抄底”是有风险的。问题的核心在于中资金融机构是否有能力把握机遇、创造价值。如果没有清晰的战略理念,没有对市场的准确把握,没有真正的人才,没有足够的控制和承担风险的能力,再低成本的收购也是得不偿失的。

第三大类是工商企业的海外投资。这类企业起步较早,又多以实业投资为主,其风险特征与金融商品投资有很大不同,投资失败的影响范围也相对较小。因此,政府管理应侧重于对企业海外投资的引导和保护,帮助其防范单凭企业一己之力难以防范的风险,进一步改善企业的投资环境。为此,要在加快推进我国企业境外投资风险管理立法工作,建立和完善宏观战略管理协调机制的基础上,建立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三个层面的海外风险控制机制。在政府层面,要对境外投资的国有企业实施全面的评价和考核,同时有关部门应联合建立境外投资风险预警机制,实时监控境外投资风险。在行业协会层面,要积极加强与投资对象国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沟通,规范企业投资行为,同时要强化对企业的信息辅导和咨询服务,帮助企业对海外投资项目进行风险评测。在企业层面,要强化对投资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准确定位企业未来发展目标,针对不同投资对象国的特点,在股权、债权、服务合同等投资方式中进行合理选择或组合。此外,内部风险控制机制的建设当然也是企业必做的文章。

总之,尽管有风险,我们还是要“走出去”,因为只有经历风雨的洗礼,我们才能在国际市场中站稳脚跟;尽管前面的道路仍然艰难坎坷,但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中国人民是不乏勇气 and 智慧的。

作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张承惠

来源: 《求是》2008年第22期





过度出口造成空洞和气泡



旧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在崩溃，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什么时候建立起来？在2009 财经年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就此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要提出的是金融危机之源。金融危机是一个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但是其源头在 1976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形成一个新的世界货币体系，这个体系的特点，是不受约束的美元作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在布雷顿体系中，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在新的布雷顿体系中，美元与黄金脱钩了，所以是一个不受约束的世界货币。

美国的内部有一个储蓄率过低的问题，美国靠美元的地位向全世界借债，就是信用扩张，就是发行各种衍生工具，用这样的美元货币用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向世界借债，维持美国高效率的运转。这样，不仅在美国的货币体系中，就连世界的货币体系中都充满了空洞和气泡，虚拟财富突然蒸发，一个国家从流动性的过剩短期就变成了流动性的短缺，这就是危机之源。

第二，为什么这样的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产生这么大的冲击呢？因为我们自己的金融体系存在巨大的缺陷。就是过度的储蓄，过度的投资。由于过度投资造成的金融体系的缺陷。

长期以来我们用一套鼓励出口的政策来维持大规模的出口，来支持我们的经济成长，在九十年代是很成功的。但是这种出口导向的政策，在多年以后，出现外汇存量的大量增加，这样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形成互补的政策。

第三，因此现在也提出要建立新的货币体系。但是我不认为，我们很快就能在短期内建立一个不是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

如果要改变将来的状况，至少要做到美元的发行是受到监管的。最大的问题是，如果要做到这一点，美国人要改变他的生活方式，就是高储备。需要建立新的货币体系，但是能否在短期内形成共识并使货币发行受到监管的体系呢？我比较悲观。

第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自求多福，就是要改变现在的增长模式。通过改革推动我们 GDP 发展方式的转变。

作者：胡潇滢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08 年 12 月 15 日





外贸进出口指标 8 年来首次同时负增长

在贸易顺差屡创新高的光环下，外贸进出口各项指标却首次同时出现负增长。

国家发改委 16 日发布的 11 月外贸形势分析报告指出，11 月份，进出口、出口、进口增速均为负值。数据显示，11 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 1898.9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同)下降 9%。其中出口 1149.9 亿美元，下降 2.2%；进口 749 亿美元，下降 17.9%。

这是自 2000 年以来进出口各项指标首次同时出现负增长。发改委提醒，这是当前外贸运行中急需关注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8 月份以来，我国单月贸易顺差屡创历史新高。11 月份贸易顺差更是突破 4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52.3%，高于 10 月份增幅 22.5 个百分点。1-11 月，外贸顺差累计 255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6.8%，高于 1-10 月增幅 5.5 个百分点。

报告提出，11 月份进出口值得关注的问题还有，纺织原料、纸及纸板、钢坯及粗锻件等一些资源类产品进口减少。

报告指出，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对欧美市场影响更深，加上近来人民币对欧元大幅升值，9 月份以来，我国对欧盟、美国月出口额持续下降。11 月份，我对欧盟出口 240 亿美元，分别比 9、10 月份减少 33.7 亿美元和 22.2 亿美元；对美国出口 203.6 亿美元，分别比 9、10 月份减少 43.3 亿美元和 32.9 亿美元。

报告预计，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逐步加深，世界经济增长继续放缓，美欧日等先进经济体的需求进一步减弱。

11 月出口产品结构喜忧参半

国家发改委 16 日发布的 11 月外贸形势分析报告指出，11 月份钢材、钢坯、未锻轧铝、焦炭等“两高一资”产品出口量继续下降，而机电产品出口保持稳定增长。专家表示，机电产品、高科技产品出口有较大上升空间。

“两高一资”产品出口量下降

报告指出，8 月份以来，钢材、钢坯等“两高一资”产品出口量逐月下降。11 月份，钢材出口 295 万吨，比 10 月份出口减少 167 万吨，环比下降 36.1%；钢坯及粗锻件出口 3 万吨，比 10 月份出口减少 8 万吨，环比下降 72.7%；未锻轧铝出口 3 万吨，比 10 月份出口减少 1.8 万吨，环比下降 37.5%；焦炭及半焦炭出口 32 万吨，比 10 月份出口减少 19 万吨，下降 39.6%。





值得注意的是,服装、玩具、塑料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放缓。1-11月,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同比增长3.1%,比上年同期回落19.1个百分点,玩具出口增长2.5%,回落17.8个百分点,家具及其零件、塑料制品出口增速分别回落6.6和3.5个百分点。

西南证券宏观高级分析师董先安表示,这些情况的出现,主要是贸易伙伴陷入衰退,经济收缩导致对我国需求下降,造成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放缓。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是沿海经济拉动我国就业的重要支柱,劳动密集型产业萎缩对就业的伤害超过其他类型工业。

机电产品出口存增长机遇

在出口总体增速为负情况下,机电产品出口仍然难得地保持了平稳增长。1-11月,机电产品进出口12618.5亿美元,增长16.2%。其中出口7613.2亿美元,增长20%。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7046.3亿美元,增长12.1%。其中出口3856.7亿美元,增长16.2%。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指出,像服装、玩具这种传统产品,世界市场总体容量下降必然意味着中国出口的下降,因为中国的出口已经占了世界市场的80%-90%。但是对技术含量较高的机电产品,我们生产和出口的规模占世界市场份额不高,即使世界总体规模下降,我们的数量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可以实现增长。

此外,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速明显高于加工贸易。1-11月,一般贸易进出口11456.9亿美元,增长31.1%。其中出口6087.1亿美元,增长24.7%;进口5369.8亿美元,增长39.2%,加工贸易进出口9812.8亿美元,增长9.8%。其中出口6265.6亿美元,增长11.9%。一般贸易出口增速高于加工贸易12.8个百分点。

作者:吴婷 来源:上海证券报 2008年12月17日

前11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26.8%

国家统计局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11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27614亿元,同比增长26.8%,增速比今年前10个月回落0.4个百分点,但与去年同期持平。其中,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77539亿元,同比增长5.4%,增幅比前10个月扩大2.2个百分点。

有关专家认为,投资增速较前10个月小幅回落0.4个百分点,原因可能在于,尽管中央加大了新增投资力度,但投资推出实施有一定时滞,同时经济下行周期企业家信心不足,以及增值税全面转型将于明年1月1日实施,部分投资推迟到明年进行。专家称,预计未来几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有所提高。

1-11月,国有及国有控股完成投资53365亿元,增长21.6%;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26546亿元,增长22.7%,增速比前10个月放缓1.9个百分点。





截至11月底,城镇50万元以上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288467亿元,同比增长19.7%;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77539亿元,同比增长5.4%。

从行业看,煤炭开采及洗选业投资1957亿元,同比增长34.8%;电力、热力的生产与供应业投资7858亿元,增长15.7%;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投资2219亿元,增长34.8%;铁路运输业投资2571亿元,增长41.1%;非金属矿采选、制品业投资4011亿元,增长46.9%;黑色金属矿采选、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3472亿元,增长31.9%;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2189亿元,增长41.6%。

从到位资金情况看,城镇投资到位资金136152亿元,同比增长21.2%。其中,国内贷款增长11.7%,利用外资增长5.2%,自筹资金增长32.6%。

作者:韩晓东 来源:《中国证券报》2008年12月17日

国内 运行 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分析

内容摘要:近年来,尤其是中国的“走出去”战略提出来以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取得了快速增长,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仅为29亿美元,到2006年就高达211.6亿美元,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一种替代手段,能在多大程度上替代我国出口,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否形成新的外贸增长点,带动我国出口贸易的可持续性发展,这些问题与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息息相关,对于制定协调的投资与贸易政策十分重要。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出国效益, 企业发展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FDI)在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发展中有着重要地位。同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尤其是在政府提出“走出去”方针之后,中国对外国的直接投资也有很大的增长。截至2006年,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906.3亿美亿。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211.6亿美元。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的2.72%和0.85%。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母国的地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共分布在全球149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国家和地区的71%,其中亚洲、欧洲地区投资覆盖率分别达到91%和80%。亚洲地区存量占总量的70%以上,主要分布在我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韩国、泰国、越南、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其中我国香港地区304亿美元,占总存量的68%;随后依次为拉丁美洲、北美洲、欧洲、非洲和大洋洲,分别占存量的18.5%、2.4%、1.7%、2%和1.1%。

从行业分布看,以投资控股为主的商业服务业为164亿美元,占存量的33.3%;批发和零售业占17.5%;采矿业占13.3%,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交通运输、仓储业占10.2%,主要是水上运输业;制造业占10%,主要分布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等;信息传输业、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占2.6%,主要是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的投资;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占2.4%,主要为其他服务业的投资;农林牧渔业占1.9%,主要是对农业的投资;建筑业占1.8%。





从动机看,企业投资国外主要由以下因素驱动:(1)获取信息。主要是为了获取与贸易相关的信息,利于国内企业产品出口。典型的方式是各大国有进出口公司在国外设立的办事机构或分公司,收集国外的市场信息,并通过询盘和订单的形式传回国内。(2)拓展市场。很多商品的国内市场渐趋饱和,企业为寻求进一步的生存和发展,开始关注国际市场,以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走向国际化。(3)规避贸易壁垒。中国庞大的出口额和快速的增长趋势,引起了很多国家的恐惧。反倾销的压力使得中国企业不得不走出国门而进行直接投资。(4)获取资源。20世纪90年代以前,这种投资多由政府主导,体现了政府的意志和战略。而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某些行业和企业的实力逐渐壮大,加之全球化竞争和生存意识的增强,获得资源开始逐渐被纳入到企业的战略和发展规划当中。(5)获取和积蓄企业未来发展的资源和能力。最高层次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获取先进技术和专有知识、现代营销和管理技术,即获取企业未来发展的资源和竞争力。这也是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企业的发展和成熟而产生的。这样一批企业代表着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环境中发展的未来趋势,这些企业的数量和优劣,决定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乃至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以及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

由国际经济理论可知,FDI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相当大。国际上对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研究一直都既着眼于母国的效益,也关注东道国的利益。在中国,由于内外向直接投资发展不平衡,大量研究把中国仅仅定位于FDI的东道国进行分析,割裂开中国作为投资对象国与母国的地位。这样的研究不全面,也缺乏说服力。本文从中国作为投资母国的角度出发,探讨我国对外投资的出口效应。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

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无论是从行业还是地域上来看都分布得很广泛。从农业、服务业、到制造业、开采业等各个行业都有对外直接投资,投资的区域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根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结合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相互作用路径,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效应。

1. 出口的替代效应。由于市场的消费容量总是一定的,因此,当我国的企业将某种产品的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进行当地生产的时候,就会不可避免地替代国内同种产品的出口。具体来看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主要是通过以下四个途径产生:

(1)国内企业的分支机构在东道国建立的生产基地所生产的产品除在当地销售外,还向该东道国周边国家出口。当国外分支机构的生产和销售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势必对母公司的出口产生替代效应,进而导致我国出口总额的减少。例如,首钢在秘鲁的铁矿公司建立了面向世界三大洲的销售网络,矿产品销往美国、日本、韩国、墨西哥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销售93%,秘鲁本地销售仅占7%。

(2)由于东道国的原产地规定,或者企业以“双赢”为目的,建立与东道国之间的良好关系,我国的许多加工组装行业在国外的分支机构都会选择在东道国当地进行采购。这样一来,国外分支机构在东道国当地的采购势必会对我国该行业中间产品的出口产生替代效应。例如海尔在尼日利亚的生产基地,一年在当地采购的物资就高达数千万元。与此同时,随着海外投资的发展,东道国的市场也逐渐成熟起来,为了更多地降低生产成本,企业此时更趋向于采用当地采购战略,因此,对母公司的中间投入品和技术与服务的需求也逐渐减少。

(3)我国的大部分企业在开展跨国经营时都是采取渐进的方式,往往是贸易先行,随着贸易的发展,企业逐渐到国外去建立发展平台,最后在国外建立生产加工基地。贸易先行的经营策略实际上是为海外投资建厂奠定坚实的市场基础,没有出口带来的经济效益与品牌效应,企业的海外投资就会进入风险难测的境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国外建立的工厂恰恰替代了原来同一产品的出口。





(4)从长远来看,我国企业将某产品的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后,东道国当地企业通过技术扩散和模仿,也开始生产该产品,替代进口或进行出口,这也会导致我国该种产品的出口减少。

2. 出口的促进效应。从上面可以看到如果光从单一产品的角度看,对外直接投资会替代原产品的出口。而我国企业却通过以下三种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本企业国内产品的出口。

(1)构筑国际营销网络。企业通过在世界其他地区设立贸易服务机构,构筑国际市场营销服务网络,打造自身品牌,与生产加工企业形成销售对接,产生显著联动效应。万向集团先后在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等8个国家设立了26家境外公司,并对他们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建立起海外生产基地、海外研发中心和涵盖50个国家与地区的万向国际市场营销服务网络,有力地带动了国内同类产品出口的大幅增长,出口额从1984年的20万美元增加到了2003年的3.8亿美元。

(2)跨国并购投资。在一个企业的产品知名度还有待认可和销售渠道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收购国外的品牌成为进入新市场的一个捷径。通过海外并购国外知名品牌和资源,借助品牌背后的营销渠道和消费群体,可以快速切入市场,规避风险。通过对并购资源的重新整合之后,促进企业产品的出口。

(3)服务贸易型投资。这类投资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扩大出口服务,投资形式主要包括批发零售投资、在东道国设立办事处以及售后服务点等贸易型企业与办事机构。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来看,这类投资所占比重比较大。

3. 出口的创造效应。制造业、自然资源行业和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都会产生出口创造效应,即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会促使我国的原材料、中间产品、机器设备、总部服务等出口的增加,这主要表现在我国出口贸易中中间产品出口份额的增大和企业内贸易的增多,这些增加的出口份额或者由母公司的其他部门提供,或者由我国其他企业提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以下途径产生了出口创造效应:

(1)海外子公司的初期投产建设。企业在海外建立子公司时,为满足子公司开办的需要,一般要购买母国或者母公司的资本设备和原材料。另外,我国企业在向一些生产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投资时,使用我国淘汰的一些设备和生产线,这些设备虽然在我国已被淘汰,但是在东道国仍然是合适的,这样既利用了闲置设备,又促进了机器设备的出口。

(2)加工装配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由于一些加工装配型海外投资企业供求关系链比较长,在投产初期,甚至在以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对国内半成品,零部件、技术支持等方面的依赖性较强,对我国出口客观上形成了持续性的带动作用。机械行业如汽车、拖拉机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行业的组装,轻工行业的摩托车、自行车组装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因此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这些行业对我国出口产生了长期的持续带动作用。有关分析表明,对出口的带动作用最强的是家电,中方每投入1美元,每年可带动6.5美元,其他依次是服装厂3.8美元,机械3美元,医药1.8美元,纺织0.5228美元。

4. 提升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这一效应主要涉及我国企业的技术寻求型跨国投资。我国的一些高科技企业通过建立海外研发中心,利用海外研发资源,使研发国际化取得具有国际水准的自主知识产权。这些企业取得的创新成果的主要应用场所之一就是母公司的生产活动。同时通过溢出效应,国内其他企业也从中受益。因而,技术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力地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科技水平,并使出口产品结构得到持续改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全球建立了8个地区总部和32个分支机构,在美国硅谷和达拉斯、印度班加罗尔、瑞典斯德哥尔摩、俄罗斯莫斯科等地建立了多家海外研发中心,并通过各种激励政策吸引国内外优秀科技人才进行研发,及时掌握业界动态。由于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核心技术,华为在世界电信市场已经能够与跨国公司同比较量。

另外,通过收购国外现有企业、获取先进技术也是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科技含量的一条重要途径。





5. 推动出口结构转换。以对外直接投资支持贸易是一种有效地进入国际市场的平段。当今国际贸易变得越来越敏锐,越来越复杂,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据重要份额,因此贸易战越来越频繁,形式也多种多样,企业依靠原来方式迅速扩大出口比较困难。我国要实现出口的可持续性发展必须实现出口由低成本向高质量的转换、由低技术产品向高科技产品的转换,即最终要实现出口结构的转换。对外直接投资对于转换我国的出口结构主要发挥两方面作用:第一,对外投资拉动中间产品、资本品和服务的出口,引起我国出口结构由最终产品向以上产品转换;第二,对外投资通过把国外获取的先进技术应用于国内生产,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引起出口产品中高科技产品比例提高。

三、基本结论

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FDI对出口的带动作用也在日益显现,这种带动作用不仅表现在FDI对于出口规模的扩大上,更重要地表现在FDI对于带动出口产品科技含量的提升和改善出口商品的结构上,也就是FDI对于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十分重要的。目前我国的出口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如贸易摩擦剧烈、出口产品科技含量不高、贸易利益分成不合理等问题。依靠对外直接投资来规避贸易摩擦在日本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依靠对外直接投资来提高国内生产的科技含量也在我国一些企业的对外投资实践中得到验证。而目前我国出口贸易面临的利益分成不合理问题主要是由于销售渠道掌握在外商手中造成的,因此通过本土企业主动“走出去”,构建自己掌控的国际营销网络,则可以将贸易利益更多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以对外直接投资来带动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成为目前可以选择的路径,为此政府应该制定企业对外投资的产业地区指导目录,并且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金融、保险等方面的公共服务,鼓励企业走出去。企业应该树立全球竞争意识,正确处理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在传统优势产业方面,在综合考虑成本因素、进入壁垒因素以及东道国市场因素的基础上,可以实行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部分替代,同时在东道国仍然保留部分的出口比例,在条件成熟时,可以采用兼并收购方式快速切入东道国市场。

作者: 陈敏 余涛 来源:《经济师》2008年第11期

国际反倾销的趋势分析

作者: 田玉红 来源:《理论前沿》2008年第20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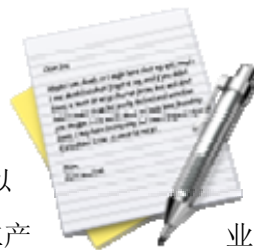
内容摘要: 从国际反倾销对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反倾销对产业安全存在不同效应以及矛盾。因此,不同国家应基于不同的产业情况进行辩证、全面和细致的分析,建立产业安全与反倾销政策的良性互动机制。

关键词: 反倾销, 产业安全, 贸易救济

反倾销作为国际重要贸易救济政策与保护产业安全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但是,客观情况却非常复杂,能否真正起到维护产业安全的作用还要细致分析。中国作为国际反倾销的“重灾区”,更需要深入分析当今国际反倾销的趋势及其对产业安全的影响,以期切实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

一、国际反倾销的实施背景与实践使产业安全保障的初衷受到普遍质疑

许多学者将GDP作为衡量经济景气状况的一个指标,Prusa(2003)则进一步指出进口国GDP每减少一个标准单位。反倾销数量增长23%,而出口国GDP增长与反倾销数量的关系则不明朗。还有一些国外学者





研究认为进口国政府采取反倾销措施并不是基于所谓的经济原因,而是经济问题、政治力量与国内企业寻求保护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也使反倾销法对产业安全保障的初衷受到质疑。

实践中。反倾销与世界经济的发展也是紧密相连的。全球反倾销发案比例与世界经济增长呈现出反向变动趋势,当世界经济状况良好,经济增长较快时,全球反倾销案件数量呈下降趋势;当世界经济遇到危机或政治军事问题时,全球反倾销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而且总体上呈现出交替升降的反向波动关系。这说明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抵制国家经济衰退或产业状况恶化的作用。何况根据世界银行有关数据表明,反倾销税远远高于一般关税水平。全球平均关税水平在5%左右,反倾销的终裁倾销幅度在43%到64%不等,是一般关税水平的10倍之多。如此高的保护程度自然引来众多适用者。因此,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政策在实践中被大量地用来增加对国内产业保护的力度,从而增加国家对世界经济波动及国内经济波动的宏观调控作用。

二、国际反倾销以衰退产业产品为主体

国际反倾销的涉案产品主要集中在贱金属及其制品、化工产品、机电产品、塑料制品、纺织品等5个部类,这5个部类的案件数之和占全部案件的比重在3/4左右。其中,2002-2005年全世界反倾销立案最大的产业类型是化工产业,占40%左右,钢铁五金类占25%左右,其次是纺织业。这些产业类型的产品在许多国家都是以大规模生产为特点,以大批量供应为表现。正是在规模经济的刺激之下,产品的大量供给使市场需求日趋饱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所涉及的产业大多表现为产品的需求条件恶化、产业利润率降低、生产能力过剩、价格战频繁等特征,而这些特征正是衰退产业的表现(有时形象地成为“夕阳产业”)。因此表现为价格竞争的倾销这一贸易竞争手段遭遇到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政策的抵制。所以,从国际反倾销来看,涉及的产品领域以衰退产业产品为主体。这不仅抑制了国际产业进步。而且使衰退产业对资源的利用挤占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的产业的国际资源份额,使国际贸易政策与国际产业政策之间的协调出现矛盾。

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业集中度的逆向变动趋势导致国际反倾销实施情况出现重大差异

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总体上是衰退产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按照产业集中度与产业发展阶段的变动趋势分析发现。发达国家国内衰退产业的产业集中度表现出较高的特征。而发展中国家虽然承接来自发达国家衰退产业转移,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却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因此产业集中度较低。产业集中度的高低差异的影响反映在反倾销的实施中主要集中于两点:第一,产业集中度较低导致较为激烈的贸易竞争。产业集中度在发展中国家较低后果就是发展中国家内部企业竞争加剧,竞争恶化的后果就是产品价格战。而进一步的后果就是企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和争夺导致倾销与反倾销行为的增多。这一趋势与国际反倾销实施的趋势是相一致的。第二,产业集中度的高低反应在贸易救济政策发起的成功率差异。从法律上,反倾销申诉有严格的申诉资格要求,无论是WTO还是各成员法律都有明确规定。如果产业集中度低或者说被控产品的生产企业数量众多,那么在无有力的协调机构的情况下,申诉不仅是一件难以达到





法律上的申诉资格要求,而且,由于生产企业分散且利益平均都不高,对保护利益的追求和诉讼费用的不成比例的顾虑,都会造成申诉不积极,增大申诉成本并降低申诉的成功率。虽然发达国家衰退产业出现国际转移的发展趋势,但是国内的衰退产业对产业利益或国内政府对政治利益的追求都会促使其追求国际贸易利益。产业集中度较高本身意味着同类产品的生产企业较少或者占国内同类产品生产量较大比重,使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政策的申诉几率和申诉成功的几率都随之增加。这也就是发达国家衰退产业仍然成为推动国家采取大量贸易救济政策的原因之一,也是发展中国家在应诉反倾销案件中胜诉率不高的原因之一。

四、国际反倾销与其他贸易救济政策协同使用

从总体上而言。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三种类型的贸易救济政策在产业分布上有着大体一致的倾向性,仍然以原材料行业为主。更重要的是,三种类型的贸易救济政策的这种产业分布上的趋向性说明,WTO成员对于这些产业所采取的贸易救济政策之间有着一定的逻辑联系。即三种贸易救济政策之间有一定的因果联系。反倾销主要针对以倾销进行恶性价格竞争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保障措施虽然不是直接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但是在一定期限内进口数量的激增给进口方造成的压力和损害,在WTO框架下也是可以获得保障措施救济的。可以说,保障措施是针对数量增长型的贸易行为。一般情况下,价格上的强大优势是会带来需求数量上的大幅增长的。所以。反倾销与保障措施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西方现在很多观点认为。部分国家在价格和数量上的优势主要是由于政府补贴和扶持造成的,例如从WTO成立到2004年底,WTO各成员发起的176件反补贴案件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和加拿大,占反补贴立案总数的72,7%。近两年外国对华反补贴争端问题上与反倾销也出现越来越协同使用的趋势。例如,加拿大在2004年11月19日作出针对中国烧烤架反补贴终裁,2005年7月11日又作出针对中国该产品的特殊保障措施的立案调查。美国甚至针对中国铜版纸产品在2006年年底同时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双重调查。这都说明国际贸易救济政策越来越表现出协同一致的趋势,尤其是发达国家通过多重贸易救济政策对产业进行保障,以抵消发展中国家通过补贴政策培养的国内产品在价格和数量上的国际竞争优势。

五、结论与对策

国际反倾销越来越成为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基于产业安全的考虑而对衰退产业实施的贸易保护。而且越来越趋于主动并增强协调性。这说明国际反倾销与产业安全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中国在国际反倾销泛滥的强大压力下。在缓解贸易摩擦压力、减少产业损失的同时,要积极考虑增强产业竞争优势和改善国际经济贸易关系。国际反倾销对产业安全的影响固然重要。但是影响的具体情况具有复杂性,因此对于国际反倾销和国内对外反倾销要辩证和全面的予以分析。不仅考虑到产业分布的问题,而且还要考虑到反倾销对产业安全影响的不同效应以及不同效应之间的矛盾问题,而不是一味地依赖实施反倾销来维护产业安全。要考虑不同产业的具体特征,从产业入手,建立更加全面的公共利益权衡机制,使应对国际反倾销和实施对外反倾销都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产业安全,并促进产业发展。这需要中国在产业安全和贸易救济政策各自领域深入反思,建立产业安全与贸易救济政策的良性互动机制。壮大自身的产业实力,增强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上解决争端的能力。使中国真正成为国际贸易强国。



*SIFT**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金融动态

JIN RONG DONG TAI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2008 年 12 月

第 8 期 [总第二十八期]

- 马丁·沃尔夫：中国的金融困局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若干意见
- 中国是全球金融危机一个例外吗
- 重商主义的局限：全球失衡和中国国际经济关系中即将面临的危机
- 中国要安度金融海啸,不能靠摸着石头过河
- 人民币汇率该升还是该降?
- 高盛开“油价赌场” 中国企业付高昂学费
- 中国远洋押注运费失误酿成巨亏
- 马多夫欺诈案 更多投资者承认被坑
- 《<<<<<<, 更多

金融形势

马丁·沃尔夫：中国的金融困局

FT 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专访 FT 首席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

(FT 中文网 2008 年度论坛在北京举行。马丁·沃尔夫是 FT 中文网首届年度讲座的演讲嘉宾)

FT 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专访 FT 首席经济评论家。沃尔夫的观点是，中国面临着一个在自身相对贫穷时就成为超级大国的问题。面对当下的金融危机，中国所处的境地很糟糕，因为国内需求和外部需求都在减弱。中国错过了应对巨额贸易盈余与让人民币升值的最佳时机。

张力奋(以下简称张)：上次，你提到，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世界将面对一个更为强硬的美国。但从另一角度看，比如最近 G20 峰会透出的迹象表明，你是否认为，全球经济决策的框架可能正开始出现某种形式的权力转移？至少美国已经有这个思想准备。美国和西方从务实与利益考虑，希望中国为击退全球经济衰退发挥更大作用。而来自北京的迹象则显示，中国政府本身对目前局势很担忧，他们想知道中国的经济与贸易到底会受多大影响，得先把“家务事”理顺。

马丁·沃尔夫(以下简称“马”)：我认为中国正面临一个大问题。首先，经济增长的放缓幅度将远远超出中国人的预期。世界银行(World Bank)发布的最新预测为 7.5%——下调的幅度是很大的，而且我预计这个下滑势头将会持续。我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经济体，其净出口会降为负值，因此其经济增长的放缓幅度会非常大。他们必须在国内采取刺激措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涉及的是意识形态与智慧。中国现在

必须对形势做出自己判断，而不是照搬别人的意见。可以说，共和国建国之后最初 30 年，他们遵循的是苏联模式，然后的近 30 年某种程度上是模仿了美国模式，现在，他们必须拿出中国自己的模式。但重要的一点是，这种中国模式不能是市场经济的终结。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在某些方面比其它模式更有效，这些优势事实上并未改变。中国经济在过去近 30 年的增长是实实在在的，是在成功的市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如果中国政府决定抛弃市场经济，我会感到很吃惊。不过，在金融业、金融自由化以及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等领域，人们显然需要对市场经济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中国必须暂时作壁上观。

目前来说，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美国怎样才能成功摆脱这场危机？在他们摆脱危机后，我们能否从他们的努力中汲取教训？显然，这场危机的结果越糟糕，中国就越是希望重新思考自己的对策。我的观点是：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借助自己的力量。他们必须观察人们从这场危机中汲取的教训，而我估计，我们会再度认识到，发展经济没有什么最终模式。人生中的每件事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从自己所犯错误中汲取教训。中国人也是如此。

张：中国改革开放期的最高领导人在吸纳西方经济思想上可以说是相当诚恳、勤于借鉴且包容，





在经济主张上相当去意识形态化。在经济思想上最急切学习借鉴西方的大概非中国领导人莫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多是中南海尊贵的宾客。碰到金融困局,中国觉得西方过去 100 多年的经验足以帮助中国找到对策。而这次金融危机显然使中国领导人对西方金融体系的信心大受冲击,没有料想到这个久经考验的全球体系居然如此脆弱,不堪一击。他们失去了参照点。但是,中国又别无选择,只能与西方既定的金融体系共存。

马:我始终认为,中国在融入全球体系方面存在巨大问题。根本理由有三。中国面临的困难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大,因为它非常庞大,同时经济还相当不发达。中国仍是世界上较贫穷的国家,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大概排在全球第 100 位。因此,按人均标准衡量,有 99 个国家比它富裕,在所有国家中处于中间水平。不过,它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之一——按照衡量标准的不同,位居第二或第三。

因此,中国面临着一个在国家还相对贫穷的时候就成为超级大国的问题。如果进展顺利,印度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这意味着,中国以及印度的未来几代人所承担的责任将远远超出与自己发展水平相同国家的水平。这种结果是由其规模造成的,中国必须接受这一现实。由于中国在全球所占据的份额和影响力远超其发展水平——仅仅因为其规模如此庞大——世界会不可避免地要求中国有所作为和承担责任。这是数字的绝对力量。当然,它也有好处,意味着中国可对世界产生更大影响,可以比其它国家更多地主导这个世界。这是第一个问题。

中国面临的第二个明显难题是,它正在融入的全球体系是西方创建的,这个全球体系是西式的,而非中式的。它不是中国自己发展创造的世界体系,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的历史、规范和价值观相抵触。因此,这个超级大国既要适应自身,又要适应一个并非自己所创的体系,这种境地是尴尬的。中国不可能将现存的全球体系转化为自身可能创造的体系,这是一个现实。相当重要的原因是,我认为中国并不知道自己会创建一个怎样的体系。我对中国历史的解读是:由于其独特的历史、相对封闭,及其政治文化立场,中国以前从来不必考虑创建一个全球体系。在近代之前,中国很少与他国平等交往,而只与附属国打交道。因此,中国在融入全球体系

上面面临一个根本问题,这不是它自创的体系,融入其中对中国来说是一次全新体验。

中国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对西方人来说,中国当下的政治体制很有意思,是遵循西式经济体系的共产党执政以及与中国特色的少见组合,这也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适应问题。因此,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挑战绝对是巨大的。但中国要继续假装自己还是个影响力上的小国是不可能的。无论中国喜欢与否,它现在就是一个强国,而且它的力量还会比现在变得大得多,它必须决定如何行使这种力量。

张:现在我们转谈人民币问题。中国央行最近发出了尽可能明确的信号:针对眼下的全球经济衰退,中国不排除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我们知道,在华盛顿压力下,人民币自今年年初来加快了升值步伐。中国可能觉得,现在是就人民币问题与美国重新博弈、调整立场的时候?你觉得,中国当下是否应该让人民币贬值,以支持其日益疲软的出口,而出口对中国的增长是至关重要的?(编者注:在本访谈进行之后几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始出现小幅贬值趋势,基本证实市场的判断。)

马:我看不到人民币有任何贬值的理由。我认为它应该升值。毫无疑问,它应该升值。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过于庞大。我认为,北京方面三、四年前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多年来,我一直主张,中国应该削减经常账户盈余,增加国内开支,允许人民币升值。

中国目前所处的境地很糟糕,因为国内需求和外部需求都在减弱,人民币仍将面临升值压力。始终存在的一个危险是,当中国最终被迫采取行动时,他们已经处于危急境地。我认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持续下去。扩大内需的压力也将持续下去——我的意思不仅是要借此抵消衰退的影响,而且要大力刺激相对于潜在产出的需求。

中国目前可能处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不利境地:出口不断萎缩,或者说出口增长正在萎缩,国内需求也在萎缩。不过我再重申一次,虽然中国对此没有言明,但是那种认为可以通过出口来摆脱经济困境的想法,完全是异想天开。

中国无法这样做的原因是,如果衰退持续下去,在全球找不到可以出口的地方,任何地方都没有需求。我们所处的是一场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因此,那种通过调整汇率轨迹、中国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通过出口来摆脱经济困局的想法,可谓大错特错。

张:或许中国确实错过了增强内需、大幅降低经常帐户盈余的最佳时机,也就是前 4-5 年全球经济高增长的良性期。但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与正在进入的经济衰退,北京觉得让人民币略有贬值能对其出口施以援手,至少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你不认为,这个想法有其现实合理性,应当予以同情?

马:我认为,在发达世界正陷于深度衰退、其中部分国家处于萧条边缘的情况下,如果拥有全球最大经常帐户盈余的中国还试图通过出口来摆脱困境,那会被视为一种带有强烈敌意的行为。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我认为,让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也就是使美元毫无必要地、危险地走强,无疑就属于此类行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新一届美国政府会对此类行为做出非常强硬的回应。

我完全理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但现实情况是,只有在世界其它国家经济高涨、需求高涨的情况下,中国才能通过出口来摆脱自身困境。我认为人们并不理解这一点。

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一直依赖于美国、英国和其它一些经济体极为庞大的需求和超额产出。这些经济体的产出约占全球产出的 35%。有信誉且有意愿的私人借款人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只剩下政府借款人了。因此,如果中国奉行上述政策,那么美国的财政赤字必将更为庞大,这对美国来说是无法承受的,这种政策最终会让美国破产。

中国既然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就应该花这笔钱,应该加大国内支出。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明白,中国过去七、八年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现在明显已无法维系。

张:眼下中国的经济决策者可能处于既想有所作为,但又不很清楚到底什么是最优选择?对中国来说,存在这样一种对内对外利益双赢的挽救策略吗?

马:许多人一直通过内部和外部渠道向北京建议,中国在五年前就应该开始让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来说,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是建立更为健康的国内消费市场。由于家庭收入低,中国消费市场非常薄弱,他们需要对经济展开结构性调整。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应该在五年前就开始,而在当前经济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展开经济结构调整,时机上可谓非常不利。

未来一两年,中国可能不得不依赖净出口的继续快速增长,但这种情况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除了立即采取投资刺激方案,中国现在真应该痛下决心,仔细考虑如何刺激产生新的国内需求。

这样做,原因之一是,当前的外汇储备政策浪费很大。中国有近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我自己算了一下,这些储备的实际年回报率可能是-8%,是负的,即接近 2000 亿美元。如果在一个穷国,每个穷人都可以分到一大笔钱。把这笔钱花在中国国内,远比以这种方式浪费或者借给无力使用的美国人更为明智。因此,中国的外汇储备应该停止增长,最好是降下来。中国应该花掉这部分收入,实现更为均衡的增长。中国不能像韩国这样的小国过去所做的那样,通过出口来摆脱困境。那么做是错误的。

张:中国中央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达 5800 亿美元。我们尚不清楚其中的重要细节,到底那些是旧钱,那些是新款。但是,官方的意图很明确,优先考虑的是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我想,几乎没有人会反对中国大幅加大支出,为中国人建立一个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但不少人对北京当下进一步承诺大规模基建投资感到不很理解?中国的投资率已经很高。

马:从长远看,中国的基础设施显然应该进一步改善,它与发达世界的基础设施相比还存在差距。因此,基础设施投资是有理由的,但长期来看还存在一个均衡问题。我很赞同你的观点,中国的投资率确已处于全球历史上最高水平。显而易见的是,大量此类投资的边际回报率非常低。我不清楚此类投资的具体构成,也许其中一些投资非常不错,但总体来看,任何关注中国发展的人都会得出结论:中国投资太高,储蓄太多。它应该减少投资,追求更高的回报率,应该增加消费。

对中国这样的国家,一个更正常的均衡状态应当是这样:目前,中国投资占 GDP 的比重为 50%,储蓄为 60%。因此,它的经常帐户盈余约为 GDP 的 10%,而消费占 GDP 比重大致为 40%。对一个国家来说,更合理的均衡状态应为:投资占 GDP 比重的 40%,储蓄占 GDP 比重为 40%,消费占 GDP 比重为 60%。也就是说,消费应当在经济没有任何增长的情况下增长 50%。家庭储蓄可能略有降低,但总体经济增长可能不会降低,而是与目前相同,经常帐户也不会积累下毫无用处的巨额储备。





消费水准提升 50%，数额绝对是巨大的，它可以用来给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内陆地区最贫困、从经济开发项目中受益最少的人民——带来巨大好处。这在我看来是个双赢局面。中国将处于更均衡的发展状态，投资降低，经济增长方式更均衡，普通中国人也更富裕。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失衡得到缓和，更容易在全球推行均衡的经济增长模式。这就实现了双赢。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应该以此为目标。

张：中国刚超越日本，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实际上也成了美国最大的债权人。你觉得，在与美国人的谈判桌上，北京会如何利用这个筹码？它是个筹码或秘密武器吗？

马：我从不认为这会造成很大影响。中国当然可以威胁全盘抛售这些国债，那会很可怕，但也非常有敌意。如果中国对美国说“嗯，我们实在不喜欢你们，我们要全盘抛售你们国债”，那么如果美国回应说“这是一种敌对行为，我们要没收这些国债”，我也不会感到惊讶。美国人绝对可以没收它们。美国只需要说：“这是一种敌对行为，我们与中国现在处于战争状态，我们要没收它们。”我不是说美国就会如此行事。我只是以婉转的方式表示，那不是一件可以轻易使用的武器。

当然，中国是个非常大的债权国，而美国又需要债主，因此在执行各种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通胀等政策时，美国不得不考虑债权国的利益。事实上，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曾将此形容为相互制衡(Balance of Mutual Distrust)。这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不能轻易使用这种武器或威胁。美国人可以威胁欠债不还和没收这些国债，中国人也可以威胁抛售它们。如果中国人抛售，他们就会因资产价值下跌而变得更穷。如果美国人没收国债，就没人再为他们的财政赤字提供资金。这就是相互制衡。

我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同样适用于债权人和债务人，利益只在合作关系中存在。如果关系破裂，双方都会蒙受损失。因此，我不认为持有巨额美国国债会给予中国很大的影响力。当然，基于上面谈到的理由，我也不认为持有美国国债是处理中国人民财富的正确方式。

张：显然，继续囤积美国国债对中国财政上没有实质意义，也不可思议。但是，为何中国手中的

美国国债还在不断增加？问题是没有选择吧？

马：我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中国拥有巨额结构性经常账户盈余，是因为他们没有采取相应政策。其次，如果你积攒下这么一大笔钱，会不知道该放在什么地方。如果你开始买进股票，你就会变得很不受欢迎。如果中国政府提出收购，比如说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这实际上很有意思，但它在政治上非常敏感。现在买股票或许更为明智，他们可以买一批股票，但实际上他们也可能打理得很糟糕。我认为，如果你以这种速度和规模积累财富，那就很难避免将它投到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债券市场中，因为除此而外实际上没有其它的大型流动性市场。这就是中国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必须停止积累外汇储备。中国的储备现在已经足够了。

张：我们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政治评论家最近有句评论，这场金融危机“让原本不可思议的变成了不可避免的”。你有没有什么最恰当的例子来描述你的感触？

马：你引用的是菲利普·斯蒂芬斯(Philip Stephens)的妙谈。几乎每件业已发生的、在过去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现在都变成了不可避免。其中包括对发达世界整个金融体系的国有化。激进的贸易保护主义也成为可能，我希望这不会成为现实。政府购买股票也是一种可能性。我可能已失去了对事情的想象力……

我认为，在经济领域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中国做出决定说，既然巨额经常账户盈余不可避免，那么让个人持有盈余要比政府合理得多，于是就放开资本外流，而不是由政府持有全部储备。如果看到这条消息，我会感到很吃惊。这是不可思议的，但同时是件好事。如果真的得以实施。将是非常明智的。

张：谢谢，马丁。(完)

(编辑注：本访谈于 2008 年 11 月 26 日在伦敦 FT 总部进行。这一文本系根据此次长谈的英文录音编辑整理、补充而成。译者/汪洋，校译/贺斌)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络版，2008-12-15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若干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认真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国务院批准，提出如下意见：

一、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

（一）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足，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创造适度宽松的货币信贷环境，以高于 GDP 增长与物价上涨之和约 3 至 4 个百分点的增长幅度作为 2009 年货币供应总量目标，争取全年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 17% 左右。密切监测流动性总量及分布变化，适当调减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停发 3 年期央行票据，降低 1 年期和 3 个月期央行票据发行频率。根据国内外形势适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操作。

（二）追加政策性银行 2008 年度贷款规模 1000 亿元，鼓励商业银行发放中央投资项目配套贷款，力争 2008 年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 4 万亿元以上。

（三）发挥市场在利率决定中的作用，提高经济自我调节能力。增强贷款利率下浮弹性，改进贴现利率形成机制，完善中央银行利率体系。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二、加强和改进信贷服务，满足合理资金需求

（四）加强货币政策、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原则，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产业发展。加大对民生工程、“三农”、重大工程建设、灾后重建、节能减排、科技创新、技术改造和兼并重组、区域协调发展的信贷支持。积极发展面向农户的小额信贷业务，增加扶贫贴息贷款投放规模。探索发展大学毕业生小额创业贷款业务。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同时，适当控制对一般加工业的贷款，限制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

（五）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对基本面比较好、信用记录较好、有竞争力、有市场、有订单但暂时出现经营或财务困难的企业给予信贷支持。全面清理银行信贷政策、法规、办法和指引，根据当前特殊时期需要，对《贷款通则》等有关规定和要求做适当调整。

（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落实对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贴息等扶持政策，鼓励地方人民政府通过资本注入、风险补偿等多种方式增加对信用担保公司的支持。设立包括中央、地方财政出资和企业联合组建在内的多层次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提高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贷款比重。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

（七）鼓励金融机构开展出口信贷业务。将进出口银行的人民币出口卖方信贷优惠利率适用范围，扩大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出口产品。允许金融机构开办人民币出口买方信贷业务。发挥出口信用保险在支持金融机构开展出口融资业务中的积极作用。

（八）加大对产业转移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金融机构创新发展针对产业转移的信贷产品和审贷模式，探索多种抵押担保方式。鼓励金融机构优先发放人民币贷款，支持国内过剩产能向境外转移。

（九）加大对农村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引导更多信贷资金投向农村。坚持农业银行为农服务方向，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支农领域，扩大邮政储蓄银行涉农业务范围，发挥农村信用社为农民服务的主力军作用。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建立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在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基础上，积极探索发展农村多种形式担保的信贷产品。指导农村金融机构开展林权质押贷款业务。

（十）落实和出台有关信贷政策措施，支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加大对城市低收入居民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的信贷支持。支持汽车消费信贷业务发展，拓宽汽车金融公司融资渠道。积极扩大农村消费信贷市场。





三、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十一) 采取有效措施, 稳定股票市场运行, 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完善中小企业板市场各项制度, 适时推出创业板, 逐步完善有机联系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开展兼并重组, 促进上市公司行业整合和产业升级, 减少审批环节, 提升市场效率, 不断提高上市公司竞争力。

(十二) 推动期货市场稳步发展, 探索农产品(000061,股吧)期货服务“三农”的运作模式, 尽快推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钢材、稻谷等商品期货新品种。

(十三) 扩大债券发行规模, 积极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优先安排与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等相关的债券发行。积极鼓励参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和可转换债券。稳步发展中小企业集合债券, 开展中小企业短期融资券试点。推进上市商业银行进入交易所债券市场试点。研究境外机构和企业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 允许在内地产有较多业务的香港企业或金融机构在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完善债券市场发行规则与监管标准。

四、发挥保险保障和融资功能, 促进经济社会稳定运行

(十四) 积极发展“三农”保险, 进一步扩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 鼓励保险公司开发农业和农村小额保险及产品质量保险。稳步发展与住房、汽车消费等相关的保险。积极发展建工险、工程险等业务, 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提供风险保障。做好灾后重建保险服务, 支持灾区群众基本生活设施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恢复重建。研究开放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市场, 引入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竞争, 支持出口贸易。

(十五) 发挥保险公司机构投资者作用和保险资金投融资功能, 鼓励保险公司购买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和公司债, 引导保险公司以债权等方式投资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和农村基础设施项目。稳妥推进保险公司投资国有大型龙头企业股权, 特别是关系国家战略的能源、资源等产业的龙头企业股权。

(十六) 积极发展个人、团体养老等保险业务,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企业通过商业保险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障计划, 研究对养老保险投保人给予延迟纳税等税收优惠。推动健康保险发展, 支持相关保险机构投资医疗机构和养老实体。提高保险业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水平, 发展适合农民需求的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五、创新融资方式, 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十七) 允许商业银行对境内外企业发放并购贷款。研究完善企业并购税收政策, 积极推动企业兼并重组。

(十八) 开展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试点, 拓宽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发挥债券市场避险功能, 稳步推进债券市场交易工具和相关金融产品创新。开展项目收益债券试点。

(十九) 加强对社会资金的鼓励和引导。拓宽民间投资领域, 吸引更多社会资金参与政府鼓励项目, 特别是灾后基础设施重建项目。出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 完善工商登记、机构投资者投资、证券登记和税收等相关政策, 促进股权投资基金行业规范健康发展。按照中小企业促进法关于鼓励创业投资机构增加对中小企业投资的规定, 落实和完善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二十) 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支农主力军作用, 扩大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 扩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规范发展民间融资, 建立多层次信贷供给市场。

(二十一) 创新信用风险管理工具。在进一步规范发展信贷资产重组、转让市场的基础上, 允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试点发展以中小企业贷款、涉农贷款、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贷款等为标的资产的信用风险管理工具, 适度分散信贷风险。

六、改进外汇管理, 大力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

(二十二) 改进贸易收结汇与贸易活动真实性、一致性审核, 便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贸易融资。加快进出口核销制度改革, 简化手续, 实现贸易外汇管理向总量核查、非现场核查和主体监管转变。适当提高企业预收货款结汇比例, 将一般企业预收货款结汇比例从 10% 提高到 25%, 对单笔金额较小的出口预收货款不纳入结汇额度管理。调整企业延期付款年度发生额规模, 由原来不得超过企业上年度进口付汇额的 10% 提高为 25%。简化企业申请比





例结汇和临时额度的审批程序, 缩短审批时间。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中外资企业集团实行外汇资金集中管理,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支持香港人民币业务发展, 扩大人民币在周边贸易中的计价结算规模, 降低对外经济活动的汇率风险。

七、加快金融服务现代化建设, 全面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二十三) 进一步丰富支付工具体系, 提高支付清算效率, 加快资金周转速度。进一步增强现金供应的前瞻性, 科学组织发行基金调拨, 确保现金供应。配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扩大国库集中支付涉农、救灾补贴等财政补助资金范围, 实现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所需资金直达最终收款人, 确保各项财政支出资金及时安全拨付到位。优化进出口产品退税的国库业务流程, 提高退税资金到账速度。加快征信体系建设, 继续推动中小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进一步规范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信用评级, 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便利条件。

八、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 增强金融业促进经济发展能力

(二十四) 放宽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和涉农贷款的呆账核销条件。授权金融机构对符合一定条件的中小企业贷款和涉农贷款进行重组和减免。借款人发生财务困难、无力及时足额偿还贷款本息的, 在确保重组和减免后能如期偿还剩余债务的条件下, 允许金融机构对债务进行展期或延期、减免表外利息后, 进一步减免本金和表内利息。

(二十五) 简化税务部门审核金融机构呆账核销手续和程序, 加快审核进度, 提高审核效率, 促进金融机构及时化解不良资产, 防止信贷收缩。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税前全额拨备损失准备金。对农户小额贷款、农业担保和农业保险实施优惠政策, 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研究金融机构抵债资产处置税收政策。结合增值税转型完善融资租赁税收政策。

(二十六) 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 调动银行信贷资金支持经济增长。支持地方人民政府建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 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贷款按增量给予适度的风险补偿。鼓励金融机构建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的部门, 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引进

先进技术和产品更新换代等方面的外汇资金需求, 通过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利率进口信贷方式给予支持。

九、深化金融改革, 加强风险管理, 切实维护金融安全稳定

(二十七) 完善国际金融危机监测及应对工作机制。密切监测国际金融危机发展动态, 研究风险的可能传播途径, 及时对危机发展趋势和影响进行跟踪和评估。高度关注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状况、金融机构流动性及资产负债变化。必要时启动应对预案, 包括特别流动性支持、剥离不良资产、补充资本金、对银行负债业务进行担保等, 确保金融安全稳定运行。

(二十八) 完善金融监管体系。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 加强功能监管、审慎监管, 强化资本金约束和流动性管理, 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 努力防范各种金融风险。

(二十九) 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要继续深化各项改革, 完善公司治理, 强化基础管理、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 理顺落实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正确处理好金融促进经济发展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 在经济下行时避免盲目惜贷。切实提高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质量, 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

(三十) 支持和鼓励地方人民政府为改善金融服务创造良好条件。地方人民政府应在保护银行债权、防止逃废银行债务、处置抵贷资产、合法有序进行破产清算等方面营造有利环境。继续推进地方金融机构改革, 维护地方金融稳定, 推动地方信用体系建设, 培育诚实守信的社会信用文化, 促进地方金融生态环境改善。

国务院办公厅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八日

来源: 新华网, 008 年 12 月 13 日





专家观点

中国是全球金融危机一个例外吗

作者: 张军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与很多其他经济体一样,中国经济这些年来经历的都是信用创造、金融深化、资产价值膨胀和高杠杆化的问题,而今天又差不多先后经历着信用收缩和去杠杆化的阶段。固然我们的出口可能受到世界经济形势的不利影响,但中国经济今天出现的信用收缩或者去杠杆化本身就是全球金融危机的一部分。

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对中国经济到底有多大影响?这是半年来我们一直特别关注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真把注意力放在这一点上,那就意味着我们的经济本身没有问题,只需尽最大可能防止被全球的危机所伤害。问题是,这个说法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呢?我的看法是,与很多其他经济体一样,中国经济这些年来经历的都是信用创造、金融深化、资产价值膨胀和高杠杆化的问题,而今天又差不多先后经历着信用收缩和去杠杆化的阶段。固然我们的出口可能受到世界经济形势的不利影响,但我们与其他经济一样可能又都是全球金融危机的一部分。这也许是我们应该真正去关注的。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经济近年来的繁荣基本上是靠信用创造和金融资产价值不断被重估来实现和维持的,而建立在高杠杆化之上的繁荣当然是有商业周期的。

这些年来,尤其是 2002 年之后,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财富和金融资产的增长加快了。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更多的大众财富和金融资产,而财富和资产的增长支持着经济的繁荣。当然,现在贫富差距很大,农民生活还很贫困,城市还有很多低收入家庭和生活困难的人群,但确有越来越多的人和家庭比之前富裕了,中产阶级的数量和规模以超常的速度在增长:更多人拥有了不断改善的住房和房产,更多人圆了汽车梦,更多人成了资本市场的投资者。而这些年来银行营业网点出现的排队和拥挤现象是经济繁荣的另一个证据。至于经济繁荣下出现的收入和财富的分化现象,是另外一个需要专门讨论的问题。

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从哪里开始的?通常,人们会从生产率上去寻找经济繁荣的原因。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在改善中,最近 10 年来没有大起大落。也就是说,生产率尽管是在增长中,但并非超常增长。所以,难以找到可信的证据证明,

这些年来财富的扩张和经济的繁荣主要是因为生产率增长导致的。

有人会说,由于中国工资收入的增长慢于生产率的增长,因此,生产率的改善可能会使资本所得获得更快的增长,这会推动一部分人的财富扩张特别快。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这些年来,我们的确看到,总体上工资收入增长慢于生产率的增长,以至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显著下降。但是,很多研究发现,这个现象只在出口行业更显著些,因为出口行业的竞争非常激烈,而且长期以来是以劳动密集的生产方式特征的。因此,即使出口附加值比较低,但是资本的收入还是快于工资收入的增长,这是中国出口行业得以维持的主要原因。可是,必须注意到,不仅这些年来中国的非贸易品部门的工资收入增长往往快于生产率的提升速度,而且由于非贸易品价格持续上升,已造成出口行业工资增长加快。所以,总体上我们还是难以把近年来中国人财富的增长简单地用生产率的进步来解释。

我的初步研究让我相信,中国近年来的财富增长主要是信用创造或者金融深化的结果,这与美国经济这些年来情况在机理上非常类似,区别只在于这种金融深化或者经济杠杆化的程度不同罢了。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如 MBS、CDO 和 CDS)创造了更高倍数的信用杠杆(一般在 30 至 50 倍),大大提升了美国人用金融资产价值衡量的财富和消费能力,而中国将近 10 年来的金融向经济的渗透和信用扩张,毫无疑问也创造了更多中国人的金融资产和财富的价值,但提升的是中国人的更多投资和理财的能力。不用说,除了高收入和富裕阶层之外,有更多的城市人口成为在这个金融渗透和信用扩张的过程中获益的人群。这些人群多是那些收入有保障,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教育、金融、商业、新兴部门就业,或者拥有政府分配的福利房和社会保障、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和家庭背景的相对年轻的人群。这些中国最近十年来大多数城市生活水准显著改善的阶层,人口规模估计有 1 至 2 亿。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或者家庭都有银行的负债,最主要的购房的按揭贷款。

在上世纪末取消福利分房之后,银行对房屋开发商的信贷支持和向购房者推出的大规模购房信贷





(按揭)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从根本上点燃了房地产的开发与购房需求,成为之后中国经济再度繁荣的基础。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与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的改善是紧密相连的,而房地产市场的启动显然又加快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这些年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和相关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每年几乎占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新增投资的一半以上。如果没有金融的渗透和信用的创造,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所以,如果要问这些年来中国人的钱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中国经济里有那么多的流动性?答案就在于,这些钱是金融深化创造出来的。因为金融的深化或者信用的扩张可以把未来的收入流量借到今天来用。一旦今天的购买力可以突破今天的实际收入水平,那么今天的实物资本就被重新估值了。而这就需要今天发行更多的货币来支撑被扩大几十倍的购买能力。

不管是谁,有了资产,就可以在需要时变现。资产市场越是被看好,资产变现越容易,卖出资产钱挣得越多:钱就是这样在近年间不知不觉中多起来的。钱越多,首先是资产价值越膨胀,房价和股票价格越涨。慢慢地,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会涨上去,最终,所有的东西都会变贵,工资当然也要上涨。一旦东西没有多而钱多了,价格标签当然就要向上调,这是常识。

因此,在资产市场上,资产的价值是被每个人估计出来的。如果大家都认为明天的房价会上涨,那么明天的房子就比今天值更多的钱。那么,明天就需要更多的货币来交易这么多的价值。但是,如果大家认为明天房子会跌价,那么明天的房子就不再值今天那

么多钱,那么明天就不需要那么多的钱来交易这些价值。这就出现所谓价值被蒸发的奇特现象。

以上这些都是为了说明,中国今天宏观经济出现的主要问题不是出口下降。出口企业是遇到了很多困难,有的已经倒闭。但是这些企业的倒闭主要是因为生产和用工成本上升太快造成的,这是这几年物价上升和生活费用快速上升的必然结果。而物价和生活费用的快速上升则是这些年来资产膨胀和货币不断因为信用创造而超发的结果。现在,时局发生了变化,资产市场不被看好了,房地产价值下跌了,股票的价值缩水了,很多企业、开发商和老百姓的资产负债表上出现了资不抵债。这一切导致信用的收缩加剧,去杠杆化在所难免。于是经济出现萧条,通货膨胀消失。

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今天出现的信用收缩或者去杠杆化本身就是全球金融危机的一部分。虽然很多国家的银行和政府都持有美国的债券从而会被美国的次贷危机拖累一些,但我们更要看到,今天全球经济都遭遇的是一个普遍的信用收缩和去杠杆化的问题。毕竟过去这些年来全球的各大经济体大都经历了资产的膨胀和经济的高杠杆化,而现在差不多又都经历着泡沫被挤出和资产价值回落的痛苦,只是美国的次贷危机走得更远了一些。

来源: 上海证券报, 2008 年 12 月 05 日

重商主义的局限: 全球失衡和中国国际经济关系中 即将面临的危机

马丁·沃尔夫(《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Martin Wolf))主题演讲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的崛起,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最重大的经济及政治事件。然而,这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不仅是在中国,也在全球其它地区。2000 年以来,这些压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中国的资源密集型增长对于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以及中国日益增长的经常账户盈余对于全球失衡的影响。目前,后一种影响更为重要。

2004 年至 2007 年期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在其

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从 3.6%激增至 11.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今年的这一比例将为 9.5%。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从 2004 年的 687 亿美元,增至 2007 年的 3718 亿美元,中国从而成为全球最大的盈余国家。实际上,那一年中国的盈余为排名紧随其后的德国和日本总盈余的 80%。以占 GDP 的比例衡量,2007 年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水平也高于德国(7.6%)和日本(4.8%)。近年来,





没有哪个大国经常账户盈余在其 GDP 中所占的比例达到中国的水平。

与上述经常账户盈余相对应的,主要是外汇储备的累积。而这也是设定汇率目标的副产品。2004 年 1 月至 2007 年 12 月间,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了 1.113 万亿美元。简言之,中国使 8510 亿美元的经常账户盈余和 2620 亿美元的净私人资本流入重新进入了外汇储备之中。截至 2008 年 9 月,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 1.906 万亿美元。以当时水平计,这占到了全球总体水平的 27%,无疑位居全球首位。而外汇储备名列全球第二的日本,其规模仅为中国的一半。

中国的目标是推动出口增长,同时,通过将汇率维持在低位,以外汇储备的形式累积“财富”。无疑,后者的部分动机是为了给源自外部的混乱购买保险。不过,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对于世界和中国而言,这种重商主义政策都是错误的。

对于世界而言,这是一种错误的政策,因为就其定义来讲,盈余必须由其它地区的赤字来冲抵,而目前看来这些赤字是不可持续的。更确切的说,这些盈余必须由赤字来冲抵。然而,实践证明,要有效消化这种巨额盈余,对于全球其它地区而言是极其困难的。在全球层面上,这些盈余大多是靠少数高收入国家的家庭过度支出来消化的。例如,在 2007 年,全球 70% 的经常账户赤字仅来自于 4 个国家——美国、英国、西班牙和澳大利亚。在这四个国家,巨大的住宅泡沫使得家庭大举借债,而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家庭负债的大规模累积导致了巨大的金融危机,目前这种危机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2007 年,这种盈余总计 1.74 万亿美元,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2008 年可能超过 2 万亿美元,而目前,已没有私人部门的借方愿意(且具备足够的信誉)来抵消这种盈余。这些盈余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石油出口国。2007 年的这部分盈余为 4800 亿美元,而在 2008 年可能高达 8000 亿美元。如果油价维持在目前的水平,明年的这一数字将大幅下降。无论如何,对于那些凭借一种资源有限的大宗商品大发横财的国家来说,储存大量的收入都是合理的。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德国和日本等许多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人们可能觉得,在

石油盈余不断飙升之际,它们本该出现大量的经常账户赤字——却一直实现了经常账户盈余。以 2007 年为例,非石油出口国的经常账户总盈余达到了 1.3 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占到了 30%。这些非石油出口国盈余的实现,有效提高了其余石油进口国所需的支出规模。

事实证明,高收入国家的巨额家庭借贷在冲抵这些盈余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持续的。那么,有什么替代方法呢?方法之一可能是高收入国家中高水平的企业投资。如今,随着经济衰退的加剧,企业部门将大幅减少、而非加大投资。因而,通过增加其他地方的需求来消化过度的储蓄,并非一种可行的方式。

于是只剩下了政府赤字。在那些结构性贸易逆差较大的国家,财政赤字正爆炸式地增长。但这种做法也是不可持续的。在某个时候,当一些国家的政府只提供较低的利率、而不提供针对货币风险的保护时,财富所有者将不愿累积越来越多的债务——即使是那些评级较高国家的债务。一种货币连带的债务危机可能带来迅速的通胀,即使是全球关键货币美元亦是如此。

重商主义政策也不利于中国,因为这会使中国变得更为贫穷,也更容易受到冲击。这种政策使得中国过度依赖于出口,而在最近时间以来,过度依赖于净出口的增长。这使得中国这个大国在全球需求低迷之际变得非常脆弱。近年来,这种政策还推动了相对而言资金密集型的发展模式。此外,较高的实际利率水平能够挤压利润,并提高实际工资和消费水平。同样重要的是,外汇储备是一种非常糟糕的投资,给中国带来的实际回报是非常负面的。如今,(中国的)人均外汇储备约为 1500 美元,占 GDP 的 50%,对于一个贫穷国家来说,这两个数字都是令人震惊的。这是一种浪费。将占 GDP 10% 以上的资金用于提高(公共和私人)消费,要比投资于低收益的富裕国家债务有意义得多。

首先,一项表面上致力于稳定的政策实际上是在影响稳定。这影响了国内的稳定,因为要对外汇储备的累积进行冲销,使得银行业体系和货币政策出现了扭曲。这也影响了国外的稳定,因为这迫使资本输入国陷入巨大的财政赤字,从长期角度来看,这甚至可能毁掉全球货币体系。这种做法不仅本身就是危险的,而且有可能造成巨大的保护主义压力。





不从这里出发,情况要好得多。正因如此,长期以来许多见多识广的观察家建议中国政府调整经济模式,改变对出口和经常账户盈余的过分依赖。目前,这种挑战要难以应付得多。但中国必须迎接这种挑战。这里的问题并非汇率政策本身。而是在国内更多地消化中国日益上升的产出,并尽可能地

从生产供出口的产品,转向生产供应本土市场的产
品。这种转变必须立刻进行,这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将发生大规模的国际摩擦。

来源:金融时报,2008-12-15

中国要安度金融海啸,不能靠摸着石头过河

《顾蔚专栏》

路透香港 12 月 11 日电---金融危机后,表面上看中国改革方向没有变,但实际上中国因此更加坚定了小步走,渐进式改革的信念。这么做是危险的。改革开放 30 年了,不能还一味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否则这条河什么时候才能过完?金融海啸已经来了,认准方向,尽快趟过水才是正理。

之前中国把美国当老师,但这场危机颠覆了中国对于美国式金融和监管的信心,次贷危机也被一些人拿来证明中国超度监管的合理性。必须认识到,金融危机出问题的原因不在市场机制本身,而在于监管没有跟上。美国允许自由金融创新,出现问题并不奇怪,因为监管总有滞后,问题发生后才知道什么地方需要加强监管。如果总是套着救生圈学游泳,当然不用担心被水呛到,但可能永远也学不会游泳。

中国政府的从严管制、小步前进看上去让中国躲过了一劫,但这么做并非没有代价。问题集中表现在由于金融创新不足、对劳动者的保护不够、人民币低估导致进口商品太贵等因素,导致国内消费严重不足。危机出现后,美国可以通过增加政府开支迅速拉动经济,而中国国内消费不足的顽症则因为一拖再拖而更难解决。危机虽然由美国产生,但因为市场化机制拥有更强的自我修复力量,美国经济复原的速度反而可能比中国要快。

人民币小幅稳步升值是中国引以为豪的渐进性改革的一个例子。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说,如果中国三年前屈服于西方国家的压力让人民币快速升值,那么今年人民币可能会大幅贬值,给中国经济带来大麻烦。但北大光华管理中心的教授 Michael Pettis 指出,如果三年前人民币升值一步到位,中国贸易顺差就不会增加得那么快,世界经济不会那么不平衡,甚至未必会爆发这场金融危机。

中国已经错过了改革的最好时机。亚洲金融危机充分体现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脆弱性,中国政策制定者提倡促内需也有 10 年之久,但说易行难。外围环境恢复后,中国未能痛下决心,通过增加社会保障来提高居民的消费欲望,反而通过压低人民币汇率、劳动力和资源价格等方式增加出口,以求输出多余产能,这就使得中国今天对世界经济的依赖远大于 10 年前。如果中国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刺激消费,就必须通过减少生产的方式来解决掉这些年新增的多余产能,这就意味着大量关闭工厂,工人失业。

改革在短时间内一定会带来痛苦。全球经济风雨飘摇,中国 11 月出口出现七年来首次负增长,可以说没有比现在更糟糕的改革时机了。但悲哀的是,往往是太水来了,才会有动力去学游泳,只可惜为时晚矣。大破才能大立

从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和金融改革的步伐并没有因为危机而放缓,比如中国 9 月份提出允许融资融券试点,12 月又拿出了成品油价税费改革方案。这是政策制定者趁着股市低迷和油价回落之际适时推出的新政策,给研究了 10 多年的两个老大难问题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但这两项新政只能说是量变而非质变。前者没有涉及到中国资本市场政府干预过多,对上市公司监管又不够的核心问题;后者虽然走出了用市场力量引导能源消费的重要一步,但还没有杜绝国际油价一旦反弹,政府继续补贴的可能。

这些措施昭示中国改革还在既定的轨道上进行,没有因为危机而因噎废食,这当然让人感到鼓舞。但它们并没有涉及到问题的本质,即过度投资,消费不足。中国政府并没有痛定思痛,加大改革的步伐。为了刺激经济推出的 4 万亿元刺激经济计划,延续了靠水泥糊经济的老路,而对于社会保障制度则没有根本性





的改革,甚至还有呼声要废除今年年初开始实行的新劳动法,这可能会让出口企业喘口气,但对提振消费没有帮助。

中国人储蓄率过高的问题根源在于缺乏社会保障,积累多年的问题显然不能短期内改变。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指出,中国经济转型需要进行两个根本性的改革--把剩下的国家资产的所有权通过基金的方式公平地分配给 13 亿中国人,让普通家庭来分享资产升值和财产收益;政府的预算过程必须通过公开听证和公众参与,使政府开支离开实体构造建设,向与人民需要相关的项目转移。

过去中国习惯于通过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但现在的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基础设施也具备规模,再靠增加投资已经效率太低,会有太多浪费。经济学家们建议,短时间内,为了应对危机,中国应该用退税、减税以及国有资产民有化改革,把钱留给民间,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去花,以此带动民间消费的增长。

要拉动中国内需,有 8 亿人口的农村市场是关键。中国明年将在全国推广财政补贴"家电下乡",但补贴不能持续推动这个巨大的市场,中国有必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补贴只能是一个短期措施,如果中国不能很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农村的消费力就无法得到有效的释放。近年以来诸如取消

农业税等一系列政策,只是着眼于减负,并没有帮助农民创富。

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将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陈志武认为,如果把土地权还给农民,允许土地的自由流转和抵押,以此给农民以资产性财富,提升农民的消费信心,从而带动中国经济走出这次全球危机的困局。

在中国还完全是计划经济的时候,开一个小口可能就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改革走到今天,容易做的都已经做了,渐进性的小步改革已经不能发挥那么大的作用了。大破才能大立。要促进中国经济长远增长必须从改变机制着手,解决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矛盾。所幸的是,30 年的改革不仅增强了中国国力,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教训。如果说这次金融危机有什么正面因素的话,那就是给中国提供了"化危为机"的动力和机会。(完)

来源: 路透网《顾蔚专栏》, 2 月 11 日

--审校 林高丽

人民币汇率该升还是该降?

作者: 杨沐(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合作项目协调人、资深研究员)

人民币不是一个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 中国并没有完全放开资本项目管制。最近人民币汇率连续两日跌停, 四个交易日走低, 与其说是市场信号, 不如说是中国政府打出的一张牌。

从目前外汇市场的人民币和美元的供求关系来看, 市场上现有的美元惜售倾向(世界市场上的美元流动性短缺), 如果没有央行的顺水推舟, 有近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央行, 要保持汇率稳定, 只是举手之劳(如 12 月 3 日的操作)。人民币汇率的升降不是决定于市场, 而是决定于中国政府。

首次要美国考虑中方要求

对这次下降的国际解读, 是中国政府在中美第五次战略经济对话之前的一个策略行动。和过去四次中美战略对话之前, 人民币汇率都是升的做法不同, 这次在美国财长鲍尔森到达北京以前, 中国抢

先表示了面对市场的趋势, 中国应有基于自己利益的立场。如果说, 在过去几次对话中, 中国不得不优先考虑美国方面的利益要求; 现在, 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后, 中美之间力量对比的新变化, 中国可以第一次首先要求美国考虑中国方面的利益要求。特别是, 中国希望籍此向奥巴马候任政府表明, 中美战略对话在今后中美关系发展中的重要性。

但中国国内的解读, 似乎更倾向于中国政府政策转向制造人民币贬值, 来刺激出口。12 月 7 日国内报道, 中国 11 月份的月出口额有可能是七年来第一次比上年同期下降 2.2%。8 月份以来, 由于美元对其他大部分货币的急剧升值, 人民币兑一揽子货币的贸易加权指数已升了 10%, 升值之速度是近几年所没有的。中国的出口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汇率压力, 外贸企业和市场期望着政府的帮助, 人民币的





适度贬值是在情理之中。从 12 月 1 日到 3 日,随人民币汇率的走低,中国股市的外贸板块,连续三天上涨,跑赢大市。

从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看,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首先是国内投资,其次是国内消费,第三才是净出口。但是,作为 13 亿人口的大国,历史经验表明,出口在提供就业和启动经济发展中,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毫无疑问,面对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中国为稳定自己的经济发展速度,不仅需要刺激内需,也需要帮助稳定出口的发展。但是稳定和促进出口,有很多可供选择的政策措施。人民币汇率的下降,只是其中一种,而且从国际上看,它可能会带来三个风险。

汇率下降有多种风险

一是可能迫使亚细安和新兴国家的汇率进一步下降,形成亚洲和新兴国家的货币竞相贬值的恶性循环。这不仅对中国出口没有帮助,反而让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有了坐收渔翁之利的机会。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自己身处困难中的中国,作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解除了亚洲国家的后顾之忧,为亚洲国家摆脱金融危机,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今天,尽管中国正在成为带领世界走出这次危机的引擎,但人民币可能贬值的消息,还是使东亚国家吓出一身冷汗。

二是世界市场上的做空力量,在 2008 年成为了一匹脱缰的野马,从冲击美元开始,冲击了金融业,冲击了股市,冲击了石油和大宗产品,冲击了大部分国家的货币。人民币和日元,几乎是世界上仅剩

的坚挺者。一国的货币从升值到贬值,看起来微小的变化,但千里之堤,溃于蝼蚁之穴。今天还在升值的吸引下,孜孜以求进入中国的热钱;明天就可能在贬值的恐惧中,变成争先恐后的撤出者。这几个月发生在俄国,韩国,印度的现象就有可能重现于中国。别忘掉,他们也都是和中国一样,是具有较高的外汇储备的国家,和曾是热钱涌入最多的国家。

三是从“1976 年牙买加协议”后,美元一直是世界贸易和外汇储备中的基础货币。在过去 30 多年中,随着欧洲和新兴国家的崛起,美国的经济地位,已经和美元的地位越来越不对称。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上百万亿美元的虚拟资产正在化为泡沫消失,世界的美元面对这大大缩水了的资产,美元的贬值已是不可避免。现在的升值,只是美元还是世界基础货币,在经济危机中还需要持有美元来保持流动性,这是市场力量冲击下的一次回光返照。如果不考虑这种长期趋势,人民币的贸然贬值,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今后升值的难度。

人民币要在未来成为世界性货币,必须逐步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汇率越来越受市场的主导,越来越逼近市场的实际汇率。中国,小心啊。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12-16

金融快讯

高盛开“油价赌场” 中国企业付高昂学费

作者:畅远

深南电、中国国航等国企近期纷纷爆出在国际衍生品交易中遭受巨亏,投资者的视角再一次定格在衍生品市场,结构性期权交易。这个昔日因中航油事件、国储铜事件等而让投资者谈虎色变的话题,再次染上了神秘色彩。为此,本报推出衍生品专题,从结构性期权、场外市场等层层推进,解构衍生品市场迷局,剖析以高盛为代表的国际投行在该市场中的角色,探索适宜国内企业的套保之路。

高盛的衍生品设计师没准是拉斯维加斯的玩盘高手。在他们给中国企业提供的对赌合约里,依稀

能见到赌场庄家的精妙算局。在这场以油价充当玩牌的赌局里,不明就里的中国企业权当去了一趟拉斯维加斯,只是学费稍高了一点。

截至昨日,公开信息显示:继 3 年前的中航油之后,深南电等国内企业再次成为高盛下属全资子公司杰润的对赌方,而从目前的情况看,貌似“小概率事件”的亏损额仍在扩大。

让我们看看深南电与杰润的第一份对赌合约设计:

有效期为 2008 年 3 月 3 日~12 月 31 日,由三个





期权合约构成。当浮动价（每个决定期限内纽约商品交易所当月轻质原油期货合约的收市结算价的算术平均数）高于 63.5 美元/桶时，公司每月可获 30 万美元的收益（20 万桶×1.5 美元/桶）；浮动价低于 63.5 美元/桶，高于 62 美元/桶时，公司每月可得（浮动价-62 美元/桶）×20 万桶的收益；浮动价低于 62 美元/桶时，公司每月需向杰润公司支付与（62 美元/桶-浮动价）×40 万桶等额的美元。

该合约的签订时间是 2008 年 3 月 12 日，代号为 165723967102.11。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指数收报 106.81 美元/桶。这个合约在当时看来，貌似风险不大，因为大部分市场人士认为，原油期货价在 12 月 31 日前跌破 62 美元/桶的概率不高。

在此，我们有必要重温今年 3 月原油期价突破 100 美元/桶时的牛市狂热，也更有必要回顾著名的国际投行——高盛在这场原油牛市盛宴里扮演的角色。

3 月份，油价“破百”成了全球媒体的热点话题，对“破百”后的油价预测也一度成为众多业界人士的谈论重点。而在去年准确作出油价将在 2007 年年底达到 95 美元/桶预测的高盛，在 3 月再次抛出重磅研究报告——原油均价将在 2008 年涨至 141 美元/桶。后来的事实证明，高盛不愧是预测专家，油价果然随后一路飙升，在 7 月触摸 147 美元/桶的顶峰。

可以想见，在深南电相关人士签订上述对赌协议的时刻，正处于原油牛市疯狂新的开端——“突破 100 美元打开了新的上涨空间”、“低油价时代一去不复返”。

于是，上述协议显得是那么充满“诱惑”——只要在今年年底前，油价不跌破 62 美元/桶，深南电将只赚不赔。而在当时看来，“年内油价跌破 62 美元/桶”显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难怪这份合约对于深南电的收益设计得如此“吝啬”——在 62 美元/桶上方，不管油价涨到什么位置，每月最多获得 30 万美元的收益；而对深南电的风险却设计得充满玄机——只要油价跌破 62 美元/桶，将按照 40 万桶的两倍于深南电收益计算量的系数，乘以 62 美元/桶以下的差价，这将是一个亏损额巨大的数字。假定今年年底前油价跌至 40 美元/桶，

深南电每月将最多付出 880 万美元。而深南电 2007 年的全年净利润折合美元也不过 1700 多万美元。

这种设计与赌场上的庄家设局有异曲同工之妙——大概率事件由庄家承担损失，但赔付较小；小概率事件由玩家承担损失，但赔付较大。当庄家面对多个玩家时，所谓的大小概率与赔付额的比率，往往向有利于庄家的方向发展。更何况，庄家具备一定的影响赌局的能力，这是最不利于玩家的。

我们注意到，在这场面向全球的油价赌局里，高盛至少扮演了三个角色——预测家、投机商和对赌方。预测家角色由高盛的研究部门扮演；投机商角色由高盛旗下的投机基金扮演；对赌方由高盛旗下的专事提供对赌协议的公司（如杰润）扮演。

自今年 7 月原油等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拐点以后，高盛发布了令市场大跌眼镜的预测报告——油价可能跌至 40 美元/桶。而从现在的行情演变趋势，油价已经跌穿 50 美元/桶，向 40 美元甚至更低的位置寻找支撑。更值得关注的是，高盛席位的投机基金在油价上涨和下跌的过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摩根士丹利等公司一起，被市场称作影响原油期货价的几大机构之一。

而杰润无疑是这场“牛熊转换”的先知先觉者，在今年 3 月成功游说深南电签订上述协议。另据了解，杰润的营销团队还接触过国内多家有相同风险对冲需求的企业。联系起几年前的中航油，他们的业务模式无疑是“充当具备套期保值需求的中国企业的场外交易对手，为其提供各类期权合约”。

不可否认，杰润的对赌协议并非都是赢家，但他们的风险往往可以控制，且损失额不大，而从协议设计的“小概率、大收益”的情况看，只要“赌”对了少数几次，便能赚得盆满钵满。显然，在其拥有强大“研究能力”和“市场参与能力”的母公司支持下，这种“小概率事件”并不那么难发生。而这种可怕的业务模式，对于在国际金融市场还是初学者的中国企业来说，注定要付出不菲的学费。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08 年 11 月 25 日





中国远洋押注运费失误酿成巨亏

作者：吉密欧(Jamil Anderlini)

全球最大的干散货船运公司（以运力计）中国远洋(China Cosco)表示，因在押注远期运费失误，可能蒙受 39.5 亿元人民币（合 5.77 亿美元）的损失。

这一警告是中国国有企业因对冲操作导致巨额亏损的最新例子。

中国远洋将远期运费协议(FFA)上的亏损归咎于“近期市场的急剧变化”和运费大幅下跌。远期运费协议为船运公司提供了对冲工具。

但分析师表示，中国远洋建立的头寸以及随后的亏损异常巨大，这可能意味着该公司已超出了对冲范围，可能押注中国对铁矿石、小麦以及其他由其干散货子公司运输的大宗商品需求会出现反弹。

日本野村证券(Nomura)驻香港运输业分析师 Cecilia Chan 表示：“市场中没有人料到运费会如此迅速地大幅下跌，但中国远洋的多头头寸如此巨大，他们可能不仅仅是利用这些合约进行套期保值，也是作为一项投资进行投机。”

全球经济低迷已暴露出，许多中国大型国有企

业显然在利用其对冲操作进行投机，以推高其收益。中国远洋表示，今年前 3 个季度，其持有的远期运费协议价值变动所导致的亏损总额为 23.1 亿元人民币，但这些合约上的收益也有 18.7 亿元人民币。

从 9 月底至 12 月 12 日，反映全球干散货船运市场费率的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Baltic Dry index)下跌了 76%。截至 12 月 12 日，中国远洋今年的对冲损失已增加至 53.8 亿元人民币，而收益仅为 14.3 亿元人民币。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蔓延至这个世界上增长最为迅速的大型经济体，中国对铁矿石和其他大宗商品需求大幅下降，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运费率的急跌。而就在全球经济危机影响船运需求之际，大批新船进入市场，这也是运费率骤降的一个原因。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2008-12-17，译者：君悦

马多夫欺诈案 更多投资者承认被坑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联合报道

随着更多银行披露在伯纳德·马多夫(Bernard Madoff)经纪公司和对冲基金中的投资，马多夫欺诈案的影响昨日蔓延至全球金融体系。慈善团体和个人投资者面临巨额损失。

在汇丰(HSBC)证实可能损失至多 10 亿美元(英国《金融时报》首先报道)后，投资于马多夫或向马多夫投资者提供借贷的大型金融机构报告的潜在损失达到 100 亿美元。

苏格兰皇家银行(RBS)、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和西班牙国际银行(Santander)都成为马多夫欺诈案的受害者。苏格兰皇家银行表示，可能损失

至多 4 亿英镑；日本野村控股(Nomura)可能损失 275 亿日元（合 3 亿美元）。

随着投资者和基金的基金(funds of funds)匆忙筹集资金来弥补损失，对冲基金经理正准备迎接巨额赎回。马多夫欺诈丑闻引发人们对基金的基金业务模式的质疑。基金的基金管理的资产大约有 6850 亿美元，占基金行业的三分之一以上。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2008-12-16，译者/君悦

沈联涛：世界金融秩序的三种可能

作者：李涛（《财经》记者）

一国经济成功与否取决于该国的治理能力，所以未来几年内，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治理能力

会受到严峻考验。

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为 12 月 5 日出版的





《财经》年刊——《2009：预测与战略》撰文，提出上述观点。沈联涛坦言一生基本都在研究金融危机，一个结论就是，金融危机的本质归根结底还是政治。即使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解决方式也不可避免是政治方式。说到底，所有金融危机都是治理的危机。

"我希望满怀。今天这场金融危机创造性地打破了许多神话和过时的理论。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果然是'市值计价 (Marked to Market)'。"沈联涛如是说。

如今，金融危机的阶段正要过去，世界进入了危机管理和解决的阶段。关于中国和东亚在未来十年中会处在什么位置，沈联涛认为，有三种可能的情形（不算是预测）。

第一种可能情形是保持现状。虽然国际金融秩序有要转变的意愿，但沈联涛认为维持现状的可能性很大。理由是七国集团的大股东拥有既得权力，不会轻易放权，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心理上和机制上都没有做好分享权力的准备。

换句话说，沈联涛认为在未来五年内，现有国际货币秩序的改变会非常小。发达国家会要求顺差经济体在它们所控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中，存入更多储蓄。IMF 和世界银行将继续向那些因过于依赖外部融资而陷入困境的新兴市场提供贷款。美元和欧元的主导地位还会维持下去。

第二种可能情形是区域市场兴起。沈联涛对此作了详尽阐述，随着美国对自己的收支结构进行调

整，全球失衡会显著减轻，新兴市场的顺差也会收缩，可能会比一般经验认为的要快。在此情形下，那些抓住机会完善本国金融体系、提高本国企业治理能力、发展社会基础设施、维持社会稳定的新兴市场国家，将会成为大赢家。因为发达国家的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顺差的新兴市场将会把储蓄投放于高增长潜力、产权稳定的市场。

因此，沈联涛认为完善本国市场仍是参与更强的全球市场的关键和先决条件。但各国对本国市场的强化措施，会首先加强区域性市场。亚洲的货币和金融合作会加大，不排除一个区域性货币安排的可能。

第三种可能情形是三国演义。沈联涛预计 20 年后至少会有三种全球储备货币争霸，在亚洲之内，可能是日元、人民币、印度的卢比，甚至可能是一种包括了韩元、中东和东盟货币的亚洲货币。在拉美，可能是以巴西雷亚尔或墨西哥比索作为区域核心货币。到那时，多元化的全球投资组合中的资产将在地理意义上更平等地分配，故投资者不会对少数一两种货币有太大的敞口，而是至少有三种，甚至四种全球储备货币和相关资产。在更平等的环境下竞争资源，会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更好的选择。

来源：《财经网》，2008 年 12 月 09 日

体制之殇注定中投勇气丧失

作者：冯涛（路透中文网分析员）

中投公司的成立不仅是中国外汇投资模式的重

大改革，同时还肩负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国家资源战略布置计划的重任，并完成日益增长的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的使命。

中投投资海外需要勇气，但是更需要专业化的投资水准，但是目前中投公司盲人摸象式的投资模式以及铩羽而归的投资结果，不仅不能给予国内投资者信心，反而带来了不安。

路透报导，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楼继伟周三在香港出席一项研讨会时指出，“我们已没有勇气再投资海外的金融机构，因

为不知(他们)何时会垮。”

他更表示，外国政府只是挽救债权人，没有挽救投资者。他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亦没有信心，因为每周都有改变。“我们要等政府的政策明显后，不会有大的机构垮台，才会再投资金融机构。”

从楼继伟的话语中，可喜的是中投公司的风险意识正在不断加强。尽管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加剧，中投公司历次海外投资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但是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只要能认真吸取教训，就可以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

不过，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当前中投公司仍面





临诸多矛盾，亟待解决。

众所周知，外汇储备是国家财富，中国外汇储备投资从以往购买美国国债式的被动投资转向主动型投资以后，中投公司的一举一动牵动了无数国人的眼球，可以说，纳税人对此的关心体现出了应有的责任心。

但是从成立一年多的中投公司历次海外投资结果看，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黑石集团、摩根士丹利、Primary 基金（Reserve Primary Fund）、摩根大通的主要货币市场基金以及德国资产管理的 DWS 货币市场信托等等，历次海外投资几乎是节节失利、逢投必亏。

于是，中投公司转战国内零风险的一级市场新股发行。2007 年 11 月，中投公司拿出 1 亿美元参与中国中铁的战略配售，盈利可观可想而知。

笔者认为，中投公司“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背后折射出体制之殇，即中投在海外投资缺乏足够的监管和相关法律约束以及其内部治理结构的官本位化，以至于难以形成专业投资水准，最终导致海外折戟。

一方面，投资目标的不确定性。目前中投公司相关投资领域以及投资比例的界定上依然模糊，甚至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界定和约束中投自身的决策行为，这就意味着中投的投资权限和相关责任具有很强不确定性，同时业绩该如何考核始终悬而未决。

另一方面，由国家财政、金融部委的官员们组成执行董事的投资公司，很难做到专业化投资。当前中投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即七人管理委员会大多是国内财经金融界的高官，阵容绝对豪华，但是当中投资专业人士相对缺乏。

七人管理委员会具体包括：国务院副秘书长楼继伟、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高西庆、银监会纪委书记胡怀邦、财政部副部长张弘力、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司长杨庆蔚、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汇金公司副董事长汪建熙。中投公司靠政治需要决定其关键的人事任命，明显受到官本位问题的困扰，同时缺乏一个成功投资机构所需要的独立和创造性思考的空间，如此机制也就注定了中投公司难以吸引人才加入。通过对比发现，淡马锡董事会的 10 个董事中，来自官方的只有 4 个，另外 6 个属于外聘。

中投公司要想获得成功，就应该和政府的其他部门绝缘，并在实践的过程中，对自身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进行更多的检视与探讨。就如新加坡的淡马锡，尽管以国有之名，但仍受到监管委员会和相关法律的约束，同时政府绝不干预市场的具体运作。

来源：路透中文网，2008 年 12 月 5 日





Abstract

Business English is the core course for ESP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programs which empathizes the effectiveness and pragmatism. Feasibility is the crucial element for business English programs especially for in-services business people. *Business*

Guide:

- **Business English: An Individualised Learning Programme —An Effective but Defective ESP Program**
- **Non-native and Native Speaker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a Team-teaching Approach: Case of the JET Programme**

English-An individualised learning programme is an effective and radical business English program, while its content is mainly learners-providing. There are some weaknesses that need to be considered.

Key words: business English; individualized; organizer

1. Introduction

Business English is an individualised learning programme which “represents a radical new approach to the provision of in-service business English courses” (Wilberg & Lewis, 1990, p. 8). It is a flexible learner-centered ESP program basing on two sharply different principles. Firstly, the students provide the content. Secondly, the book is desig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businessperson rather than the language teacher. With the help of sophisticated formats provided in this book, students can re-access, revise and use the information to fulfill their needs. *Business English* is suitable for the students from post-beginners to advance for the sake of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social language, formula phrases and word partnership (Wilberg & Lewis, 1990). This program depends on the lexical approach emphasizing the collocation and word grammar.

However, it is easy for students to produce grammatical mistakes without the systematic language learning procedures while they only rely on the language fragments to construct their language. There is still lake of examination in practice to consider the standard of this program. Although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ncrease students' lexical power,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ective weaknesses remain in this program.

2. A new attempt in business English courses

Traditionally there are two kinds of business English textbooks. One is a conventional course book for general business purposes; the other is an extensive combination of photocopying material or the course book for specific business purposes (Wilberg & Lewis, 1990).

For the conventional ones, “a striking feature is the large number of general books, which seem to differ very little from course books for EGP (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s)—working through a standard set of structures, teaching much common core as well as some work-related vocabulary, and dealing equally with all the skills” (Robinson, 1991, p. 98). So it is common that the students





majoring in English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choose an optional course in business English, who are provided with a general textbook applicable to a range of business situations. These conventional textbooks are recommended to the pre-service courses and appropriate for the students without or with little on-the-job experience. In these books, "most units contain work on the traditional four skills plus specific grammar and vocabulary development" (Dudley-Evans & St John, 1998, p. 55). Moreover this course consumes a long period of time, usually over several months or years. 

However, for in-service business courses, organizers have to compromise on the requirement from clients, employers or companies to provide "tailor-made" courses, even though it is necessary to include as much as possible in the courses. Then "the photo-copy approach" comes to be the other alternative. "It is possible to choose material which are relevant to the student's declared objectives, and to tailor course content to a greater or lesser extent to job-specific needs" (Wilberg & Lewis, 1990, p. 8). There is an obvious disadvantage that no overall course plan is available to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ESP, Robinson (1991) suggested that more targeted business English textbook might be designed for specific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needs. Those books are more skill specific or genre-based. Like "*Speaking Effectively*", it aims to develop the fluency and language competence of learners of business English by focusing on the most common business communication situations and by giving learners the opportunity to practice the typical language of those situations (Comfort, et al., 1994).

By compared with these two texts types, *Business English* (an individualised learning programme) tries to make good use of these course books of business for both general

purposes and specific purposes. From the content of this book, it includes nine sections ranging from personal language to professional language through business settings.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talk about themselves and their jobs. They need to be aware of the language learning in business, identify the language they need, then find out their own personal language. They are invited to think about what he or she needs to learn so that they can provide the content by themselves by using the formats in the book.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anguage competence including appropriateness and fluency, it is essential for them to learn the social language, resource text, and word partnership and business grammar. After having the fundamental language structure, they will be much easier to acquire the knowledge on their professional field, such as giving a presentation, making a telephone call, attending business meetings and communicating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 backgrounds effectively. These settings seem to very common in business for general purposes. However, *Business English* is an individualised program that focuses on individual self-study. Students can choose the sections that they need to learn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language levels. This course is used for job-experience or in-service learners who bring business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the language-learning situation. "Settings and carrier content are mainly taken from the learner's own business contexts" (Dudley-Evans & St John, 1998, p. 56). Students can learn from themselves. It is apparent that this program is more specific aiming at meeting the needs of individual learners. Robinson (1991) pointed out that many books that were basically designed for classroom and interactive use claimed to be fit for self-study. While in contrast with *Business English* those books are impractical. So this individualized program is a breakthrough in business English



and an attempt to let learners get benefit from themselves by the encouragement from their teacher and the book.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usiness English*, there are four sections which can represent the features of this individualized programme, which are language learning organizer, personal language organizer, word partnership organizer and business grammar organizer. The word “organizer” needs to be mentioned and explained. It is used to remind students of organizing information instead of recording what they learn (Wilberg & Lewis, 1990).

3. Examinations of several typical sections in the book

3.1 Examinations of section one and section two

These two sections emphasize the needs of the learners. “Success in learning can only come about if the learner is motivated. Making the course relevant to job or study needs is usually a good way to motivate the learner” (Ellis & Johnson, 1994, p. 71). These two sections help to “find out what language skills a learner needs in order to perform a particular role” (Richards, 2001, p. 52).



The first section—language learning organiser is crucial for students to discover what they need to learn and design how to learn effectively. It is an investment for students to study most in shorter time with less money.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fill the frameworks with the topics, functions and situations where they need to use English with some key words given in the book. They can talk about their daily routine and annual routine. Especially they can describe them in their own language if they find it difficult to express in English. The purpose is to find out the English they need, like making a map to help them know where to go. They will be motivated and will realize their language needs immediately in this way. They can be aware of the gap between their language learning information and professional information. By compared with other business courses, need analysis becomes a fully integrated part of *Business English* rather than preceding the course. The learner’s need is more subjective which is derived from insiders and correspond to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factors (Dudley-Evans & St John, 1998). Thi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their future learning process.

From the point of credibility, “material designed for *Business English* and aims at learners who have some knowledge of the subject must be seen to represent the world that those learners are familiar with” (Ellis & Johnson, 1994, p. 127). So this individualized programme starts with learners themselves. In section two,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talk about their personal issues including their backgrounds, jobs, companies, products, their values and philosophy, their families and friends. By using the personal language they can choose to talk about themselves when they meet and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professionally. It is important and essential to build up the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business partners for future cooperation. This section makes this course quite different from other conventional business courses. Most business courses will divide the content into specific business settings like meeting people, telephoning and reporting which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professional practice. For example, *Business Objectives* focuses on language and skills in business, and less attention is paid for learner’s personal language needs. However when some learners are not certain about their needs that they will feel resistant on some more serious language work, and this will become the psychological obstacle for learners to study further. In contrast, Wilberg & Lewis (1990) pointed out that *Business English* could provide certain face validity for the student and material to facilitate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acher and student.

3.2 Examination of section three





Word partnership organiser represents the lexical approach—the radical new approach to language analysis, syllabus design and material writing for both general and business English teaching. This section presents a group of important keywords including contract, sales, prices and so on for *Business English*, and it helps learners find and record important word partnerships. Those keywords are the core business vocabulary with higher frequency. In the book, space is given for students to choose their own keywords and find out the lexical collocations. There are also background words provided to let students divide basically verb-noun, adjective-noun, and verb-adjective-noun word partnerships into groups and make sentences with them. “Collocation describes the company that a word keeps” (Dudley-Evans & St John, 1998, p. 85). The learning of word partnerships can give students a quick way to master the proficiency required. Usually business students have a large vocabulary, but they don't know how to combine the words together. When they need to express in English, they can come up with many nouns in mind, while they are difficult to make meaningful sentences that are well organized. So it is important to build up the word partnerships. It is obvious that vocabulary of *Business English* is needed for production purposes. Thus storage and retrieval are significant. The technique of learning vocabulary involves cognitive processing rather than mechanical learning of lists. Collocation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ways to gather vocabulary and facilitate cognitive processing (Dudley-Evans & St John, 1998). Students are also required to use their own keywords and collect background words by using a dictionary or talking to their teachers. In this way, they can provide the carrier content to meet their personal needs.

3.3 Examination of section four

“It is often said that ESP teaching is not concerned with grammar. While much of the skills-oriented work in EAP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or ESP does not concentrate on grammar in itself, it is incorrect to consider grammar teaching as outside the remit of ESP” (Dudley-Evan & St John, 1998). As Wilberg & Lewis (1990) quoted in the individualized programme, “without grammar you can't say much, without vocabulary you can't say anything”. Grammar in *Business English* is important too. Business people need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in English and make oral presentation. To avoid serious weaknesses in grammar interfere with the productive skills, students will require more specific help in grammar. There are some business course books which cover the grammar of English systematically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given to verbs-tenses, conditionals and modals. In *Macmillan Business English programme* (Badger & Menzies, 1993), there is an irregular verb list and grammar index focusing the grammar points throughout contents. Similarly, grammar notes and glossary which is closer to academic language courses are provided in *Business Objectives* (Hollett, 1991). A practice book called *Build Your Business Grammar* (Bowen, 1997) covers most key structures in business based on a typical situation found in business world. In contrast, *Business English* considers many compromises in in-service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realizes that “grammatical accuracy must be sacrificed to communicative efficacy” (Wilberg & Lewis, 1990, P. 31). It is wise to make good use of students' considerable language learning experience. In this section there is no formal grammar of the kind found in basic course books, but a wide variety of material including general business grammar, grammar of change, word families, “reporting” verbs, expressions and mistakes. In general business grammar section, there are some general remarks which can make about the language used to discuss and negotiate effectively and help to avoid sounding dogmatic or inflexible like using “would” or qualifiers to say things diplomatically. For instance, instead of saying, “That is unacceptable”, students can say, “That would be unacceptable” to sound more tentative. The grammar of change section focuses on different elements in language





ranging from verbs to prepositions. The changes also result from different expressions of time. In word families the words chosen in the book are the professional words which are related grammatically. Students need to generate the collocation of the core word, basically in verb-adjective-noun structure. This section has much in common with word partnership. There are twenty-four “business verbs” selected in this section. Students are doing word study by using dictionaries to find out the accurate collocation of those special verbs. They are also provided with a long list of important verbs for reference. For many special expressions *Business English* covers the important verb “have”, two-word verbs like “back up”, prepositions and prefixes. “Students can devote a lesson to collecting expression using the empty verb ‘have’ or they can deliberately audit professional materials for use for prepositional expressions with by etc” (Wilberg & Lewis, 1990, p. 33). For important mistakes, there are two kinds of mistakes emphasized in this book, one is grammatical mistakes like the collocation of the verbs, the other is the misconceived sentences which need to be re-thought in natural English expressions.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find out the most important mistakes and correct them by themselves with the help of the teacher. Word contrasts section is intended to highlight the frequent confusions to students at lower levels of ability. In this whole section, students can choose the context in which to practice the desired language by using the framework materials. “Frameworks are designed to prompt the production of language” (Ellis & Johnson, 1994, p. 132). Students can discover more about their language weaknesses by completing the frameworks with their authentic language inputs.

4. Weaknesses remain in *Business English*

Business English is a radical individualized programme. Apart from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book, there are some factors needed to consider. Is the business grammar that is not systematic suitable for the students at low levels of ability? For combining grammar, mistakes are inevitable. This program is designed for self-study, however, what is the solution for students who depend o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In this book, most of the sections focus on the speaking and writing skills training, while listening and reading skills are also important for communication with business people. In *Communicating in Business* (Sweeney, 2000), there are over 80 different recordings in the book with tasks accompanied ranging from general comprehension points to understanding important details. In contrast, there is no audio material provided in *Business English*. How well can the word partnerships help students to master their professional language only depending on their own lexical learning experience? There are not sufficient authentic materials examples for students to follow, although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provide the content from their jobs. Those questions are still waiting for answ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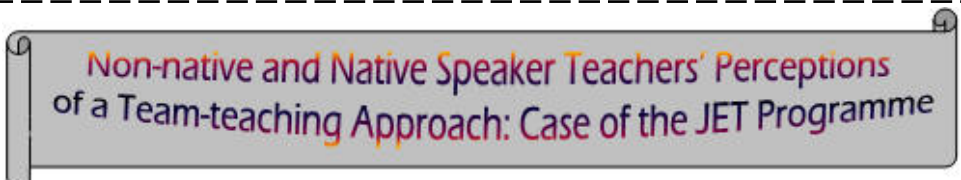
5. Conclusion

Business English: An individualized learning programme, is a radical attempt in business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based on a lexical approach and individual learner's needs.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ncrease learners' vocabulary, 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and crucial element for language learning. Teacher is the consultant and the language audit to help students find their needs and to stimulate and motivate them to use the language as much as possible. Students are the center of the course and the important decision-maker. “The basic idea of *Business English* is that the student provides the content and the teacher provides the language. The book itself provides the sophisticated formats which make possible this change of emphasis” (Wilberg & Lewis, 1990, p. 9).



References:

- ◆ Badger, I. & Menzies, P. (1993). *Macmillan business English programme*.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ublishers.
- ◆ Bowen, T. (1997). *Build your business grammar*. London: Language Teaching Publications.
- ◆ Comfort, J., Rogerson, P., Stott, T. & Utley, D. (1994). *Speaking effective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Dudley-Evans, T. & St John, M. J. (1998). *Development in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Ellis, M. & Johnson, C. (1994). *Teaching business Englis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Hollett, V. (1991). *Business objectiv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Richards, J. C. (2001).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Robinson, P. C. (1991). *ESP today: A practitioner's guide*. New York: Prentice Hall.
- ◆ Sweeney, S. (2000). *Communicating in business: A short course for business English stud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Wilberg, P. & Lewis, M. (1990). *Business English: An individualised learning programme*. London: Language Teaching Publications.



Non-native and Native Speaker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a Team-teaching Approach: Case of the JET Programme

Abstract

Since the mid 1990s, research on non-native speaker teachers (NNSTs) in foreign language has been received with increasing interest (Illurda, 2005) and various discussions about its scope have been explored. The discussions include the perceptions of NNSTs and native speaker teachers (NSTs) in terms of their performance and the impact of the team-teaching approach. There has been a need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s in the use of team-teaching in Japan, which was instigated during the Japan Exchange Teaching (JET) programme.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present multiple implication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opinions of Japanese Teachers of English (JTEs) and Assistant Language Teachers (ALTs) who are involved in the JET programme. In order to do so,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10 JTEs and 12 ALTs experience vexations and that these compromise the potential of the EFL teamteaching in Japan. Special concentration on the mutual perspectives of JTEs as NNSTs as well as those of ALTs as NSTs makes this study more uniquely constituted and different from others which have been concerned more with the perspectives of either one or the other group.

Keywords: The Japan Exchange Teaching (JET) programme, EFL team-teaching, Japanese Teachers of English (JTEs) and Assistant Language Teachers (ALTs)

Introduction

A team-teaching approach that combines a native speaker teacher (NST) and a non-native speaker teacher (NNST) has become quite common in recent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EFL education in schools in Japan the use of team-teaching approaches conducted by a pair consisting of a Japanese teacher of English (JTE) and an assistant language teacher (ALT) who is a native English speaker has



been widespread as one of the major EFL education approaches. It has been led exclusively by a branch of the Japan Exchange Teaching (JET) programme in Japan since 1987. In addition, teachers' consciousness of the team-teaching setting has been enhanced due to the political education campaign; the Action Plan to Cultivate 'Japanese with English Abilities'¹,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most concentrated EFL reform so far in the EFL education history, operated for five years since April, 2003. After this campaign concluded in March 2008, the individual schools in Japan have been given th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own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EFL programme and its team-teaching. According to quantitative data collected from major stakeholders, NNSTs of English are crying out urgently for guidance to conduct successful EFL team-teaching approaches in corporation with NSTs of English.

Since the mid 1990s, research on NNSTs in foreign language has been received with increasing interest (Illurda, 2005) and various discussions about its scope have been explored (see Braine, 1999). At the same time, there has been a need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s in the use of team-teaching in Japan, which was instigated during the JET programme.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present multiple implication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opinions of JTEs and ALTs who are involved in EFL teamteaching in Japan.

Research purposes and method

The research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perceptions of NNSTs and NSTs in terms of their performance and the impact of the team-teaching approach in the EFL setting in Japan. In order to collect the data, 10 JTEs and 12 ALTs on the JET programme were approached by personal invitation, email and/or telephone. At the time when the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all of these participants were teaching EFL in schools in Japan. Individual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in the participants' respective first languages and tape-recorded for subsequent analysis². The interview questions were made available to the participants so that they could prepare general outlines and comments about their perceptions.

The Japan Exchange Teaching (JET) programme and pos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am-teaching

The JET programme is organis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Japan and the other related authorities such as the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MIC),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OFA),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XT), and the Council of Local Authoritie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AIR). It commenced in 1987 with the objective of enhanc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Japan by promot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Japan and other nations. In particular, the programme aims to enhanc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Japan, and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t the local level through fostering ties between Japanese and foreign youth.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positions available on the programme; Assistant Language Teacher (ALT), Coordinator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IR) and Sports Exchange Advisor (SEA) (JET Programme, 2007).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is ALTs and their JTE partners.

The team-teaching enables the teachers to excel in creating a great impact and stimulation in their class. This unique landscape may create a setting that is both planned and spontaneous, which causes an interaction in a more proficient manner than the one formed solely students for conversation purpose (Hasegawa, 2004; Page, 1997). In addition to these benefits of the team-teaching approach, this study identified some others. The presence of the ALT team-teaching enables the JTEs to provide further opportunities to use English more frequently in their schools (JTE1, JTE2 & JTE3), and the non-EFL staff to develop an interest in the culture of the ALT's home country that does not have to be restricted by the school's hierarchical system based on age, and teaching experience, background and gender



(JTE4). Another benefit can occur when a pair conducting the team-teaching comes to be regarded as two instructors existing in a single class. This means that one can lead the lesson while the other concentrates on monitoring the students (ALT1). In spite of these various benefits as well as the system of the JET programme having been viewed as successful by Neustupny and Tanaka (2004), there was also a wide range of constructive criticism given about what needs to be done to improve the EFL team-teaching environment in Japan (McConnell, 2000).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programme further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Critics 1: productivity or temporary pleasure

It may not be legitimate for JTEs to expect the ALTs to conduct their teaching in a professional manner because most ALTs in the JET programme have obtained neither teaching qualifications nor sufficient knowledge of school work. In addition, remarkably, most of them have not worked on a full-time basis, since coming to Japan on the programme immediately after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Commenting on the fact that it is common for some teachers to stay and work until approximately 7 o'clock in schools in Japan, ALT2 pointed out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ism of most other ALTs in Japan, while commenting on the fortunate situation for the ALTs that they can possibly leave school much earlier³. There was some comment that the ALTs irritate their JTE partners due to their non-professional attitudes, especially lack of punctuality, in a culture where punctuality '... communicates respect and efficiency and tardiness disrespect and inefficiency' (Nishiyama, 2007, p. 219). 'Some ALTs began working at the very last moment. ... As I keep telling them, they usually get adjusted, though. [At the first stage of their appointment] they are not aware of these issues' (JTE1).

Lack of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is distinctively reflective when one faces actual interactive situations, such as an ALT in the classroom. Despite the observation about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the classroom discipline and management by the team-teaching in the JET programmes (Neustupny & Tanaka, 2004), most ALTs may lose their focus easily when they encounter unexpected circumstances, which is largely affected by their minimum teaching capacity, as was pointed out by JTE1 and JTE5.

There are some cases in which many students are difficult to control. It is hard to control students. It is about shitsuke (class discipline/management). When I discipline students in an English class, they are apt not to speak [for the rest of the class]. Sometimes I do not want to use Japanese and disturb the lesson [which is mainly conducted by the ALT] so shitsuke becomes difficult. The problem is whether to put emphasis on the outspoken atmosphere or not. I can [easily] scold the students in Japanese, but the ALT is there [and the class is provided with a great chance to encounter the native speaker of English], so the timing and how to do so is difficult. And sometimes the ALT is unaware of the reason why students are being quiet [when they are so after having been scolded]. (JTE5)

Many ALTs indicated the importance of focusing on the students' misbehaviour during the teamteaching. ALT3 commented,

Of course, students sometimes think, because it's an English class, they can say anything [and] do anything. So they are like, 'Oh, free talking time!'. And they start screaming, like English means total freedom. And that's really not true. So that's an important lesson to teach. Just because ... I am from a different culture and I have a different value doesn't mean no rules [are expected] in my class. (ALT3)



To several ALTs interviewed for this study, issues with general classroom discipline did not seem to have been considered carefully by JTEs in some instances. For example, ALT4 recalled the first time she was in the class and was amazed by the JTE's poor ability to handle disruptive students, such as allowing them just to sleep in class and giving paper to students who turned up in the class without any papers, hoping her JTE would realise that this should be his responsibility because of their students' language and/or cultural barrier with her.

As JTE5 commented, '... Being harmonious and having fun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it is a fruitful lesson'. A class that is well controlled and disciplined in a satisfactory manner should be a measure of a collaborative team-teaching performance of both ALT and JTE. However, some JTEs and ALTs rely on each other to take the role of the class management and fail to draw the appropriate line between progress of the lesson content and having fun in the lesson. ALT5 confessed her vexing belief that class management is theoretically the JTEs' responsibility. From practical perspectives she insisted, however, that strategies for class discipline, especially for particular trouble-making students, should be developed in discussion between the JTE and ALT, rather than leaving th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to the JTE only.

Multiple school visits

A poor team-teaching performance arising from discipline issues derives not only from the JTEs' and ALTs' insufficient classroom management skills but also from the working conditions provided by the ALTs. In most instances, the ALTs are required to visit multiple schools within a short time period and to conduct the team-teaching with multiple JTEs. Their team-teaching performances with JTEs will often be unsatisfactory due to the ALTs' unfamiliarity with the ongoing EFL curriculum, lack of

knowledge of the students' study progress, elements introduced in the past, flow of the lesson, general students' EFL levels and even each student's characteristic element (JTE5, JTE6 & ALT6). It should be accentuated that if this is neglected the outcome can be that '... the risks always go back to students [and appear as their poor English performance] at the end' (JTE5). 

Despite the fact that JTE6 wished for one particular ALT to stay at his school for a long term period,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is simply incapable of allocating one to each school in Japan for a particular long term, because of the declining number of ALTs in the JET programme. Most of the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s in one particular prefecture are conducting team-teaching in their EFL programmes not by having an ALT from the JET programme but rather an ALT who has been sent by some privately operated temporary staff agency. JTE3 is one of the JTEs who confessed her annoyance that the same ALT was not allocated in her school for a longer period, with the result that students in her school may have an ALT in their class once a month. She did not mind this circumstance as long as she continuously had one particular ALT for a longer period, irrespective of who employs the ALT. Rotation or circulation of ALTs in the JET programme among multiple schools obstructs any stabilised relationship with either the JTEs or the students. ALT6, ALT7, and ALT8 all commented on this, and mentioned the fact that it takes time to break through the students' inhibited manner in EFL class and with various staff members in the staffroom in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s, especially in Japan where people are generally not that talkative⁴.

Critics 2: pressure to complete set-up tasks and create visible outcomes

The content to be introduced in each class is supposed to be scheduled meticulously, overseeing



the aim of the week, the term, and the year. And in most cases students' achievements are judged by several formative assessment tasks such as daily/weekly assignments and the vocabulary quizzes, and summative tasks such as a mid-term/end of term written and/or oral examinations. In the longer period, most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are likely to compare their students' achievements with the benchmarked academic standard and requirements such as the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the same manner, high school teachers benchmark with the university/tertiary entrance requirement. This trend creates dilemmas for JTEs regarding their team-teaching approaches. JTE2 noted that '... teaching resources [especially for the 3rd year students] are targeting the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s so it becomes complicated. So team-teaching itself becomes more difficult; lots of time is required [to prepare]. Similarly, JTE7 commented that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shingakukoo* (schools including high percentages of their students advancing to well-known and reputable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English conversation is not taken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It has been put aside in order to let their students get high marks in the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s'.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s many will agree, JTE4 commented, 'Oral, grammar and reading aspects should not be separated but should be taught properly as an important segment. I wish they would be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considering that each of them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however, JTE4 said, 'I wish I had some more classes for reading and structures (grammar) only'. The above statements seem to be contradictory, yet this depicts the most common scenario of the current EFL education in Japan, and it is unlikely that it will change unless there are majo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s made in the whole educational structure of primary school, junior high school, senior high school and tertiary education. Moreover, one of many JTEs' dilemmas is represented by JTE8's comment below. Sighing occasionally, she told the fact that the study based on the textbook itself is not enough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prefecture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standardised in her prefecture.

There is a huge gap between the elements introduced in the textbook and requirement for the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 [Anonymous prefecture's] high schools entrance examination consists of four sections; listening, many long reading passages, English compositions, and a lot of vocabulary. There are three large, different, long passages, so that examinees have to read rapidly. There are many questions such as writing the content of the long passage in Japanese. Generally, we are focusing on the Action Plan to Cultivate 'Japanese with English Abilities', while the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is not. ... While that gap worries teachers and students, students are undertaking jitsuryoku test (pre-entrance examinations) in term 2. ... Unlike enjoyable English learning at school [with ALTs] and satisfactorily scored mid-term and end of term examinations, they cannot obtain enough scores at the Jitsuryoku test at all due to those many long reading passages. (JTE8)

Authority's challenge - *kenshuu* and conferences

Authorities have already been engaged actively in handling various obstacl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team-teaching in the JET programme. The workshop for JTEs called *kenshuu* is one of the strategies to have been introduced. JTE8 explained that the *kenshuu*, running for two days, caused JTEs' annoyance, in terms of its timing. *Kenshuu* which was originally held during campus festival seasons in autumn in Japan, was re-scheduled to February three years ago due to the request of many JTEs. However, this has backfired because it has given JTEs' even more cause for complaint.



But it is also a hectic season due to shinro [-shidoo] (counselling on students' coming year plans/future course/careers), [I am reluctant to attend kenshuu]. ... Attending the Chuukan kenshuu (mid-term workshop) is so much fun. Talking to ALTs and seeing those from other countries who are engaged actively is enjoyable. But attending the two-day-session leaves all the school duties and tasks behind, which is a burden [after coming back to school]. School teachers are required to spend lots of times on those extra tasks, and as a result, we lose more time to spend for on our particular teaching subject. I really think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the authorities] to consider. (JTE8)

Kenshuu seems to be concentrating excessively on the orally motivated team-teaching lesson only, which results in the lack of instances or demonstrations of team-teaching tactics being applied in the lessons in which the emphasis is on reading and/or writing skills. None of the ALTs participating in this research interview, in fact, indicated either that they had tried to improve these skills or that they employed the textbook-focused approach in the team-teaching lesson.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organise constant/coherent activities ... [for a long term period]. I can use the knowledge acquired in kenshuu for a couple of lessons. [A satisfactory lesson] is time consuming and ... there are various tasks to complete especially if you are a classroom teacher. I do not feel like utilising [the knowledge learnt in kenshuu] fully in my case. (JTE2)

I believe there is a variety of usages of an ALT, not only oral and conversation sessions but also the usage of an ALT in writing sessions should be considered more. In fact I have had an ALT in my former school and sometimes in this school too. We should make use of the lessons with an ALT for writing; essay writing and creative writing more often and develop it further [in the future]. (JTE9)

Individual challenges - Uchiawase



In order to prevent team-taught lessons from turning into an unprofitable 'play time', JTEs and ALTs should set regular times for discussion/meeting, *uchiawase*. JTE2, JTE4 and JTE6 pointed out the crucial roles of the *uchiawase* which enable both JTE and ALT to confirm the goal of each lesson and various strategies to achieve it. Some ALTs' comments responding to such suggestions by the JTEs' agreed that the *uchiawase* could contribute to successful team-teaching, because talking together about something fundamental such as weekly topics enables them to draw a picture of the target lesson which makes them feel easily able to prepare in advance (ALT4), and it gives them assurance that the English instruction which is supplied to students and the JTE is clear and simple enough (ALT1). Furthermore, the ideal *uchiawase* also includes clarification of both the JTE and ALT's roles at each stage in class. JTE4 pointed out that using Japanes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ALT in front of students in a team-taught class is not denied as long as it is done with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its timing. Considering the pronunciation, JTE9 highlighted an intriguing point; JTEs tend to consider that they may leav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oral communication classes, including pronunciation or conversation [in English], to the ALTs.

Clarif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each role in class clearly influence the smoothly organised and implemented team-teaching approach. This philosophy is supported firmly by not only those JTEs but also ALTs. ALT1 below represents the majority of the ALT's comments.

For me the main negative thing is ... a lack of clarity about who has what responsibility. There is so much in the classroom, leading the lesson in general. ... But [when I was] leading





[the lesson] last year, sometimes I was not sure. I wanted to be fully [responsible] and then sometimes if I took control of the class, in fact that I wasn't being as respectful to the teacher as I should be. And the other time, if ... a teacher had an idea and I kind of just... stood there and [was being] just a kind of parrot and did exactly what the teacher told me to do, and [did] nothing more than that, I wasn't pulling my weight. (ALT1)

Despite its obvious benefits, sufficient time is rarely allocated for an *uchiawase*. Among the ALTs who complained about having few opportunities and insufficient time to talk to their JTEs, ALT3, who was in the last year of her extended contract in the JET programme, observed the recent change of her JTE's attitude towards *uchiawase* on which less time had been spent.

Especially when I was new [uchiawase was very important]. But I've been here for a while now. So I guess, sometimes you go to school and they say, 'Oh she's got experience'. Like they are seeing me now like 'Oh, she can teach'. So they just don't wanna worry about it. They are busy so they are like 'OK, you can do it easily!' That's what has happened to me a little bit. (ALT3)

The acknowledgement of its importance does not generate the regular *uchiawase* between JTEs and ALTs in most cases, due to a range of unexpected interventions. They turn into extra tasks for the JTEs in addition to their regular duties. JTE4 regrettably analysed that her current situation to prevent regular *uchiawase* was caused by over 80% of her work being devoted to administration tasks outside English teaching itself. A wide range of problems was discussed, including *seikatsu shidoo* (students' daily life guidance), *shinro shidoo* (counselling on students' coming year plans/ future course/ careers), new tasks introduced for the new school year, creating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ests, etc. Issues linked to *seikatsu shidoo* and *shinro shidoo* are commonly accepted as part of a homeroom teacher's duty in Japanese schools where there are no counsellors in psychology or provisions to discuss students' future/after graduation plans.

In the unique case of JTE9, the reason why those *uchiawase* could not be organised sufficiently with that, unlike the official notification that he would be in charge of second-year classes, he was somehow appointed as a first-year teacher in late March5. This short notice meant that he had been in a state of chaos until early April disregard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certain period of time to be spent for the yearly lesson preparation and resource development.

Critics 3: respective strength and rapport

All of the JTEs and ALTs wish to have a close and respectful relationship with each other. With such a belief, most of them attempt to foster such professional rapport in order to support each other, but some failed to do so because of various factors. It is especially vital for a JTE to show some respect towards his/her ALT as an educator at an equal level because ALTs are likely to consider themselves as inferior to the other Japanese staff members in the school. The comment below was voiced by ALT11, who had completed her degree with a Japanese language major at university before coming to Japan on the JET programme.



How we relate to each other. It's not really about teaching. It's just how we relate [at the] social level. I feel that she doesn't respect me as a, like an equal sort of person. ... I know that I am not a teacher. But I feel like I am a kind of treated as a child sometimes with regard to often telling me what to do [and] what to not to do and stuff. So that has been a problem. It's been difficult because I feel like I am always being told what I can't do rather





than what I can do, [there is] more I can't do. (ALT11)

Then ALT11 began explaining about her professional behaviours and attitudes which were pointed out frequently by her JTE, such as using a red pen for sentence corrections, order in the worksheets, not wearing perfume, or coming to school a bit earlier so that she should not arrive on time or just before the lesson begins. Apart from such basics, what frustrated some ALTs further was that they did not figure out what they should know as ALTs as well as inexperienced teaching staff members in the school (ALT11 & ALT12). Also, some ALTs' ability to speak Japanese might be lower than what was expected and considered by their JTE partners (ALT11 & ALT12).

The fact [that] I can speak Japanese doesn't really mean that I can understand Japanese. ... If I am doing something wrong, people like, you know, look at me and like, 'You are doing something wrong!' and they don't tell me. I am not gonna know - even [though] I can speak Japanese, I am not Japanese. So I can't know everything about ... like Japanese customs and things. I know a lot of things but not everything. ... I think I should definitely have to ask but not all the time, like people ask me and tell me as well as me asking them and telling them. I think more communications would be good between ALT and teacher. (ALT11)

Walking voice-player

The ALTs' self-respect and sense of equality with their JTEs can easily be lost by repeatedly exercising their main tasks, such as pronouncing certain vocabulary or expressions in front of the class. These tasks, because of their simplicity, tend to be a tedious routine, which may lead ALTs to consider themselves as 'voice machines'. This will be likely to happen as ALTs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ir daily living environment and their first school environment and confident with their work duties. However, ALT4, ALT6 and ALT11 pointed out that this, in most cases, cannot lead to any special actions but can help them to carry out their roles patiently and quietly.

These cases are partly the effects of the ALTs' self-confidence after spending some time in the teamteaching environment. Lack of recognition by JTEs may damage the respect of the ALTs critically. Acknowledging the JTE's attitudes towards her, ALT10 indicated that she was expecting more trust and respect from her JTE partner. ALT10 found her to be passive progressive, at an equal level as a teaching staff member in the school. It is intriguing to note that some JTEs are not fully conscious about this point because the following uncomfortable situation was also caused by the JTE's manner towards her teaching partner. ALT7, a native speaking teacher, acknowledged that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to Japanese is occasionally necessary when students have difficulties following the class. While highlighting this, she still believed her JTE partner needed to change her attitudes and concepts towards team-teaching. This was particularly evident when she saw students becoming confused when listening to her JTE partner utter some English words oriented in the pronunciation of Japanese Katakana syllabic writing. A number of foreign originated words are usually learned and memorized first by novice learners of EFL, so the learning of English primarily through the Katakana phonetic patterns may obstruct the process of acquiring the English phonetic system (Makarova, 2004). ALT7 regretted having hinted to one of her JTE partners to discontinue that obvious incorrect English practice in class. She sensed she might have offended the JTE, while she still hoped for her JTE to follow her suggestions afterwards in the future lessons.

When students do not understand, JTEs try to translate into Katakana English. ... If I say a word like dog, they won't translate that into Japanese but they translate it into Katakana English



for the students, like doggu. So the students copy the Japanese teacher. I feel that's totally against the point of teaching proper pronunciation. ... JTEs feel like the students understand better by saying it in a Japanese-English way. But it's not very productive for students, I feel. (ALT7)

ALTs' awkwardness could be observed further in relation to the hierarchical system within schools in Japan. A unique experience was revealed by ALT3, when a new teacher was appointed in her school. It was this new teacher's first ever teaching position so there were occasions for ALT3 to teach her about their school life. This, however, made ALT3 fall into an uncomfortable position because she was an assistant with no teaching qualifications and no great confidence in her ability in the Japanese language, which naturally made her status lower than her JTE partner as well as the other regular teachers. Instead, ALT3 partly and modestly taught the new teacher about general school duties and routines from scratch. She made use of her slightly older age than the new teacher and her longer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greater familiarity with the target school life as a staff member. However, her understanding that her status was lower than any staff member in the school made her feel awkward and hesitant to respond to any enquires coming from the new teacher.



ALTs's isolation

ALTs expressed their concerns about their level of communication not only with the JTEs but also with other non-EFL staff in their schools. ALTs are given a plenty of non team-teaching free time in their schools, which can eventually lead to a sense of isolation. As revealed by ALT3, ALT5 and ALT6, ALTs can easily become bored during school hours and feel that they are being left out of the group of staff members. Those ALTs are fully aware of the fact that those staff members do not speak to them much because they are usually so caught up in their own busy schedules and do not have enough spare time left to share with the ALT. Observing an ALT in such an isolated situation, JTE6 expressed his view that non-EFL teachers, especially those who share similar ethnographic backgrounds such as age and gender, should accept ALTs more actively in order to demolish invisible hurdles existing between JTEs and ALTs at a social level.

The closenes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EFL staff members and the ALT can also be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non-EFL staff members' English ability, their personality,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welcoming and accepting the ALT as a vital member of the school staff rather than a temporary visitor. This has to be treated with great care, because if ALTs wish to be treated as non-visitors to the school, then they should also make an action to approach those various staff members in the school. In this case, again, language as a medium can be a barrier. JTE2 expressed alarm about potential conflict, citing the example of her former ALT who was persistently speaking Japanese, and commented that the JTE and ALT need to have a sufficient and coherent discussion about their language use outside the EFL class.

There is an ALT who felt that he was not recognised as a human being but only an English speaker. I feel like I understood that. But ALTs can earn their salaries by speaking/demonstrating their English. I had some difficulties like that. (JTE2)

JTE2 admitted that this ALT had not had any experience with the Japanese language before he came to Japan on the JET programme. This contributed to further conflict between them as well, concluding that maintenance of the ALTs'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cultivation of rapport, and respect



for each other are very difficult to build, especially in a simultaneous manner.

One particularly intriguing case described by JTE8. Alth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Ts and non-EFL staff became dysfunctional,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each other's groups gradually improved as time passed by. They were fully aware of the dysfunctional system but made spontaneous actions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situation successfully. Still, JTE8 accentuated that JTEs nee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f liaison between ALT, non-EFL staff, and their students in order to help to create a harmonious rapport.

Not all ALTs necessarily have teaching experience. In fact, there are more ALTs who do not [than those who do]. There are ALTs who like or dislike contacting people, and those who let me think that being an ALT is the reason for coming to Japan. In these cases, JTEs have a very hard time establishing posi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LTs and students, and ALTs and other teachers. I had an example like that in recent years. (JTE8)

There is a tendency that JTEs and ALTs do not implement any particular strategies, but leave the situation of the ALT being isolated as it is, expecting a third person's assistance, although some ALTs, in fact, do initiate actions such as discussing the matter with the prefectural advisors or other ALTs on the JET programme.

Discussion and implication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present implications, led by an analysis of the opinions of JTEs and ALTs who are involved in EFL team-teaching in Japan. Main findings of the problematic elements from JTEs and ALTs perspectives were revealed in the three categories; (1) productivity or temporary pleasure, (2) pressure to complete set-up tasks and achieve outcomes, and (3) respective strength and rapport such as the above. In this section,

therefore, possible multiple implications will be suggested.

Implications for (1): classroom management and discipline

Scale and quality of the classroom management and discipline in Japan can be varied according to the stage. Generally speaking, Japanese children at the pre-primary stage are neither disciplined nor well-behaved. This attitude transformed drastically into the opposite at the stage of primary school throughout the whole of Japan. Nevertheless, behaviour of those at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senior high schools depends heavily on each school. According to the Wakazono (2001)'s research based on survey collected from 203 teachers from primary school, 109 from middle schools and 54 from high schools, 25% of them expressed their experiences in the problems linked to the classroom managements. Possible causes include 'a)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who are not disciplined by their parents at home (77%), b) a decline in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t home (71.9%), c) a decline in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51.1%), and d)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d stress (45.1%)' (cited in Sakui, 2007, p. 43)6.

Most JTEs and other Japanese teachers tend to rely on personally and empirically cultivated guidelines rather than collecting expertise knowledge and strategic plans in order to minimise the management problems. It may not be logical for ALTs to seek solutions from their JTE partners with the class management strategies based on such individual experience.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wish to obtain the teaching certificate in Japan usually have to undertake a unit consisting of sessions held before and/or after the teaching practicum, which do not fully cover the practical issues of class management problems, and participate in the teaching practicum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a





teacher who has been on the teaching practicum under identical conditions as above for the period of two to eight weeks. In other words, most current JTEs are also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attempting to foster their own confidence and tactics. This might be the answer for ALTs who are faced with JTEs have difficulty controlling their students' misbehaviour.

Nevertheless, the JTEs'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might be responsible for overcoming a lack of confidence in the ALT and improve a poorly managed class. Naturally the producti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JTE seems to be the only, but valuable, solution for an ALT. An undisciplined class tends to create a situation in which both the JTE and the ALT find it difficult to draw a clear line between the vital oral exercise in English or recreation time using English in their team-teaching. Thus they should take care to interact and communicate constantly with each other. It was intriguing to have identified that most JTEs in the interviews agreed with the integral part of the discussion with their ALTs, in the pre-lesson discussion and spontaneous confirmation in mid-lesson but entirely overlooked the post-lesson discussion.

The multiple school visits required by the authorities cause ALTs further pressures and frustration. This chronological phenomenon, and one of the major problems encountered on the JET programme, prevents ALTs from forming a bond with students and colleagues in their school. This type of impediment can be addressed by a helpful solution, which is that JTEs invite ALTs to observe some non team-teaching lessons. In this situation, ALTs should not necessarily be required to do anything specific but are more likely to concentrate on observing the lesson itself. Ideally, however, the lesson observation opportunity should occur over one week before the role of ALT commences (Page, 1997). This helps the ALTs to be equipped with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has been covered previously and of the students' EFL levels in the target class. It also give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que rules, culture and habits in the class and the whole school, while processing Schon's knowing-in-action learning which is '... the learning of specific language, conventions, knowledge and patterns' (Nicholls, 2006, p. 166). Consequently, this type of active engagement reduces the ALTs' spare time which is usually spent alone in the staffroom. Some might raise the concern that this could become routine activity which tends to be monotonou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stimulation, there are five applicable patterns such as (1) following one teacher one day, another teacher another day, (2) following various teachers on the same day, (3) observing a range of ability groups within the same year group, (4) integrating observation with some "in-class" support, and (5) following a class through a morning of lessons in different curriculum areas (Page, 1997). It is crucial that both JTEs and ALTs are engaged actively and enthusiastically with each other in order to systemise this period of induction in school and '...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standing regarding the intellectual act of teaching and how this can be enhanced and as a consequence of such enhancement improves student learning' (Nicholls, 2006, p. 166).

Obviously it is important for teachers to speak English just normally. But the best JTE I had ... was like, [he] had me to speak English in class but, [he said], 'I like having you to come to my class because obviously you are foreign and an English speaker. So you are the reason that I have to speak English. When you are not in the class, it not natural to speak English in the class.' And that was great. That was really great to hear, because I think that's a good reason. That's a good justification for the JET programme. When there is a foreigner in the class, there is a reason to speak English in the class. (ALT3)

I think it's also beneficial for me to come to classes where the teachers are teaching by





themselves. But I am there for pronunciation and to help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and even just to observe the teachers to learn about how they teach. Also ... I can get to know the students a little bit and ... [it makes it] easier [for me] to follow the curriculum. So then [it] ... gives me more information so I can better plan the lesson in the future. ... I think with teaching in general, it's important that [there is] some kind of relationship with students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it. And usually I feel like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my students, because I just don't have enough interaction with them. Especially in one of the schools, they have invited me to more classes. If I go to the same class a few times, I start to recognise the students, and I know which students might need extra help or things like that. So I can feel [I am] a better teacher, you know. Usually..., almost every class I go to, it's like a classroom with strangers.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at. I don't know how much English they know. I don't know which one is good at English and which one is bad at English. I don't know which one loves English or hates English.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m. So it's hard to teach someone that you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ALT6)

Implications for (2): development of approaches and significance of constant liaison

JTE1 and JTE8 segregate their own lessons; those in which the team-teaching approach is engaged and others paying attention to particular aspects. Although the landscape of 'exam-oriented grammar and translation-focused core English teaching, stay unchanged' (Smith & Imura, pp. 39-40) and the values of the team-teaching with ALTs regarding students' communicative ability might not increase, their uncomplicated strategies may be essential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balance between four macroscopic elements: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But there are some certain points to progress regarding reading and writing, so I should set them up, maintain the pace of the lessons, and adjust the lessons using resources focused more on reading/writing [in order to reach them]. (JTE1)

While they are in school, I try to introduce games and some activities. But the [presence of the ALT] slows the pace and progress of textbook teaching. So ... when they are not present, more writing tasks are introduced. (JTE8)

It can be suggested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se data that ALTs are currently not fully utilising their value and roles especially during the examination season. One of the typical examples can be discovered from ALT7's comment;

Some schools keep me very busy, so I teach 15 lessons a week. And some schools ... barely use me at all, and I'm used a few hours a week. So it depends on which season, which [has the] exam period Some schools don't like to use the native English teachers if it's around exam time, which I really don't understand. (ALT7)

Although the compulsory examination system including an oral component in each school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seems to be only an articulate tactic, this might be unrealistic for the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s, especially the centrally organised examination in Japan, which attracts over 500,000 examinees each year (The Daily Yomiuri, cited in Guest, 2008). Nevertheless, it is possible to establish the vital part of the students' English communication ability in the end of each term examination in each school. Urgent systematization of compulsory oral testing in each school, which can be derived from an authority such as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XT), will largely influence the attitudes of JTEs towards the usage of their ALTs through the whole school year





including the examination season. So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examination system including the assessment of oral interactive ability, is demanded urgently in order to tackle this problematic issue.

In addition to this, textbook team-teaching styles should be required and encouraged more by demonstrating the potentials and benefits to improve not only students' oral skills but also others such as reading and writing. Accordingly, the authorities, in fact, describe the benefit of engaging with the team-teaching for textbook centred lessons as well. However, many JTEs seem to believe that the team-teaching is to be organised for the purpose of oral communication only or that they cannot afford to introduce it in textbook-based lessons due to the numbers of tasks that have to be achieved, as discussed above. Such conceptual dilemmas existing between JTEs and the authorities can be discovered clearly from ALT9's comment below.

[At the kenshuu] We had to create a lesson plan to share with the group [and] they asked us to use the English-1 textbook. But most of us do not teach English-1 classes. We teach oral communication classes. ... [So I thought,] 'Great. We made a lesson plan that we can't use. Now we are going to share it'. That's useless. That was the first day. And on the second day they taught debate in the classroom. ... Maybe [it is] a nice idea. But in my school, there is no way we can use debates, because they can barely put [English words] together in a sentence. (ALT9)

In special intensive training sessions such as *kenshuu*, from which participants naturally expect to gain further knowledge and skills, it is essential to demonstrate clearly the commonly prevailing idea, which is that the team-teaching can be employed only for oral communication focused lessons and to scrutinise further the cause of this among JTEs, and the authorities.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JTE and ALT participate in the meeting together and discuss the carefully prepared and guided lesson plans and aim and achievements on a daily basis. The consistent discussion helps ALTs to clarify and understand the JTE's intentions, and the weekly, monthly and term basis aims at optimising student achievement. Despite the productive *uchiawase*, some lessons do not gratify either the JTE and ALT or the students: 'It could be my excuse as a JTE, but there were some cases when I relied too much on the ALT or I could not put my teaching intention into the ALT's lesson well' (JTE9). Various researchers, including Brandt (2008), Nicholls (2006) and Scrivener (2005), found that lesson evaluations done through a mentoring process are highly influential on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the question arises as to where self-evaluation and/or after-lesson commentary are demonstrated in some way.

This research discovered that while there are many JTEs and ALTs who insist that the *uchiawase* organized prior to the lesson is essential for successful team-teaching, regular but informal back-up reviews and critique sessions tend to be neglected entirely. After having admitted that reviewing does not usually occur after each class, JTE4 considered it as being potentially more beneficial than previewing the lesson for the team-teaching itself since one can identify the positives and challenges clearly. ALT1's comment below echoes that of JTE4, while ALT10 indicated that she could have improved her distant rapport with one of her JTEs if she had obtained clear comments afterwards from her JTE regarding each team-teaching lesson.

The teachers... never said to me, 'I want you to do this', '[You are] not doing this properly', 'Please change this'. I've never got that kind of feedback. If I am working in an Australian school,





I know that I get a lot more criticism if I haven't successful lessons. In Japan, in this school, the teachers never criticise me and actually I find it incredibly frustrating. Sometimes I want criticism. ... I don't think ... something has to [be held] after every lesson. But... it should be possible to have the discussion if either the ALT or the JTE is not 100% satisfied with something. (ALT1)

I guess it's because she could have given me criticism that was helpful. But she never gave me helpful criticism. She would just say, 'This is wrong', or ... even not say, 'This is wrong'. She would imply that was wrong, and this would make me feel like, 'Yes, something is wrong'. But I didn't know what the problem was. I think that's Japanese culture, though. Right? So that was hard to deal with when I first arrived. Now I think I am used to it. But I still get frustrated with the same person for the same reason. Now I feel like she is just deliberately making me feel like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even when I don't think there is actually a problem. (ALT10)

Both JTEs and ALTs should be aware of the critical role of the concentrated feedback and reflections provided by each other after the lessons.

Implications for (3): overt indication of each other's role

ALT6's decision to return back to her home country rather than renewing her JET programme contract for the second year was mainly due to this feeling of uselessness which arose from her large quantities of free time in the school. With full awareness of such conflicts, JTE10 has developed his philosophy of '... providing the opportunities for them to rustle and play an active part' (JTE10). And this has resulted in all of his former ALTs having renewed and extended their contracts at least once during their maximum three-year stays in Japan on the JET programme.

I heard that there was an ALT who had read one book per week since he/she came to Japan. So to speak, he/she was not given any tasks. There are many cases in which ALTs feel lonely or so forth and go back to their home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of their contracts. ... My policy is to make use of the ALT as much as possible. That is their task and one of their purposes to be in Japan. (JTE10)

The inactive approach of ALTs certainly creates a distance from the other staff in the school, and vice versa. In order to activate themselves, they need to obtain personal comments and appreciation from each other. The acknowledgement from JTE to ALT, for example, may be regarded as the sign of the JTE's respect towards the ALT. Yet, how many JTEs make this action, as well as how many ALTs clearly indicate their respect to their JTE partners in return? Lack of interactiveness contributes to the ALTs' sense of incapability and the loss of self-esteem. Most ALTs usually remain passive and patiently accept the given unsatisfactory situations (ALT1 & ALT6).

ALTs also need to alter their attitudes and make their own efforts to access non-EFL staff and students (JTE8 & ALT12). For example, ALT2 and ALT12 purposely invested their spare time in creating further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colleagues after school, such as staying late with other staff members and having some more time to interact when the stress of the day had faded away, or helping or observing after-school club activities, while ALT3 greeted incoming students outside the school after arriving relatively early every morning, or JTE8's former ALT helped her students to clean up the classroom during the daily scheduled clean-up time. Asking the JTE to join in the non team-teaching EFL class could also be beneficial. For example, ALT6, as mentioned earlier in this paper, enjoyed demonstrating and correcting some pronunciation and walking around the class to field students' concerns or questions





spontaneously under such a stress-free and responsibility-free atmosphere. These tasks are all out of responsibility, yet certainly result in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JTE and ALT, as well as students.

Mutual understanding can be enhanced by the ALTs showing clearly that they would like to become a part of the team and to implement these active engagements. To take initiative for an action rather than waiting for another's offer or suggestion, seems to create the sense of belongingness (McConnell, 2000). Building this kind of relationship does take time for ALTs to understand (JTE8 & ALT2), but may be the key to success for the future team-teaching. Below is the case of ALT10 who failed to apply this theory in the early stage of her contract and subsequently wanted to provide a warning to the prospective ALTs in the JET programme.

Say, trying to make a better friendship with work-colleagues and spend some time outside the work. So when I first got here, everyone was really interested in me. They said, 'Oh we used to go to all the ALTs houses for dinner'. But I never invited them around to my house for dinner. Never. I went out to dinner with a few teachers. But I never invited anyone around to my house. But that's because when I first arrived here, I was so involved in other JET activities with other JET [participants]. ... [They were] social gatherings with other ALTs. ... It was like a big party for the first year. So in my first year here my work life was so bad. Actually after I worked every day, I didn't wanna spend any more time with Japanese friends. So maybe I missed the chance when I first arrived to make a really good strong friendship with my colleagues, especially English teachers, because I just wanted to go home and get away from the school. Maybe I should have been trying hard to be involved. (ALT10)

Conclusion

It has been over two decades since the first EFL team-teaching induced by the JET programme began in Japan. While several distinctive changes have been made, this study has demonstrated that both JTEs and ALTs have experienced vexations and that these have compromised the potential of the team-teaching in the programme. It should be accentuated that special concentration on the mutual perspectives of JTEs as NNSTs as well as those of ALTs as NSTs makes this study more uniquely constituted and different from others which have been concerned more with the perspectives of either one or the other group.

References

- Braine, G. (Ed.) (1999). *Non-native educators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ions, Inc.
- Brandt, C. (2008). Integrating feedback and reflection in teacher preparation. *ELT Journal*, 62 (1), 37- 46. *The Daily Yomiuri*. (2007, Jan. 20). p. 2
- Guest, M. (2008).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Japanese university entrance Senta Shiken based on a 25-year gap. *JALT Journal*, 30 (1), 85-104.
- Hasegawa, H. (2004). *Analysis of videoconference practice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Inaugural CL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LaSIC 2004.
- McConnell, D. L. (2000). *Importing diversity: inside Japan's JET progr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Neustupny, J. V. & Tanaka, S. (2004). English in Japan: an overview. In V. Makarova & T. Rodgers (Eds.),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the case of Japan* (pp. 11-28). Muenchen: Lincom Gmgh.
- Sakui, K. (2007). Classroom management in Japanese EFL classrooms. *JALT Journal*, 29 (1), 41-58.





SIFT <i>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i>	本期要目
法 学 动 态	➤ 新法解读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答记者问
	➤ 法治论坛 ✧ 国际经济法正面临挑战和机遇 ✧ 论我国保险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两岸直航面临的若干法律问题思考 ✧ 决议延期能解决索马里问题吗 ➤ 法学教育 ✧ 每位法律人都应该有点哲学品味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2008 年 12 月	第 8 期 [总第二十五期]

新法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人

就《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答记者问

《检察日报》记者 徐盈雁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有关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这是依法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维护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秩序,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社会风气好转的重要举措,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为帮助广大读者深入理解和掌握《意见》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制定《意见》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答:近年来,商业贿赂在一些领域和行业滋生繁衍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严重危害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危害党风廉政建设和社会风气。中央审时度势,决定部署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做好这项工作,既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维护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秩序的必然要求,也是预防与惩治腐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06 年 6 月 29 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有关商业贿赂犯罪的条款作了补充修改和完善,为司法机关及时有效惩治此类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由于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仍然面临许多法律适用疑难问题,实践中因有关定罪量刑标准不明确而影响案件办理的情形也时有发生。对于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商业贿赂犯罪的严重危害,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非常关注,迫切希望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结合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要求,在深入调研、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该《意见》。

《意见》的制定和实施顺应了社会发展要求,适应了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有利于依法惩治商业贿赂犯罪活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社会风气的好转,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问:《意见》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当前,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面临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较多,《意见》主要规定了七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明确了商业贿赂犯罪的范围;二是在明确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其他单位”范围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的认定;三是明确了医药购销、工程建设、政府采购等领域中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责任,特别是对医生“开单提成”等群众反映强烈的贿赂行为的定性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四是明确了商业贿赂犯罪的犯罪对象及其数额的认定;五是明确了商业贿赂犯罪中不正当利益的认定;六是区分了商业贿赂犯罪罪与非罪的界限;七是明确了商业贿赂犯罪共同犯罪的处理依据。

问:如何理解商业贿赂犯罪的范围?

答: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开展之初,对商业贿赂犯罪的范围存在不同认识,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专项治理工作的开展及其效果。从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及专项治理工作的要求看,商业贿赂犯罪并不局限于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而是涉及刑法规定的全部八种贿赂犯罪。因此,《意见》对此予以明确,有利于专项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及良好效果的实现。

问:如何认定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答:《刑法修正案(六)》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犯罪的主体范围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从而使“其他单位”的认定问题成为认定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工作人员的基础性问题。一般意义上讲,单位是相对于自然人的组织体,但并非所有的组织体都属于刑法中的单位。从司法实践看,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中的“其他单位”,既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常设性的组织,也包括为组织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或者其他正当活动而成立的组委会、筹委会、工程承包队等临时性的组织。这里的单位不包括从事非正当活动的组织。据此,《意见》第二条对“其他单位”的范围作了明确界定。

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的工作人员虽然都有一定的职务,具有职务上的便利,但所从事的事务并非全都属于公务,其职务便利有履行公务的职务便利和非履行公务的职务便利之分,因而就其主体身份而言,国有单位中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

《意见》第四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从文义上讲,其他国有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国有事业单位、国有社会团体等单位。

问:当前,医药购销、工程建设、政府采购等领域中商业贿赂犯罪比较突出,群众反映强烈,《意见》对此是如何规定的?

答:当前,在一些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如医疗、教育、招投标等领域,严重危害群众利益的商业贿赂犯罪较为突出,如医生“开单提成”,收受医药产品销售方以各种名义给予的回扣,学校中教师在教材、教具、校服或者其他物品采购中收受回扣,评标委员会组成人员在评标中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等,群众反映强烈。依法严惩这些领域内的商业贿赂犯罪行为,是专项治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发生在这些领域内的商业贿赂犯罪情况比较复杂,特别是相关责任人员的主体身份,理论上和实践中均存在不同认识。针对这些情况,《意见》区分不同情形,分别作出规定。特别是针对实践中分歧较大的问题,明确了医务人员、教师、评标委员会等组成人员构成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根据《意见》规定,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销售方财物,为医药产品销售方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教师,利用教学活动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教材、教具、校服或者其他物品销售方财物,为教材、教具、校服或者其他物品销售方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采购中谈判小组、询





价采购中询价小组的组成人员,在招标、政府采购等事项的评标或者采购活动中,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问:如何理解贿赂的范围及其数额的认定?

答: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贿赂的手法呈现出不断翻新的趋势。一些人为了规避法律,采用货币、物品之外的方式贿赂对方,有的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服务等,有的通过虚设债权、减免债务等方式增加对方的财产价值等。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贿赂犯罪由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权色交易,用设立债权、无偿劳务、免费旅游等财物以外的财产性利益以及晋职招工、迁移户口、提供女色等非财产性利益进行贿赂的案件频繁发生。对这样一些案件特别是采用非财产性利益进行贿赂的案件能否认定贿赂犯罪,理论上和实践中均存在不同认识。为适应新形势下惩治贿赂犯罪的客观需要,参酌我国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规定,综合考虑我国国情和司法操作的实效性,《意见》将贿赂的范围由财物扩大至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的数额认定,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为准。收受银行卡的,不论受贿人是否实际取出或者消费,卡内的存款数额一般应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使用银行卡透支的,如果由给予银行卡的一方承担还款责任,透支数额也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问:如何认定行贿犯罪中的“不正当利益”?

答:1999年“两高”在《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中对“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作了规定。这为司法实践正确认定“不正当利益”以打击行贿犯罪提供了依据。但是,由于社会背景的原因,该通知所规定的“不正当利益”的范围相对较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已不能全面反映有关领域中的实际情况,有些谋取与该通知规定的利益本质相同同样具有不正当性的利益的行为不能得到正确的认定与处理,实践中对此反映较为强烈。为适应惩治贿赂犯罪的客观需要,有必要对不正当利益的范围做适当的调整,即在该通知认为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提供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属于不正当利益之外,增加规定谋取违反规章、政策规定的利益,或者要求对方违反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的亦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同时《意见》还特别增加规定,在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商业活动中,违背公平原则,给予相关人员财物以谋取竞争优势的,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

问:如何正确区分贿赂与亲友正当馈赠的界限?

答: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崇尚礼尚往来,法律并不禁止亲友之间的正当馈赠行为。然而,一些犯罪分子在实施贿赂犯罪的时候,借馈赠之名而行贿赂之实,并以馈赠正当为其行为辩解。为正确区分贿赂与亲友正当馈赠,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意见》主要从以下几个因素的结合上进行区分:(1)发生财物往来的背景,如双方是否存在亲友关系及历史上交往的情形和程度;(2)往来财物的价值大小;(3)财物往来的缘由、时机和方式,提供财物方对于接受方有无职务上的请托;(4)接受方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提供方谋取利益。

问:如何正确认定商业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

答:司法实践中,商业贿赂犯罪常常以共同犯罪的形式出现,特别是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收受他人财物的情形时有发生。对于商业贿赂犯罪共同犯罪的认定与处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共同收受他人财物的如何追究刑事责任。《意见》区分了商业贿赂犯罪共同犯罪的三种情形,根据双方利用职务便利的具体情





形分别定罪追究刑事责任：一是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二是利用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三是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追究刑事责任，不能分清主从犯的，可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附：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印发《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为依法惩治商业贿赂犯罪，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结合办案工作实际，现就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商业贿赂犯罪涉及刑法规定的以下八种罪名：(1)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2)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3)受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4)单位受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条)；(5)行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6)对单位行贿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一条)；(7)介绍贿赂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条)；(8)单位行贿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

二、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其他单位”，既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常设性的组织，也包括为组织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或者其他正当活动而成立的组委会、筹委会、工程承包队等非常设性的组织。

三、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包括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国有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

四、医疗机构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采购活动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销售方财物，或者非法收受销售方财物，为销售方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医疗机构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销售方财物，为医药产品销售方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五、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在教材、教具、校服或者其他物品的采购等活动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销售方财物，或者非法收受销售方财物，为销售方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教师，利用教学活动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教材、教具、校服或者其他物品销售方财物，为教材、教具、校服或者其他物品销售方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六、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采购中谈判小组、询价采购中询价小组的组成人员，在招标、政府采购等事项的评标或者采购活动中，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采购中谈判小组、询价采购中询价小组中国家机关或者其他国有单位的代表有前款行为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七、商业贿赂中的财物，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费用等。具体数额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为准。

八、收受银行卡的，不论受贿人是否实际取出或者消费，卡内的存款数额一般应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使用银行卡透支的，如果由给予银行卡的一方承担还款责任，透支数额也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九、在行贿犯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行贿人谋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政策规定的利益，或者要求对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

在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商业活动中，违背公平原则，给予相关人员财物

以谋取竞争优势的，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

十、办理商业贿赂犯罪案件，要注意区分贿赂与馈赠的界限。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全面分析、综合判断：(1)发生财物往来的背景，如双方是否存在亲友关系及历史上交往的情形和程度；(2)往来财物的价值；(3)财物往来的缘由、时机和方式，提供财物方对于接受方有无职务上的请托；(4)接受方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提供方谋取利益。

十一、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收受他人财物，构成共同犯罪的，根据双方利用职务便利的具体情形分别定罪追究刑事责任：

(1)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2)利用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3)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追究刑事责任，不能分清主从犯的，可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来源：检察日报 <http://newspaper.jcrb.com/> 发布时间：2008 年 11 月 25 日

法治论坛

国际经济法正面临挑战和机遇

刘敬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国际经济法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2008 年夏秋之交，美国房屋次贷危机终于演变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的全面金融危机，影响迅即传遍整个世界，全球金融市场风雨飘摇，陷入自 1929 年经济危机以来最大的一场金融危机。





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是规范国际经济关系、保障世界经济稳定运行、健康发展的国际法制度,包括贸易关系、金融关系等在内的国际经济关系是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制度基础。各国学者普遍认为,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必将导致国际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而经济关系的变化势必严重影响和冲击现行国际经济法律制度,促使其做出相应调整和变革。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令各国政治家和学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奉行的全球性经济政策进行反思,国际经济法学界对于战后为顺应经济全球化进程而发展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也开展了一场全面反思。在这场空前浩大的反思过程中,有的学者对于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自由化体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金融监管政策、奉行金融自由化宗旨的国际金融制度及其基本法律原则、规则等提出质疑和挑战[1],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这场危机“是对过去近30年来金融自由化的一次大修正”[2],“是过去数十年经济全球化遭遇的第一次系统性危机”。[3]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经济全球化政策是否应当坚持并持续推进?国际经济法律制度中的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的宗旨是否还应当遵循?如何解决当前国际贸易、金融市场面临的制度性难题,并根据新的国际经济关系改革现行法律体制、重建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这些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已历史性地摆在世界各国面前。

在国际贸易领域,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前景实际上早已不容乐观,这场危机爆发之前,美、欧等传统经济强国或地区的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和政策取向日益明显,全球多边贸易谈判进程不断遭受重创。自2001年启动以来,如同马拉松一般的多哈回合步履维艰、进展极为缓慢。在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WTO决定于2008年7月在日内瓦举行G7(包括美国、欧盟、中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巴西在内的7个WTO主要成员)的贸易部长会议,旨在对于关键问题实现最终突破从而尽快结束谈判。但由于各方在涉及发展中成员农业特殊保障机制的问题上分歧严重,持续9天的此次日内瓦会议却无果而终。[4]与多边贸易谈判多次受挫相反,游离于WTO多边贸易体制之外的地区性优惠贸易协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却大幅增长,截至到2007年底总数全球累计已达380余个,WTO预计到2010年将达到400个,[5]大量的双边或地区性贸易协定影响国际贸易的程度和范围日益扩大,已对WTO多边贸易体制形成直接威胁。

在目前形势之下,加强WTO法律规则对各成员方的纪律约束、维护WTO法律体系的权威显得尤为重要,危机过后应当及时总结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根据国际经济关系新的调整 and 变化情况,进一步完善以促进贸易自由化为宗旨的WTO法律制度,提高WTO多边贸易体系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为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更为良好的制度保障,WTO总干事拉米指出:“为了实现公平和持续性,(经济)一体化进程必须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而且规则体系需要不断地更新。”[6]此次危机虽然给多边贸易发展造成严重困难,但同时也为WTO法律规则的更新与完善创造了历史条件。

各国普遍认为,国际金融关系是国际经济关系的中枢系统,其能否稳健运行对于全球的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二战后,美、英主导创建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制度为核心的现行国际金融管理体制,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实行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尽管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历经多次美元危机后,实行美元和黄金直接挂钩以及固定汇率制度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被迫瓦解,但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世界第一强国的强悍地位决定了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拥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实际上“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美元仍保持着世界货币的地位。

与以往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不同,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在世界经济的核心——美国,其影响迅即扩展到世界范围,最终成为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的“放松监管”金融管理政策以及战后在美、英主导下建立并运行半个多世纪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及其创建的全球金融体系、实施的法律监管制度、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等提出强烈质





疑。各国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和发展中国家的极端弱势地位、国际货币金融领域法律监管的制度性缺失构成了现行国际金融法律体制的两大致命弱点。危机爆发后，许多政治家和学者纷纷呼吁对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彻底改革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面对当前严峻的全球金融形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肩负着新世纪里的重大历史使命，任务十分艰巨，能否顺应国际经济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潮流最终做出根本性变革，人们正拭目以待。

200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在过去的 30 年里中国的涉外经济法治建设已从基本空白发展到目前与国际经济法律全面接轨、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现代化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特别是 2001 年加入 WTO 后，中国政府严格履行加入 WTO 时所做的各项承诺，制定、修改大量法律、法规，涉外经济法治建设步伐明显加快，现已形成了以《对外贸易法》为基础的、涵盖进出口贸易、海关管理、外商投资、外汇管理、贸易救济措施等广泛领域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涉外经济法律体系，为中国对外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在国内金融建设领域，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灵活审慎、稳步有序的金融管理政策，保证了中国金融业的稳健运行、健康发展，制定并实施《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信托法》、《保险法》、《外汇管理条例》等一大批现代金融法律、法规，建立起了一套门类齐全、体系完备、适合中国金融业发展特点的国内金融法律制度。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尽管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不小的困难，但对中国的实际影响有限，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始终奉行稳健、有序的金融开放政策，国内金融体系与国际金融体系相对独立。事实证明中国实施的适合中国金融业发展特点、稳定有序的金融开放政策是正确的。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多次表示中国将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保持国内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同时以负责任的态度和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并积极主张并支持改革现行国际金融体制。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继续支持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与各国政府一道防止保护主义抬头，坚决维护 WTO 多边贸易体制及其法律制度的权威。中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已充分表现了灵活性和建设性，并主张尽快恢复并成功结束多哈回合谈判。

国际经济法学界已充分认识到，2008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历经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经历重大考验和抉择的一年，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重要国际经济组织及其法律制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尽管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国际经济法学界认为，经过这场严峻的危机，我们可以更好地总结战后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成功经验，反思失败带来的教训，改变现行国际经济法律制度中不合理规定和做法，在此基础上重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稳定、有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当前，对于克服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重建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我们应坚定信心。在这一历史性时刻，中国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作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和贸易体，当今中国的国际地位已今非昔比，理应在国际经济领域和法律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1]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 年 10 月 9 日，第一版，朱文晖：“‘金融自由化’值得反思”。

[2] 自 1980 年起，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极力推动放松金融管制政策，全球金融市场呈现出超高速发展的态势，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

[3]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 年 10 月 9 日，第一版，朱文晖：“‘金融自由化’值得反思”。

[4] 所谓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是指发展中成员可在农产品进口激增的情况下，采取提高关税等特殊保障措施以保护本国农业免受冲击。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成员希望能放宽动用这一机制的底线，以保护本国相对脆弱的农业生产和维护粮食安全。但这遭到了美国的反对，最终导致了此次会议的失败。





[5]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www.wto.org

[6] “Lamy warns against protectionism amid financial crisis”, WTO Public Forum on 24th September 2008, www.wto.org

来源: 中国法学网 <http://www.iolaw.org.cn/> 发布时间: 2008年11月27日

论我国保险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王卫国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在我国保险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作为规范保险行为的法律制度,却存在严重的滞后和不足,如:立法上留有空白,立法倾向上一些原则不明确等。因此,应该消除立法上的空白点,放松对保险资金运用的限制,转变我国保险监管模式,加快《保险法》实施细则的起草,以逐渐完善我国的保险法律制度。

【关键词】保险;法律制度;保险利益原则;保险监管模式

1979年我国保险业恢复以来,保险业以30%以上的年平均速度快速发展和壮大,且潜力巨大。在保险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作为规范保险行为的法律制度,却存在严重滞后和不足。本文拟对我国现行保险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提出浅显的看法。

一、我国保险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 保险业法存在的问题

保险业法又称保险监督法,是国家对保险企业、保险市场实施监督管理的法律,属于保险公法范畴,我国现行保险法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在:

1. 立法上留有空白,体系不完备,系统性差,可操作性不强。我国现行保险法律制度内容上缺少保险公司的独立审计、法定会计、信息公开披露、保险精算;外资保险公司的管理;农业保险、出口信用保险;保险中介机构等方面的规定,造成了保险业监督管理的部分领域无法可依。

2. 现行的保险法律制度与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及《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存在差距。我国的保险业在透明度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方面存在很大问题。在服务贸易领域,随着外资保险公司的大量涌入,我国仅有一个外资保险公司管理规定,这在立法层次上显然远远不能满足《服务贸易总协定》有关透明度的要求。在国民待遇方面,我国的现状是处于两个矛盾的极端:一方面,我国对外资保险公司的市场进入有着严格的法律限制,要求具备一定条件才有资格进入我国保险市场;另一方面,在税收和资金运用方面,外资保险公司则享有超国民待遇。

3. 我国现行保险监督法律制度存在问题。首先,监管模式存在问题。我国《保险法》在立法时主要参考了美国的保险法,即以政府监管为主,而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几乎没有。而现代西方发达国家保险监管模式正向放宽保险监管方面发展,放宽保险市场准入条件;放宽对保险经营活动限制,允许保险业和其他金融业之间,产、寿公司之间可以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其次,监管内容存在问题。(1)在保险市场准入方面。我国《保险法》在规定保险公司开业资金方面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的要求,也远远超过我国《公司法》对一般公司开业资本金要求,这使得我国保险市场准入门槛过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目前我国保险市场发展不平衡状况,妨碍了保险市场竞争,影响了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2)在保险控股公司的监管方面。对于控制和支配保险子公司的保险控股公司的监管,在我国保险监管中是个空白点。对于保险控股公司的监管缺位,显然不利于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3)在保险经营监管方面,我国《保险法》对保险业经营范围显然限制较为严格,规定保险业必须分业经营。而目前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则开始放宽限制,允许保险业混业经营。(4)在保险资金运用方面。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保险法监管显然





过严,势必影响到保险资金的增值和保值,进而削弱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削弱保险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

(5) 保险市场退出监管方面存在问题。由于目前我国涉及保险市场退出实践较少,保险监管法律法规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没有过多地显露出来。但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由于保险市场主体增多,保险业竞争无疑会极为激烈和残酷。保险公司的破产也就不可能成为永远的“天方夜谭”。

4. 立法倾向上一些原则的不明确,造成保险实务操作中有难度,不能体现法律的公正。例如,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保险合同解释中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又称不利解释原则,是指“在保险单被如此拟制以致可以进行两种解释的情况下,保单用于应向依照最不利于保险人的方式予以解释”。其目的是为了保险被保险人的利益。我国《保险法》第30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虽然该条款对维护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该条款规定仅对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作出了十分笼统和原则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往往造成操作难度大,损害保险人利益的问题。

(二) 保险合同法存在的问题

保险合同法属于保险私法范畴,主要调整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我国保险合同法存在的问题具体体现在:

1. 保险利益原则在立法上不明确,过于抽象,在实践中不好把握。保险利益原则是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我国《保险法》第11条规定了:“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保险标的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这一规定只是原则性的,过于笼统,未体现保险利益原则在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中适用的差异性。

2. 保险合同生效时间规定存在不确定性,造成实践中出现这方面问题的保险合同纠纷无从处理、随意性大。保险合同的生效时间直接影响到保险合同的生效与否,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障等。在保险实践上,经常出现投保人与保险人在达成保险协议,且被保险人已经交付保险费后,却不能及时取得保险单证的现象,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是否能获得保险保障,就不能准确确定。

3. 交付保险费与保险合同效力的关系不明确。一般情况下,交付保险费与保险合同成立并不同时,而保险合同成立与保险效力的产生可能是同时的。按我国《保险法》第13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可以理解为既存在保险合同成立与保险效力异时的例外情况,也存在交付了保费并不意味着保险合同效力发生的情况。《保险法》对交付保费与保险合同效力的关系没有做出明文规定,势必造成实践中的极大困惑。

4. 过失犯罪死亡或致残在保险合同法上没有规定,存在空白点。《保险法》第66条规定:“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导致其自身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但对于过失犯罪致其自身伤残或者死亡的情形,保险人是否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没有规定。

5. 不可抗辩条款未与国际接轨,尚未达到国际标准的保险条款。不可抗辩条款又称为:“不可争条款”或“两年后不可否定条款”。其基本内容是:在被保险人生存期间,从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起满一定时期后(通常为2年),保险人不得以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违反诚信原则,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为理由,而主张解除合同和拒绝赔偿保险金。这一条款是人身保险法律条款中常用条款。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人身保险法规采用了该条款,我国人身保险法中也列有不可抗辩条款,但我国《保险法》仅限于年龄方面,健康方面未作明确规定,留下空白。

6. 不丧失价值选择条款的规定不完备。不丧失价值选择条款是人寿保险合同的常用条款。其基本含义是投保人有权在合同有效期内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处置保单上的现金价值,保险人无权将保单现金价值占为己有。这种权利充分表现在投保人不愿继续交费时,可以选择:(1)减少保险金额,利用保单现金价值一次性缴纳保费;(2)利用保单现金价值,将保险合同改为一次性缴纳保费的定期保险;(3)由保





险人以保单现金价值自动提供贷款,用以抵缴保费。我国《保险法》第57条规定了“减少保险金额”的选择,没有“改为定期保期”和“自动垫缴保费”的规定。

二、完善我国保险法律制度的对策

(一) 消除立法上的空白点

提高保险立法技术的前瞻性、系统性、可操作性,消除立法上的空白点。保险法律制度应在立法目的和原则中强调促进与维护市场开放环境下的公正竞争秩序的培育与维护,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的立法目的;加快我国农业保险法、出口信用保险法和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法的立法进程。

(二) 放松对保险资金运用的限制

保险资金运用是保险公司的生命线。发达国家保险公司利润来源不再是直接保险业务而是资金运用。但我国《保险法》对资金运用限制较死。

(三) 转变我国保险监管模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险监管法律制度

为适应世界金融一体化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形势,要实现由现行的以市场行为与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严格监管模式向松散的以偿付能力为中心的监管模式转变;从目前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向分业经营、混业监管再到混业经营、混业监管模式的转变;要建立保险公司经营风险预警系统、经营信息披露制度、首席精算师登记认可制度和保险公司评级制度及保险法定会计制度,提高监管透明度,加快保险自律组织建设,完善保险中介市场制度;降低保险市场准入门槛,放宽对外资保险公司市场准入限制,缩短与世贸组织基本原则及《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差距,完善保险监管立法,尽快填补对保险控股公司监管的空白。

(四) 加快《保险法》实施细则的起草

加快《保险法》实施细则的起草,明确使用保险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范围和标准。由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为了保护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利益而发展起来的合同条款解释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被保险人交易实力与保险人相当,即被保险人不属于经济上的弱者,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不应对其运用,以维护保险司法公正。

总之,修改、完善我国保险法律制度,是适应我国保险业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变化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强保险监管的需要,是适应我国加入WTO形势与国际接轨的需要,是规范和保证我国保险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需要。这必将在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保险保障服务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http://www.chinalawinfo.com/> 发布时间:2008年11月25日

两岸直航面临的若干法律问题思考

发生空难航空运输承运人的责任与赔偿

朱子勤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航空与空间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2008年11月4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和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丙坤在台北签署《海峡两岸空运协议》,实现了两岸空运直航,对促进两岸人民的交往具有重要意义。

两岸空运直航后会面临许多法律问题,如两岸直航的法律定位、航空器的登记与标志、制止对航空器的犯罪、航空运输承运人的赔偿责任、航空运输争议的解决等。本文仅就两岸直航中航空器致旅客伤亡、行李或货物毁损时承运人的责任与赔偿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

一、内地法律关于承运人责任与赔偿之规定





关于航空运输承运人的责任,内地立法主要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和中国参加的国际条约中。《民用航空法》将航空运输分为国内航空运输与国际航空运输,国内航空运输是指根据当事人订立的航空运输合同,运输的出发地点、约定的经停地点和目的地点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运输。国际航空运输是指根据当事人订立的航空运输合同,无论运输有无间断或者有无转运,运输的出发地点、目的地点或者约定的经停地点之一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运输。《民用航空法》对国内航空运输与国际航空运输规定了不同的责任与赔偿。

对于国内航空运输,《民用航空法》从旅客、行李和货物三方面对承运人的责任与赔偿做了规定。

对旅客的责任。《民用航空法》第124条规定:“因发生在民用航空器上或者在旅客上、下民用航空器过程中的事件,造成旅客人身伤亡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但是,旅客的人身伤亡完全是由于旅客本人的健康状况造成的,承运人不承担责任。”关于承运人承担责任的限额,《民用航空法》第128条规定: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额由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执行。

1989年,国务院颁布《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规定承运人对每名旅客的最高赔偿金额为人民币2万元。1993年11月29日,国务院颁布《关于修改〈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的决定》,将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对每名旅客的最高赔偿金额提升至7万元。2002年5月7日发生的“大连空难”,考虑到物价上涨水平,确定每位购买机票的遇难旅客,最高可一次性获得19.4万元赔偿,最低则可获赔18.4万元。2004年11月21日发生的“包头空难”,每位遇难旅客获得21.1万元的赔偿。两次空难赔偿金额已远远高于法律的规定,为改变此种法律落后于实践的状况,2006年2月28日中国民航总局发布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根据该规定,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对每名旅客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40万元。

对行李及货物的责任。《民用航空法》所规定的行李包括托运行李和旅客随身携带的物品。该法第125条规定,因发生在民用航空器上或者在旅客上、下民用航空器过程中的事件,造成旅客随身携带物品毁灭、遗失或者损坏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因发生在航空运输期间的事件,造成旅客的托运行李毁灭、遗失或者损坏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但旅客随身携带物品或者托运行李的毁灭、遗失或者损坏完全是由于行李本身的自然属性、质量或者缺陷造成的,承运人不承担责任。

对于货物的责任,因发生在航空运输期间的事件,造成货物毁灭、遗失或者损坏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但是,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灭、遗失或者损坏完全是由于下列原因之一造成的,不承担责任:(1)货物本身的自然属性、质量或者缺陷;(2)承运人或者其受雇人、代理人以外的人包装货物的,货物包装不良;(3)战争或者武装冲突;(4)政府有关部门实施的与货物入境、出境或者过境有关的行为。

关于承运人承担责任的限额,根据2006年2月28日中国民航总局发布的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对每名旅客随身携带物品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3000元;对旅客托运的行李和对运输的货物的赔偿责任限额为每公斤人民币100元。

二、台湾地区法律关于承运人责任与赔偿之规定

台湾地区《民用航空法》于1953年5月30日颁布施行,历经多次修订。该法第89条规定,航空器失事致人死伤,或毁损他人财物时,不论故意或过失,航空器所有人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其因不可抗力所生之损害,亦应负责。自航空器上落下或投下物品,致生损害时,亦同。

从该条规定来看,关于承运人赔偿责任的基础为无过失责任,这比内地《民用航空法》规定的推定过失责任更为严格。内地《民用航空法》第157条规定:“因飞行中的民用航空器或者从飞行中的民用航空器上落下的人或者物,造成地面(包括水面,下同)上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获得赔偿;但是,所受损害并非造成损害的事故的直接后果,或者所受损害仅是民用航空器依照国家有关的空中交通规则在空中通过造成的,受害人无权要求赔偿。”





关于赔偿责任限额,台湾《民用航空法》第 93 条规定:“乘客及载运货物,或航空器上工作人员之损害赔偿额,有特别契约者,依其契约;特别契约中有不利于台湾地区人民之差别待遇者,依特别契约中最有利之约定。无特别契约者,由交通部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并参照国际间赔偿额之标准制定办法,报请行政院核定公告之。”1974 年 8 月 6 日台湾行政院公布施行《航空客货损害赔偿办法》,该办法第 3 条规定:“航空器使用人或运送人对每一乘客之损害赔偿标准,其为死亡或重伤者,最低新台币五十万元,最高不得超过新台币壹佰万元;非死亡或重伤者,最高不得超过新台币二十五万元。”

实际上,在台湾发生的历次空难中,台湾航空公司对罹难旅客的赔偿已远远超过该办法之规定。例如,1994 年 4 月 26 日的“名古屋空难”,台湾中华航空公司赔偿每位罹难旅客 640 万元新台币。2002 年 5 月 25 日的“澎湖空难”,华航与澎湖空难的罹难者家属达成和解,赔偿每名罹难者 1420 万元新台币;其中两名罹难者家属不满台湾华航理赔金额,向法院请求损害赔偿,台湾“最高法院”于 2007 年 8 月 17 日作出判决,认定华航在维修飞机上有重大过失,应赔偿每人 1500 万元新台币精神慰抚金,创下台湾地区司法判决慰抚金的最高纪录。

三、两岸空运直航中承运人的责任与赔偿

由于内地与台湾地区法律及司法实践关于承运人对旅客伤亡的责任与赔偿存在着巨大差异,两岸空运直航后,如何解决两地法律之间的冲突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内地与台湾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属于国际私法领域的区际法律冲突,对于区际法律冲突,解决途径有二:一是通过区际冲突规范解决;二是制定统一实体规范。

在内地,尚无专门的区际冲突规范,虽然民法通则与《民用航空法》有解决国家之间法律冲突的规定,而且“涉港澳”均比照“涉外”来处理,但未明确“涉台”可以比照“涉外”来处理,因此,其中的冲突规范不能类推适用于解决两岸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

在台湾地区,1992 年 7 月 31 日颁布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规定了大量的区际冲突规范以解决两岸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但其特点是多适用台湾地区法律基本排除了内地法律的适用。

因此根据两地的区际冲突规范解决两岸直航中承运人对旅客伤亡、货物毁损的责任与赔偿均不可行。

两岸直航中如果发生空难承运人的责任与赔偿最好的办法是两岸协商制定统一实体规范来规定承运人的责任与赔偿。其中关于承运人的责任基础可参考台湾地区《民用航空法》的规定采用无过失责任原则,即只要发生空难对旅客造成伤亡承运人不论有无过失均应赔偿。关于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应参考两地法律及相关国际公约,根据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航空运输的发展现状科学地加以规定。

当然,由于两岸法律差异较大,制定统一实体规范有一定的难度,发生空难在现阶段仍以协商解决最为可行。

来源: 法制网 <http://www.legaldaily.com.cn/> 发布时间: 2008 年 12 月 07 日

决议延期能解决索马里问题吗

王可菊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中心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12 月 2 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 1846 号决议,决定延长各国打击索马里海盗的授权 12 个月,呼吁联合国为打击海盗努力发挥协调作用,并呼吁各国建立打击海盗的国际司法合作平台。做出这个决议是因为今年 6 月 2 日通过的第 1816(2008)号决议所规定的 6 个月期限于 12 月 1 日到期。这些决定成为外国军舰游弋巡逻于索马里海域并采取打击索马里海盗行为的依据。





按照国际法,各国享有在公海打击海盗的权利。而一国领海是该沿海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它处于该沿海国的主权支配之下。此次安理会授权外国可进入索马里领海打击海盗,是安理会为保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采取的一项措施。正如第 1816 号决议所申明,该决议的授权仅适用于索马里局势,并特别强调说,此授权不应被视同订立习惯国际法,意即它并非确立一项国际法上打击海盗的新规则。

从决议的内容看来,安理会在做出此项决议时显然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1. 索马里海盗行为对海上商业航线安全和对国际航运的威胁。在索马里领海和附近公海不断发生攻击和劫持船只事件,其中包括攻击和劫持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船只及商业船只,已对迅速、安全和有效地向索马里人民运送粮食救济品和其他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构成严重负面影响,而且对船只、船员、旅客和货物构成严重威胁。2. 索马里的危机局势,以及过渡联邦政府没有能力制止海盗或在索马里沿海国际海上航线或索马里领海从事巡逻并保障其安全。1991 年索马里独裁者巴里被推翻后不久,爆发了部族战争,使该国长期处于内战和无政府状态。2004 年成立的过渡联邦政府也只控制首都摩加迪沙等数个城市,政府机构处于瘫痪状态。3. 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提出国际上协力打击索马里海盗的要求。2008 年 2 月 27 日在索马里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中,转达了过渡联邦政府请求安理会提供紧急协助,保护索马里领海和沿岸国际水域,确保船运和航行的安全。

由于索马里的形势至今仍没有很大的改变,在第 1816 号决议所规定的期限到期之时,安理会重新审视那里的局势,做出了延长 12 个月的决定。但是,毋庸讳言,外国军舰打击海盗不仅被视为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而且面临诸多困难。索马里海岸线长达 2400 英里,而海盗 15 分钟就能劫持一艘货轮。据报道,11 月 28 日索马里海盗在亚丁湾又劫持了悬挂利比亚旗帜的油轮。该船遭劫时发出求救信号,在附近海域巡逻的外国军舰立即派出直升机救援。但赶到时,海盗已劫船成功,只救起跳海的 3 名保安。尤其是在索马里大片国土上海盗不仅不受追捕和审判,而且拥有从情报信息、装备、给养到船舶和人质的看管及谈判代表等为他们服务的体系。因此,外国在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的办法仍需不断改进和完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采取其他措施来加以配合,特别是需要国际上不断推动索马里国内局势朝着正常化的方向发展。

来源:中国普法网 <http://www.legalinfo.gov.cn/> 发布时间:2008 年 12 月 15 日

法学教育

每位法律人都应该有点哲学品味

胡月军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法律哲学家考夫曼教授在《法律哲学》这本世界名著中有一句口号性的名言:“并不需要每位法律人都成为专业的法律哲学家,但每位法律人都应该有一定法律哲学的品味,藉以扩大他的‘难题意识’。”

我以前“很傻很天真”地认为,所谓哲学不过是“折磨人的学问”,哲学玄而又玄,高在云端,哲学家喜欢追求终极的理论,很容易与实践完全搭不上边。我的专业是刑法学,哲学关我什么事情?对我来说,刑事法学书籍才应该是我的最重要阅读对象,于是,我就陆续拜读了储先生的《刑事一体化》、《美国刑法》,白建军教授的《关系犯罪学》,陈兴良教授的刑法哲学三部曲:《刑法哲学》、《刑法的人性基础》、《刑法的价值构造》,齐文远、周详合著的《刑法、刑事责任、刑事政策研究》等书籍;其间,我也穿插着阅读了一些哲学方面的著作,比如,《存在与时间》、《真理与方法》、张世英的《哲学导论》、陈嘉映的《语言哲学》。





从储先生的《刑事一体化》和白建军教授的《关系犯罪学》中,我看到了“关系哲学”对刑法学、犯罪学研究的影响;从《美国刑法》的第三版序言中我注意到了“发展哲学”对犯罪学的影响;从陈兴良教授的刑法哲学三部曲中,我发现“原来刑法学还存在着哲学问题,原来刑法还有哲学研究方法。”从齐文远、周详合著的《刑法、刑事责任、刑事政策研究》一书中,我注意到运用“荒诞哲学”视角来反思死刑问题;从王政勋教授那里,我领略了运用“语言哲学”来研究刑法学的风采。

以上这些陆陆续续的发现,使我越来越感觉到“每位法律人都应该有点哲学品味”,卡多佐就曾经说过,“尽管哲学很难给我们具体的指示,但它终归是一种哲学,一种如果我们真的求助,将使我们免于大错的哲学。”

以下部分将分别简要地说明“关系哲学”、“发展哲学”、“荒诞哲学”、“语言哲学”对刑法学、犯罪学的影响。

(一) 关系哲学与《刑事一体化》、《关系犯罪学》

中国刑法学界不缺所谓的“刑法学家”,稀缺的是刑法思想家。放眼刑法学界,储先生正可谓刑法思想家。他提出了许多具有个人独特学术标签意义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刑事法学研究基本方法论价值的“刑事一体化”思想和作为刑法改革基本思路的刑法结构“严而不厉”思想。

关系哲学(关系实在论)是当代东方和西方哲学研究中兴起的一种理论潮流。其基本观点是关系即实在,实在即关系。所谓关系,是指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相互联系是关系的形式,相互影响是关系的内容。储先生认为,关系实在论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处于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是事物发展的真正终极原因的基本观点,并且认为刑法也在关系中存在与运作,关系是刑法的本体,关系是刑法的生命,他运用关系分析方法研究刑法的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对刑法的存在与运作的影响,勾勒出了刑事一体化范式中的“关系刑法论”的基本轮廓。“刑事一体化”的提出,不仅大大提升了我国刑事法学的研究水平,而且直接推动了我国刑法改革与刑事法治的进程。

白建军教授师从于储先生,受储先生“关系刑法论”影响,他则进行了“关系犯罪学”方面的深入研究,并出版了同名专著《关系犯罪学》,该书采用的关系分析的理论、方法打破了犯罪学研究的沉闷。在研究范式篇,作者对犯罪学的概念、对象、方法、历史发展进行了独特的梳理。在犯罪关系篇,犯罪特性学,犯罪形态学,犯罪定义学以及犯罪规律学构成了一个全新的犯罪学体系。在社会反应篇,犯罪学回归到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以及被害预防等领域,使刑事规范学和犯罪事实学各自获得了新的意义。

(二) 发展哲学与犯罪发展学

储先生曾经在《美国刑法》第三版前言中谈到:“20世纪下半期哲学界关注对社会发展的本质、方式、规律、道路和前景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形成了哲学的一个分支即发展哲学。发展哲学在经济领域卓有成效地运用,出现了经济发展理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在犯罪学研究领域,能否将“犯罪发展”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予以关注?整个犯罪学学科的起点,是以研究犯罪原因开始的。到现在,犯罪原因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在美国“9.11”震惊全球的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我感到有必要启动对犯罪发展问题的研究,发展与原因有联系,也有重大区别,原因研究着眼于从无到有,是一种回顾性的生成研究思路。发展研究则是以存在(有)为前提,研究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过程。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讨论犯罪发展,诸如关于犯罪侵害对象的变化,关于犯罪方式的演变、犯罪形态发展、刑事制裁方式演变。”

受此启发,我国犯罪学研究方面催生了一门新的分支学科——犯罪发展学。





（三）陈兴良教授刑法哲学三部曲

陈兴良教授一方面期待“走向规范的刑法学”，一方面期待“走向哲学的刑法学”。他先后出版了《刑法哲学》、《刑法的人性基础》、《刑法的价值构造》，组成了刑法哲学三部曲。陈兴良教授认为其刑法哲学三部曲的刑法方法论意义在于：“在刑法学研究中，引入了哲学方法，从而使刑法学成为一种更具有哲理性的理论体系。哲学虽然是一门学科，但由于哲学研究的是世界的本源性问题，因而它同时又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刑法哲学不是要使刑法学成为一种哲学，而是采用哲学方法研究刑法，更为关注刑法的本源性问题，例如人性、价值。”

刘艳红教授曾经提到，陈兴良教授的《刑法哲学》到《刑法的人性基础》再到《刑法的价值构造》一系列探究刑法本体性问题的著作陆续出版之后，成为了引起刑法学者们的一个关注点。在当时的其他学科的法学者看来，原来刑法学还存在着哲学问题？！原来刑法还有哲学研究方法。

（四）死刑价值：信还是不信，这是个问题！（荒诞哲学与死刑问题）

有学者指出，在论及死刑存废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刑法学者已经将各自的论据说得够清楚了，似乎没有人还可以提出更多的支持理由，似乎也没有人可以在法律上超越这些理由，除了一种语言的转换或者重复以外。平野龙一、考夫曼等学者都有类似的看法：“死刑到今天，已经是论述尽了的问题”，“在死刑的问题上，提供出来迄今为止未为人知的观点非常难”。好像死刑的根本问题已经无话可说了，但是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以往分析的角度、视角迫切需要转换。

说来令人纳闷，在死刑存与废问题中许多古老的表面上对立的论据，往往存在死刑保存论者提出的论据可以用来支持死刑废除论，而废除死刑论者提出的论据也可以支持保留死刑的奇怪现象。荒诞自有荒诞的根基，死刑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政治问题，这将人导向了“荒诞哲学”的思考。

荒诞哲学是西方哲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的是世界上的荒诞现象。从荒诞哲学的角度看，“无中生有”是荒诞的，但是这并不奇怪，因为荒诞是世界存在的一种根本方式，在荒诞哲学看来，荒诞也是死刑存在的方式。世界上本来没有鬼神，但是人们“无中生有”出了鬼神，并且信仰鬼神真的存在。论者指出，死刑在思想层面上，不是一个是非真伪的认识问题，而是一个信仰问题；死刑在刑罚价值层面上，其所谓的威慑功能和报应价值是虚拟的，死刑存在的根基不在于支持死刑论者提出的那些通常见解，死刑废除的根基也不在于废除死刑论者提出的通常理由，死刑的保存与废除的根基，其实都是同一个东西：死刑的虚拟价值。即死刑现实的预防犯罪、实现公正的价值缺位所成就的民众、国家相信其有价值它就有价值的这种观念上的信仰价值。所谓的“死刑的虚拟价值”之“虚拟”是从其产生的基础而言的，若从信仰本身而言，它是实存的，它已经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并且还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将来的死刑制度，实际上，即使是已经废除了死刑的国家，死刑的这个虚拟价值也仍然没有死去。

（五）庸医看病——刑法解释方法的排序。（语言哲学与刑法解释学）

一般认为，法律解释的方法包括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文理解释也称语义解释、文义解释，指通过对法律条文用语、语法结构等的分析，阐明法律条文的含义；论理解释指从逻辑上对法律条文的含义进行阐明。文理解释优先于论理解释，在解释某个法律条文的时候，首先应当采用文理解释的方法，如果通过文理解释已经能够准确地阐明其含义，则不再使用论理解释的方法，只有通过文理解释得出的结论仍然存在疑义的时候，才能进行论理解释。学界认为，刑法解释方法具体有：扩大解释、限制解释、补正解释、当然解释、反对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对此，有学者指出，这种解释方法的列举是刑法解释的传统研究所使用的方式，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诸种所谓的“解释方法”事实上并不完全是解释方法，例如限制解释和扩大解释，只是对解释的结果的分类，而非解释的方法；（2）诸





种解释方法是可以化约的,例如补正解释、当然解释、反对解释、比较解释基本上都是在目的解释的基础上讨论的,因为若不是对某种规范的目的持有某种见解,仍然是不能知道到底是要补正解释或者当然解释,还是反对解释或者比较解释。因此,该论者认为,具有实质意义解释方法还是要归于文义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四者,对于后三者,因其乃基于文义而发,也是为了阐明文义,因此可以称为辅助解释。

王政勋教授运用语言哲学来研究刑法解释学,认为文理解释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语篇原则,只有在上下文中,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正确确定刑法条文的意义,语境包括言内语境、言伴语境、言外语境。文理解释的方法包括词义解释、语法解释、语义解释、语用解释、认知语言解释等多种解释方法,而且通过其他方法不能得出正确或者准确的解释结论的,通过这些文理解释方法的结合,则能够得出正确、可靠的解释结论。在刑法解释活动中,应该采取的立场是客观解释论,根据客观解释论,司法者解释法律时只能以刑法文本为准,而以刑法文本为准对法律进行解释,正是文理解释。刑法解释应该采取实质解释论,但是实质解释论体现了解释论循环原则(语篇原则):刑法的整体意义即刑法所蕴涵的价值应该从刑法的具体文字去考察,刑法条文的具体含义应该通过刑法的整体意义来确定。实质解释论本质上就是文理解释。从通常所说的论理解释方法来看,任何一种论理解释的方法都不失为文理解释。总之,刑法解释是对刑法所使用的语言进行的理解和诠释,刑法解释其实就是文理解释,论理解释其实包含在文理解释之内。这个结论的得出对传统刑法解释方法的相关论断具有革命意义。

刑法解释应用于法律规则遇到障碍之时,这类似于医生开药方应用于人体患病之时,当病人去看病之时,如果医生告诉他:先吃这个药,这个药不管用就吃那个药,那个再不管用就继续换其他药,那么这个医生就是个庸医。刑法学界一般认为,进行刑法解释之时,文理解释不管用就换论理解释,其中,比如说,如果历史解释不管用就换体系解释,体系解释还不行就换目的解释,如此下去,这跟庸医开药方没有什么区别。从这个角度来看,王政勋教授找出了刑法解释方法的元规则,是一位高明的医生。

一点感触

以上是我对刑法学界运用哲学方法研究刑法的一个梳理,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孤陋寡闻,难免以偏概全。事实上,在法学界已经有学者在研究“民法哲学”、“刑事诉讼法学哲学”了,在其他部门法领域,也出现了哲学研究的萌芽。

我很喜欢一句广告词: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心有多大,我们的舞台就有多大。毕竟眼界决定境界,思路决定出路。哲学是一门使人变得有思想的学科,我们每位法律人都应该有点哲学品味,藉以扩大自己的“难题意识”。

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http://www.chinalawinfo.com/> 发布时间:2008年12月09日



S I F T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高教动态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图书馆编



2008 年 12 月

第 8 期[总第二十四期]

本期要目

- 教育部传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部署明年教育工作
- 高校目标管理的主要特征及实施策略
- 上海理工大学校长许晓鸣访谈：百年老校的创新追求
- 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中国成长报告·教育篇
- 世界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发展背景、模式和趋势

要闻
要事

教育部传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部署明年教育工作

12 月 13 日下午，教育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周济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紧密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紧密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锐意进取，扎实做好 2009 年教育改革发展的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

会议指出，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明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阐述了做好明年经济工作需要把握的原则。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全面分析了当前我国经济形势，阐述了明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和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具体部署了明年经济工作。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揽全局，求真务实，鼓舞信心，对于统一全党认识、凝聚全国力量、协调各方行动，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会议对 2009 年的教育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教育系统要认真学习贯彻好这次会议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统一到中央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

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对决策的部署上来，以思想认识的高度一致保证行动和工作的高度协调。

会议强调，提高教育水平，既能为群众排忧解难，也是扩大消费、拉动内需的重要内容。要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规划部署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教育工作，使教育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服务。要认真做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纲要》的调研起草工作。要以加强薄弱环节为重点，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进一步健全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巩固和提高九年义务教育，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和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特别是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健全国家助学体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要积极应对就业形势严峻的局面，切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要积极争取各级财政在优化投资结构中落实优先发展教育的要求，加大教育投入，同时加强项目规划和资金监管，提高经费使用效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开展形势研判和矛盾隐患的排查处理，切实做好维护稳定工作。

在京的教育部党组成员袁贵仁、陈希、赵沁平、陈小娅、郭向远、杨周复出席会议。有关司局及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08 年 12 月 14 日



李卫红：立足创新 提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

高校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理论座谈会 12 月 4 日在京举行，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据了解，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制规模、教学科研人数、科研成果的数量都得到空前增长。目前，在哲学社会科学的队伍、项目、经费、成果、获奖等方面的数量上，高校均占全国的 85% 以上，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当之无愧的主力军。

李卫红指出，回顾 30 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根本在于：以思想解放为先导，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繁荣发展为目标，紧密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创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开始迈入立足创新，提升质量，实现哲学社会科学从重数量增长向重质量提升转变的新阶段，开始进入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哲学社会科学的新时期。

李卫红说，目前全党正在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对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来讲，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根本的是紧紧抓住繁荣发展这一主题，努力解决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实现什么

样的发展”和“怎样实现发展”这一重大问题，以改革创新精神谋划和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又好又快发展。

李卫红强调，要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收获转化为谋划科学发展的正确思路，转化为科学发展的实际能力，转化为科学发展的政策措施，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学发展。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面向未来，谋划发展；改进评价，提升质量；以人为本，加强队伍建设；扩大开放，走向世界，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求真务实，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据了解，“十一五”期间，教育部将加大投入，大力改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条件，去年教育部党组将哲学社会科学的年度经费增加到 1 亿元，今年又决定增加到 2 亿元。教育部将继续做强做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着力构建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平台体系、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体系以及条件支撑体系。

117 名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和 20 余位理论专家参加了座谈会。

作者：杨晨光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08 年 12 月 5 日

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将规范学术博客

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日前在京举行第三次工作会议，从会上获悉，学风建设委员会已经完成《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意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手册》和《学术博客自律倡议书》（征求意见稿）等文件和

规范的制定工作，将于近期推出，这将为推进高校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提供政策依据，推动高校切实负起学风建设的责任。





据了解,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成立于2006年,在加强高校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各高校也相继建立健全了学风建设组织机构,制定了专门规章制度。调查表明,75%以上的部属高校设有学风建设专门机构,初步建立了全国高校学风建设工作网络,高校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学术风气建设得到切实加强。

学风建设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学风建设要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建立健全一整套加强学风建设的规章制度,使人们不愿、不能、也不敢违背基本的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在不断强调学术道

德的基础上,通过学术规范的制度建设,明确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则和道德底线。

据介绍,学风建设委员会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手册》,将作为高等学校教学和科研人员关于学术规范的共同约定,也是学校进行学术规范教育的指南。

作者:杨晨光 来源:中国教育报2008年12月9日

理论 研究

高校目标管理的主要特征及实施策略

摘要:高校目标管理就是高校管理者依据党和国家规定的教育管理目标及方针政策,结合高校实际,制定高校的总体目标,然后将总体目标分解到校内各部门和个人,形成有机的目标链,使个人目标、部门目标和高校总目标融为一体,并通过目标对所有部门和个人进行管理的一种管理方式。高校目标管理具有主客体关系的辩证性、目标的多元性与一致性、条件的适应性与设计的整体性、全员的参与性与手段的灵活性等特征。实施高校目标管理的策略在于合理制定目标、有效实施目标、科学考核目标、适时反馈目标。

关键词:高校目标管理,主要特征,实施策略

目标管理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方式已在许多高校受到重视。据我们最近对中南地区75所院校的调查,正在实行目标管理的院校为32所,占42.67%,准备实行目标管理的院校为17所,占22.67%,正在实行和准备实行的院校比例高达65.34%。调查显示,在高校目标管理的理论上存在不少误区,实践上也存在许多困惑。为了正确认识和有效实施高校目标管理,本文拟对高校目标管理的内涵、特征及实施策略作初步探讨。

一、高校目标管理的内涵分析

高校目标管理就是高校管理者依据党和国家规定的教育管理目标及方针政策,结合高校实际(如高校类型、管理体制、培养任务、办学条件、学生情况及社会发展需求等),制定高校的总体目标,然后将总体目标分解为校内各部门和个人目标,形成有机的目标链,使个人目标、部门目标和高校总目标融为一体,并通过目标对所有部门和个人进行管理的一种管理方式。高校目标管理既具有目标管理的一般特征,又受





高校组织的制约。与企业目标管理相比,高校目标管理在构成要素、运行机制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体现出高校目标管理独特的价值取向。

从构成要素上分析,高校目标管理由主体、客体、目标、条件和手段构成。主体是指为实现高校目标管理的行为、目的、价值、功能而活动着的个人或组织。个人如学校领导、教职员工等,组织如职能部门、机关团体、教学院系等。客体是指高校目标管理活动中主体的实践活动所具体指向和作用的对象。由于高校目标管理主体的多样性,能够纳入高校目标管理客体的对象也是多样的。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划分不是绝对的,此一时的主体彼一时就是客体,在一种层次、一种关系上的主体,在另一种层次、另一种关系上就是客体。从高校目标管理的目的来看,高校教学、科研和学习的客体是知识,它以学科的形成而存在。对教师来说,它是加工、整理和传承的对象;对学生来说,它是接受、理解和掌握的对象。目标是指高校目标管理预期要求达到的目的或结果。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高校目标管理中的目标进行分类。从量化构成看,目标可以分为数量工作目标和质量工作目标;从责权关系看,目标可以分为总目标与分目标;从时间关系看,目标可以分为长期目标、中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从目标的性质看,目标可以分为战略目标、战术目标和操作目标等。条件是指制约和影响高校目标管理存在与发展的相关因素,主要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投入。物质文化条件是制约高校目标管理的主要因素,不仅制约着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而且制约着高校目标管理的规模、速度、形式和目的,制约着目标的实现程度。手段指高校目标管理为实现预期目标所采取的途径或措施,包括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制度手段、信息手段、调节手段、激励手段等。这五大要素之间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推动高校目标管理的整体发展。

从运行机制上分析,高校目标管理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四个阶段”、“十四个环节”运行的完整而连续的循环系统。一个中心,即所有工作都要以实现学校总目标为中心。四个阶段即目标制定、目标实施、目标考核、总结反馈。每个阶段又包含若干环节。

目标制定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学校总目标的制定,即学校根据党和国家的教育政策、法规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深入调查学校自身发展现状和外部环境的基础上,制定适合本校校情的远景目标和近期目标;二是单位、部门及个人目标的制定,即单位、部门根据学校总目标确定自身目标,然后通过一系列量化和细化工作,将目标分解到教职员工个人。目标制定中包含论证决策、协商分解和定责授权三个环节。

目标实施既指学校总目标及分解目标确立以后,各单位、部门、个人围绕目标做出种种努力,也指学校管理系统为了保证目标实现而采取的一系列宣传、监督、检查、调整等措施,主要包括咨询指导、监控督察和调整纠偏三个环节。

目标考核指考核主体对照工作目标,参照绩效标准,采用科学的考核方法,评定单位、部门、个人的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工作职责履行程度等。目标考核主要包括选择考核主体、下达考核指标、制定考核标准、设置考核周期和选择考核方式五个环节。

总结反馈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学校以事实和数据为载体,向各单位、部门、个人反馈考核结果;二是学校针对考核中的实际情况,特别是一些不平衡指数进行分析研究,将指导性意见反馈给各单位、部门、个人。总结反馈主要包括两个环节:反馈考核结果和指出改进方向。





高校目标管理的四个阶段与十四个环节是一个完整的、连续的循环系统,由目标制定开始,经目标实施、目标考核,再到总结反馈,每个阶段的各环节紧密联系,环环相扣,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目标链。

二、高校目标管理的主要特征

高校目标管理除了具有一般目标管理的共性特征以外,即目标的明确性、员工的参与性、时限的规定性、自我控制性、权责的共担性和自我评价性以外,还具有以下特征。

1. 主客体关系的辩证性

主体和客体作为高校目标管理系统中的两个基本要素,相互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关系划分是相对的,此一时的主体可能是彼一时的客体,反之亦然,从而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处于动态变化中。(1)主客体相互依存。在目标制定中,作为主体的学校领导层与作为客体的单位、部门及教师个人之间是利益共同体,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一方面,作为主体的高校管理层虽然是高校总目标的提出者和最终决策者,但总目标的最终分解和实现,都需要客体——学校各单位、部门 and 个人的积极参与、协商和努力。另一方面,作为客体的各单位、部门、个人,其目标的实现也只有在学校总目标实现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所以通过目标制定,把主体与客体“捆绑”在一起了。(2)主客体相互促进。在目标实施过程中,作为管理主体的学校领导、职能部门和其他二级单位及个人处于“你帮我忙,我助你力”的相互促进关系。一方面,作为客体的教学院系的工作目标一经确定,院系负责人自然要组织力量去实现目标。但如果教学院系本身的力量不足以完成目标,作为主体的学校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要积极创造条件帮助院系完成工作目标。而另一方面,只有教学院系的各项工作顺利完成,才能有效保证职能部门的目标顺利完成,从而使学校的年度工作目标圆满完成。(3)主客体相互制约。在目标实施过程中,主客体之间还存在着“你控制我,我监督你”的相互制约关系。作为管理主体的学校领导,要对各二级单位的目标实施情况进行全面监控,同时,二级单位也对职能部门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所以主体与客体都是控制的受众。(4)主客体相互转化。在目标考核过程中,主客体之间是“你即是我,我即是你”的相互转化关系。学校领导、职能部门、直属机关作为考核主体,要对每一个教学单位进行评定,同时他们又是被考核者,要接受下属单位或教师对他们的评价。

2. 目标的一致性与多元性



学校总目标只有一个,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围绕它来进行,这就是目标的一致性。

目标的多元性是指总目标的不同侧面的反映,或者总目标可以用不同的指标来全面地反映。如一所大学的总目标是建成国际一流的大学,那么总目标的多样性也可以从总目标的不同侧面来反映:招收高质量的学生、聘请国际一流的教授、出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毕业生质量为世界所公认、教学研究条件一流、学术氛围与环境良好、服务系统高效、学校教授薪金福利一流、运作经费充分等。以目标的一致性为前提,实行

多目标的共存,是高校目标管理的一大特点和优点,有利于充分发挥目标管理方式的优势。(1)共同基础上的一致性。高校目标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系统的整体性要求总目标与分目标、分目标与分目标之间协调一致,没有摩擦,没有不必要的重复劳动,朝着同一个方向迈进。目标制定是高校目标管理工作的起点,要求从全局出发,通盘考虑学校发展,使制定出的总目标能很好地统率分目标。(2)原则区别下的多元性。在现代复杂的社会结构下,高校组织结构日益复杂,必然需要各种不同的目标服务于不同组织的发展,这些目标服务于高校组织的发展,就造就了高校目标管理中目标的多元化,也就是复杂高校组织结构中目标的多元化。这些多元化的目标,是从不同的视角对目标进行各层面的分解。从时间上可以分为长





期目标与短期目标;从目标性质上可以分为刚性目标与柔性目标;从目标结构上可以分为组织目标和个体目标;从目标高度可以分为维持目标和创新目标等。(3)促进发展中的统一性。目标的一致性和多元性是互相联系,互为条件的。在一致的基础上产生多元,在多元的前提下讲求一致,即一致是多元的基础,多元是一致的前提。二者需要相互促进,通力合作,才能相得益彰,共创佳绩。

3. 条件的适应性与设计的整体性

高校要顺利、有效地从事目标管理的实践活动,必须依靠一定的物质文化条件。物质文化条件制约着高校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制约着管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制约着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制约着目标管理活动的规模、形式、目的,进而制约着整个目标管理活动。进行高校目标管理,需要考虑制约高校发展的内、外部现有条件,分析高校可能创造的条件,在认识学校共性的基础上进行学校个性的探索,揭示每所学校在自己特定条件下所创造的新鲜经验以及产生的新问题,使目标管理依据条件,促进学校的发展,提高办学水平。与此同时,条件也是学校发展程度与规模的体现,反映的是某一学校的历史变迁和现实情况,其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往往蕴含着许多具有普遍启发意义的内容。只要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局部扩展到整体,就可以揭示出目标管理在适应高校发展中的规律性。因而在高校目标管理中,设计的整体性就显得尤为重要。贝塔朗菲把“整体大于各个孤立部分的总和”作为一个重要的定律提出来。注意整体性是研究事物本质的重要途径,而事物的部分是通向研究事物本质的要素,各部分的确定性惟有参照整体才能表现出来,脱离了整体,任何部分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高校目标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根据现有条件,在整体规划下明确分工,在分工的基础上有效综合,以求达到整体的最佳效益,这就是现代管理的整分合原理。

4. 全员的参与性与分工的协调性

主客体辩证法决定了高校目标管理必须是全员参与,上至书记校长,下至普通教职员工与学生,一起参与目标的制定,一起参与目标的实施,一起参与目标的考核,一起参与目标的总结。由于这种做法纠正了古典管理学派偏重以工作为中心、忽视人的一面,又纠正了行为科学学派偏重以人为中心、忽视同工作结合的一面,把工作和人的需要统一起来,能使教职员工发现工作的兴趣和价值,在工作中实行自我控制,通过努力工作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需要,组织的共同目标也因此实现。全员的参与性摒弃了“唯我独尊”的霸权主义,秉承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人本精神,彰显了“无敌于天下”的管理谋略。但全员参与并非杂乱无章的参与,而是在此过程中,组织设计既要分工明确,又要互相沟通、协作,以达成共同的目标。从分工的角度而言,就是要提高管理的专业化程度和工作效率的要求,把组织的任务、目标分解成各个层次、各个部门以及个人的任务和目标,明确各个层次、各个部门乃至个人应该做的工作以及完成工作的手段、方式和方法。从协作的角度而言,就是要明确部门与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的协调关系与配合方法。

5. 方式的多样性与手段的灵活性

高等教育大众化国家的实践充分说明,多样性是当今高等教育中值得欢迎的趋势,也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这是三种因素使然:一是社会经济对人才的规格、类型、层次需求的多样化;二是人才学习需求的多样化;三是为多渠道解决经费问题而形成的办学主体和办学形式的多样化。大众化高等教育这种多样化的特点,必然要求我们确立与之相适应、相匹配的多样性的高校目标管理方式,并采取与之相辅相成的手段。有什么样的方式,就需要什么样的手段与之匹配。在注意高校目标管理方式多样性的同时,还应保持特殊条件下实现目标的手段灵活性,即选择实现目标的手段应在面对管理方式变化时具有可塑





性和适应性。目标是未来一年、两年或更长时间所要达到的期望值,随着形势的变化,组织内部和外部的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及环境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原来难以实现的目标,现在可能已失去努力实现的意义,原来对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没有影响的因素,现已成为迫切要实现的任务,所以,目标的实现是伴随着目标作适当的调整的过程。手段的灵活性使目标在发展方向、发展重点、发展速度等方面能与时俱进,确保目标成为促进整体和部门发展的动力和方向,使整体和部门始终充满积极向上的生机和活力,体现出目标的动态特性。

三、高校目标管理的实施策略

高校目标管理是一种强调工作成果,鼓励过程创新的综合性管理办法。其基本要求是,目标制定要具有合理性,目标实施要具有实效性,目标考核要具有科学性,总结反馈要具有适时性。

1. 合理制定目标

目标是一个组织或一个人努力的目的,更是一切行动的方向。合理制定目标是高校目标管理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1) **充分论证,正确决策。**论证决策是目标制定的基础与前提。从战略管理的视角分析,目标制定必须依据党和国家的教育政策、法规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的任务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具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具有专门科学文化知识、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级专门人才。这一目标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总体目标,高校目标管理必须要围绕这一总目标来制定学校目标。我国有几千所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等院校,各个高校要根据自己的历史、现行条件(师资力量、教学设备等)提出适合自己发展、有自己特色的发展目标。基于这一认识,论证决策要考虑四方面的要求:一是科学性与民主性相统一,即目标既要实事求是、高低适度、准确可行,又要充分让教职员工参加目标的制定,集思广益。二是全面性与重点性相统一,即目标制定既要有全局观念、整体观念,考虑到国家、社会以及学校发展的需要,又要明确工作的重心,抓住主要矛盾,选取关键目标,集中全力攻关。三是挑战性与可行性相统一,即目标制定既要与时俱进,能激发人们的拼搏精神,增强人们的竞争意识,又要切实可行,在现有人力、财力、技术、设备、人员素质和管理水平等条件的基础上,使目标责任者感到通过努力可以“跳一跳,够得着”。四是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即目标制定要具有一定的可调节性,对于实施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环境、条件变化,以及来自其他方面的随机性干扰,目标本身要具有一定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制定的目标不能朝令夕改,要保持其内在的连贯性。

(2) **上下协商,综合分解。**目标分解就是将整体目标在纵向、横向或时序上分解到各层次、部门以至具体个人,形成目标体系的过程。目标分解是明确目标责任的前提,是使总体目标得以实现的基础。目标分解的方式有三种。一是自上而下分派式,即先由高校最高管理层公布总目标草案,然后将指标依次分派给各单位、部门及个人。若各单位、部门、个人对分派指标无异议,则总目标即告定案,部门目标与个人目标也相继确定。这种分解方式带有独裁的特点,容易促进权威,用得过多会有损士气。二是自下而上汇总式,即先由各单位、部门及个人根据实际情况,将分派而来的目标草案酌情修改,并呈送学校核定后正式确定。自下而上的目标分解方式具有启发性,通常有利于创造民主的气氛,能满足下属“自我实现的需求”,而使其全力以赴去实现目标,但不利于宏观控制。三是上下沟通协商式,即先由学校管理层颁布总体方案,经与各单位领导磋商并获得同意后确定草案,然后各单位领导依据总目标,设定各单位的目标草案,经商讨并获得支持达成承诺后定案。最后,各二级单位依据部门目标,拟定自己的个人目标草案,经与单位同仁协商后定案。合理分解目标一般要经过“三上三下”,也就是要综合运用三种方式,才能形成较为合理的目标体系。





(3) 明确职责, 大胆授权。定责授权就是拥有权力的上级, 不但给予下属一定的任务和责任, 而且要授予他们实现目标所需要的权力。列宁曾说, “管理的基本原则——一定的人对所管的一定的工作完全负责;” “责和权相一致, 这是提高管理效率所绝对要求的”。分解目标, 明确职责, 也要授予相应的权力。责与权既对立又统一, 有责无权, 任何人都不可能对工作实行真正的管理; 责大权小, 许多事情都要请示领导, 由领导决策、批准, 实际上等于宣告下级不必对工作完全负责; 有权无责, 其结果是权力泛滥, 使管理缺乏监督。故只有贯彻权责对等原则, 才能使目标管理得到有效实施。但授权不等于不管, 放权不等于放任。作为管理者, 掌握授权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放得开, 收得拢; 该放就放, 该收就收。要合理授权, 一是要适度授权, 根据目标执行者的目标责任性质与范围来确定其权限的范围与程度。对于能够使目标执行者自主管理完成目标成果所需要的相应权限, 学校都应予以认真考虑和委任。二是明确授权, 根据已经明确的目标进行授权。如果所设定的目标不明确, 职责不清楚, 那么就难以确定为实现其目标需要的相应权限。因此, 制定明确的目标, 根据目标责任实行授权, 是授权的前提。三是监督授权。授权者并不能由于实行了授权, 就完全解除其应负担的责任, 还应该对被授权者的目标实施情况及行使的职务权限是否妥当担负监督的责任。

2. 有效实施目标

制定目标是为了实现目标, 目标能否实现, 实现程度如何, 与目标实施的有效性休戚相关。有效实施目标是高校目标管理成功的保证。

(1) 咨询指导有方。高校目标管理是一种需要全校教职工参与和每个个体自我控制的管理方式, 而在实践中, 不少教职员对这种管理方式并不了解。因此在高校推行目标管理, 首先要做好咨询指导工作。一是通过网络、会议、广播等途径加强宣传工作, 营造“上下同欲”的氛围, 使各级领导、广大教职工形成共识, 从而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努力; 二是重视目标管理过程中的咨询和答疑解惑, 尤其是分批次深入各单位、部门进行指导; 三是注意目标管理过程中的信息收集、资料整理等工作。

(2) 监控督察得力。监控督察即对目标管理过程实施监督与控制, 目的在于保持事物的稳定状态或促进事物由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换。在目标管理过程中, 各种突发事件和内外环境的改变都会影响目标的实现水平, 若不对其进行有效的监控, 就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这就需要学校建立高度灵敏、及时、得力的信息控制系统来疏通各项工作的渠道, 使上情及时下达, 下情及时上报, 以便学校领导及时准确地掌握情况, 果断地解决问题。监督控制有两项基本要求: 一是适时性监控, 即目标一旦发生偏差时, 能够迅速发现, 及时纠正。甚至在未出现偏差之前, 即能预测偏差的产生, 从而防患于未然。二是关键点监控, 即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系统过程中的突出因素, 掌握系统状态, 了解执行情况, 可以选择重点目标为关键点。同时对个人来说, 可采用“自我控制”的方式来取代强制性管理, 推动他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工作做好。

(3) 调整纠偏及时。学校管理者应通过信息反馈机制关注整个管理过程, 尤其是对各级目标实施中出现的偏差要及时做出调整。首先是要调节目标中因事先考虑不周全而造成的不合理部分, 其次是工作对象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后需要调整的部分。应定时检查和分析各级目标的实际执行偏差和实现情况, 有效控制目标。当发现目标不尽合理、目标计划本身有偏差时, 必须修正目标计划。特别是当客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目标本身有重大失误, 使预定目标和计划不能继续执行时, 必须重新调整目标, 全面改变计划。



3. 科学考核目标





没有考核就没有管理。科学考核目标是高校目标管理成功的关键。

(1) 多元选择考核主体。考核主体是指目标考核活动的承担者,分为个人主体、集团主体和社会主体。费尔巴哈说:“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主体不同,考核意识不同,考核结果就会不同。高校目标考核工作是多方面的,工作业绩是多维度的,不同的主体对同一工作的价值判断也是不同的。根据此原理,人们在实际工作中开发出一种全视角选择考核主体的方法——360度考核法。此法又称全方位考核法或多源考核法,是指从与被考核者发生工作关系的多方主体获得被考核者的信息,以此对被考核者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考核,以提高考核结果的公正性。依据此法选择的考核主体主要包括主管领导、师生群体、同级部门、单位自身、外部专家等。

(2) 客观下达考核指标。考核是一个无形的指挥棒,指标的设定将使考核客体围绕指标转,制定科学的考核指标是目标考核系统高效运转的保证。要使考核指标客观,一是放眼学校发展,制定战略指标。战略指标是从宏观上对学校工作进行规划,战略指标的下达具有其战略导向性。依据不同高校工作的重点、基本点和亮点,可以将考核指标分为核心指标、基本指标和个性指标。二是立足考核需要,制定战术指标。战术指标是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出发,对考核工作加以描述。为了使考核具有科学性,战术指标的制定要在战略指标的基础上进行细分,考核指标可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类。定量指标用于考核可量化的工作,侧重于考核工作的结果,而定性指标则用于考核不可量化的工作,侧重于考核工作的过程。

(3) 明确制定考核标准。考核标准和考核办法是紧密相关的,标准模糊,就会造成考核困难。制定明确的考核标准,一是以数量考核为参照,下达定量标准。定量标准就是根据考核指标,运用数学公式,从数量方面测算目标的实际情况,将抽象描述转化为具体分数的方法。“数字是最公正的判官”。定量方法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精确性,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它把标准定义在了人们能理解的范围,抛弃了人们只对事物原因和结果进行主观臆测成分居多的分析,而代之以数学符号和公式,使人们的认识由模糊变得清晰,由抽象变得具体。二是以质量考核为依托,下达定性标准。定性标准是从质的方面来考核目标的执行情况,对于不便采用定量方法进行考核的目标,可采用定性标准加以考核。采用定性指标考核,便于对整个工作进程进行评价,适用的范围较广。定性标准的制定常用简单分等法,就是按优、良、中、可、劣或者按A、B、C、D的等级进行评定。

(4) 认真研究考核周期。考核周期也称考核频率,即多长时间进行一次考核。考核周期短,则称高频率考核;考核周期长,则称低频率考核。短周期考核一般为一至三年,长周期考核一般在五年以上。短周期考核与长周期考核各有利弊。从原理上来说,考核频率越高,则考核效果越好,但在实际设计中,既要考虑考核成本、考核制度的实用性与适用性,又要在客观上符合结果性目标与行为性目标自身周期的特点。对于结果性目标,要采用低频率的考核周期。对于行为性目标,则宜采用高频率考核周期。

(5) 恰当应用考核方式。考核方式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只有适用之别,没有适合一切高校的通用的考核方式。因此,考核方式的选择要突出适应性。根据不同目标的性质和特征,考核方式可以分为绝对考核和相对考核。绝对考核是学校各单位或个人完成工作的数量和质量与学校下达给该单位或个人的工作目标的比较。绝对考核也称无条件考核,具有不受外界影响而能保持其性质、大小等的特征,反映了一种“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的价值判断,具有高绩效性,它适于用定量标准进行考核。相对考核是学校各单位之间完成工作的数量和质量比较。相对考核也可称为参照考核,反映了目标和考核标准之间的粗略比值,因而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有限的,但它可以满足对许多粗放性管理工作进行考核的需要,不可抹杀,否则会堵死回旋的空间,导致管理的僵化。由于相对考核侧重于行为的描述,在实际操作中适于用定性标准进行考核。





4. 适时反馈目标

总结反馈为学校管理层与单位、部门和个人之间提供了一个更为正式的沟通机会,有利于协助单位、部门和个人进一步了解自身工作情况,提升成绩。为提高管理的渗透力和工作效率,目标反馈要因情而适。

(1) **及时反馈考核结果。**考核结果是一种期待,所以要及时反馈。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以学校的事实和数据为载体,向各单位、部门持续反馈考核结果。二是学校针对部门考评中出现的一些实际情况,特别是一些不平衡指数作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将研究和分析得出的指导性意见及时反馈给各部门,指引和督促其改进工作。

(2) **按时兑现考核奖惩。**考核奖惩是一种长效机制,因而要按制度按时兑现,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一是加扣薪酬。薪酬激励与相应制度相结合,通过建立一套制度,创造一种氛围,以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使组织成员都能以最佳的效率为实现组织的目标多做贡献。薪酬激励还必须公正,但不搞“平均主义”。为了做到公平激励,必须对所有职工一视同仁,按统一标准奖罚,不偏不倚,否则将会产生负面效应。二是升降职位。职位的升迁是单位领导者实现事业抱负的心理需要,反映了他们的一种精神需要,以之为动机进行激励,既能以金钱留人,更能以事业留人。

(3) **及时指出改进方向。**总结反馈既针对成绩,更针对问题,时间长了,就会印象淡漠。对于成绩需要及时肯定,并要讨论如何采取措施进一步巩固;对于不足,应当及时讨论目标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深入了解其原因,采取措施或计划来改进提高。

(本文系华中师范大学“高校目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课题的阶段成果之一。)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董泽芳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继平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
2008年第11期



上海理工大学校长许晓鸣访谈: 百年老校的创新追求

作为一所具有百年历史的高校,上海理工大学致力于以创新理念、创新手段培育创新人才。前不久,记者走访上海理工大学,请校长许晓鸣教授介绍了学校的办学思路和做法。

记:您这样说过:“大学与大学的竞争不仅表现在可以量化的实力上,更表现在不可量化的特色上。”上理工可以量化的实力怎样,不可量化的特色为何?

许:大学竞争力体现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量的竞争力是外在的、现实的,质的竞争力是内隐的、潜在的。质的竞争力是量的竞争力的基础,是大学竞争力的核心所在,它最终决定着大学竞争力的强度。





上海理工大学是一所百年老校,学校现有专任教师1187人,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人员458人,教师中已获博士学位的291人;现有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国家级人才或有重大影响的学术带头人20多位。“十五”以来,承接国家级科研项目92项,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47项,公开出版著作700余部,发表论文11000多篇,申请专利539项。2007年,学校的科研经费总额达到2.2亿元,比2001年增长5.1倍。

在具有了量的竞争力的同时,上海理工非常注重质的竞争力的培育,重视对学校办学特色的凝练和培植,在大学的各项功能上已形成了明显特色:在人才培养上,确定了个性化、复合型、国际化的工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定位;在科学研究上,明确在先进制造、医疗器械、出版印刷三大产业领域前沿实现选择性突破;在社会服务上,依托上海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通过校园创新文化的积极营建,大力开展全员参与的创意、创造、创业“三创”实践。

记:把特色转化为竞争力,支撑学校的长远发展,采取了哪些措施?

许:特色是一种潜在的竞争力,为了实现其向现实竞争力的转化,我校在学科结构优化、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定位等方面进行了如下思考:第一,围绕国家经济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实施学科整合优化,将学校现有学科整合成了“动力、能源与环境工程”、“光学与电子信息工程”、“系统、管理科学与工程”、“先进制造及装备技术”、“医学工程与食品安全”、“新媒体与出版印刷”六大学科群。第二,围绕学校学科发展需要,实现智力资源优化,有选择性地引进师资,尤其是开展了相关学科带头人的引进工作。第三,围绕社会对于专业人才类型的需要,开展了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课程评价以及环境氛围营造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改革。

记:上海理工是上海市首批受理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申请的四所高校之一。学生创业教育收获了怎样的成果和经验?

许:自2002年创业教育伊始,学校就启动了“两个‘一’计划”,即为学生开设一门创业课程和编写出版一本创业教育专用教材。2005年,在全国率先设立了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同年,与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上海大学一起成为上海市首批受理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申请的高校。

自2005年设立创业基金受理点以来,已组织500多名学生参加创业培训。目前已有302个学生团队递交了创业申请,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批准资助项目达103个,资助资金1150万元。有59个创业项目已经实施,完成注册并开展经营活动的有50家学生创业企业,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40个。同时,创业教育理论的研究也取得成果,完成了《在校大学生与科技中小企业互动模式研究》、《上海大学生科技创意平台建设》、《上海大学生自信人格及其教育》等上海市重点科研项目,同时获准建设《大学创业学》上海市重点课程。

实施创业教育,我们的主要经验有三:第一,要科学地理解创业教育的内涵。实施创业教育,关键在于培养学生的创业素养,培植学生的企业家精神,学生能否创业及其创业能否成功,应该顺其自然。第二,创业教育开展需要有力的平台支撑。我校的国家大学科技园、学生创新创业中心等均是保障创业教育实施的有力物质平台;而将创业教育的地位上升为一个辅修专业、乃至第二学位则是创业教育有效开展的制度保障。第三,创业教育成果的获得需要系统的保障。要形成一个完整的创业教育体系,其中包括师生创业教育观念的形成、培养计划的修订、课程结构的优化、教学方式的改革、师资队伍的配置、实习基地的建设等。





记：上海理工大学通过教育的创新来实现培养创新人才的目标。请您介绍一下学校创新教育方面的做法。

许：第一，实施课程与教学改革，构建创新性的课程体系。建立了以六大学科群为基础的学习平台，并通过全课程选修，构建了学生个体化的课程体系，形成了他们利于创新的知识结构。通过创新素质拓展专门学分的设立，跨校辅修、“第二专业”学习等制度的完善，培养更多“交叉复合型”人才。

第二，探索多元化的培养路径，实现个性化的创新教育。坚持个性化的现代教学理念，通过同一课程分层设置的做法，实现了每位学生都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发展的目标。在学习过程中，重视学生的分类型培养，对“研究型”学生实行学术导师制，对“应用型”学生则为其创造各种实习、实践机会，对“专长型”学生，为其专长的进一步加强创造各方面有利条件。

第三，构筑多目标培养体系，开展全程式的创业教育。创业教育是创新教育的一个方面。学校确立了从培养学生的创业素养、企业家精神到帮助学生成功创业的多层次创业教育目标。通过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各类创业教育活动的开展，“学生创新创业中心”的建设、“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的设置，以及大学生进入科技园区的制度保障，使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实施学校创业贯穿于大学教育的全过程。

第四，实践多种合作教育模式，培养大批竞争性国际人才。先后与美国、德国、英国等10多个国家的33所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使学校的国际化教育覆盖了16%的本科专业和18%的本科学生。学校坚持国际化的人才培养方式，试点小班制上课的人数已达到2000余人。

第五，开展自主式实践改革，营造探究性的学习环境。目前已建成具有较大影响的本科实习基地数百个，获批建设“沪江创新创业”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和“现代出版印刷”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并于2008年获准成为第二批国家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项目实施学校。

作者：曹继军 **来源：**光明日报 2008年12月12日



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

——中国成长报告·教育篇

关注人的发展

或许，至今我们还在追问：我们的教育土壤里缺了什么，以致孩子这么艰难地生长？或是我们施了过多的化肥而使他们失去了自然的环境？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答案：解放。解放我们的情怀，解放我们的观念和思想。





不论是素质教育的提出、课程改革的推进还是高考方式的些许变动、高校自主招生的试行，这其中传达出的对人的尊重，立足于人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是教育变革 30 年最鲜亮的一笔。

“促进生命——让它自由地发展、展开——这便是教育家的首要任务。”蒙台梭利许久以前就曾这样道出教育的意蕴。今天，这样的理念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这样充满人文关怀的教育也让人们感受到了教育的阳光与乐趣：

活动让孩子们留恋——爱写的孩子们创建了他们自己的杂志，爱说话的孩子主持班里的午间论坛，爱玩游戏的孩子讲游戏中的历史；

研究让学生们着迷——观察城市的汽车牌照，由牌照的号码设计来估计城市汽车的最大容量；计算进气旋钮旋多少度时，煤气灶的燃烧效率最高？

情爱让孩子们温暖——耐心地倾听，相通的体验，还有宽容、激励。

可以天马行空，可以激情投入，可以在释放的空间自我做主。

课堂，不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学校，不再是标准化的教育工厂。老师，不再是裁剪划一的园丁。

教育已经进入一个以人为本的新的历史阶段。教育思想在转变，考试制度在改革，评价标准在改变，凸现的是生命的灵动，独特，创造，智慧。

这也许是我们所期望的：“理想的学校，理想的教育，使你能试着发现你自己：发现你喜欢什么，需要什么；你善于做什么，不善于做什么。”

每个人都会发展成为他自己。可以，放弃大学；可以，成为技师；可以，毕业后卖肉、卖菜；可以，成为白领，坐在写字楼里。

普通的工作，因为真心喜欢，也会变得趣味无比，也会因此创意无限。

找寻适合每个人发展的好的教育。每个生命该是如何的让人欣喜！这个社会该是如何的色彩斑斓！唯其探索，唯其期待。

一个人口大国的教育奇迹

1977 年，一场阔别十年的考试改变了几代人的人生轨迹。中国，一个生机盎然的新时代由此开始。

知识改变命运，此后 30 年间，一代代学子以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相互叠加，诠释教育的力量！

“机会来了。”王辉耀依然记得 31 年前那个晚上，恢复高考的消息从广播站大喇叭里传来时的兴奋。命运的出口仿佛就在这一瞬间被打开了。今天，上了广州外院，在前外经贸部工作过，后又出国留学，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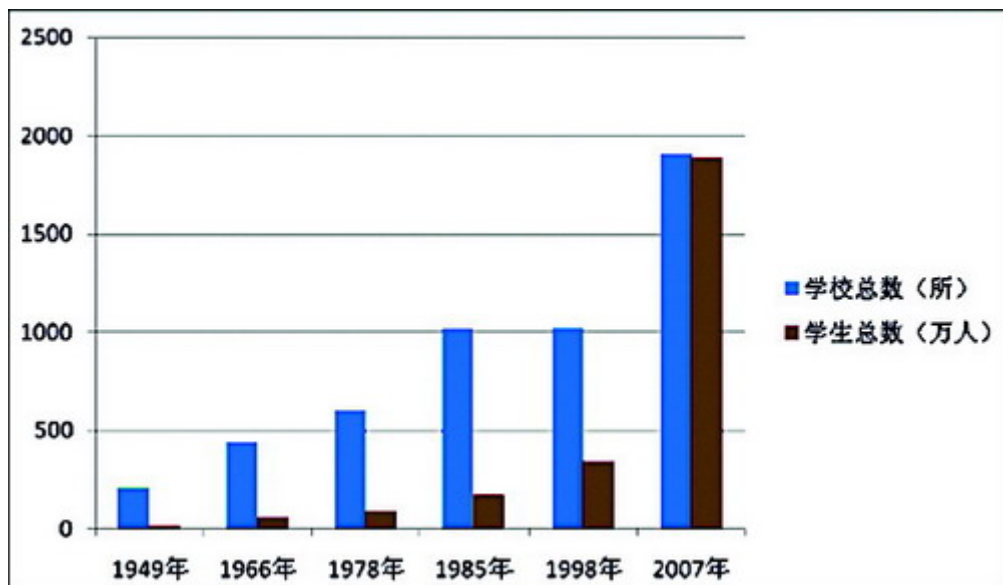




最终选择回国创业的王辉耀回想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时，仍然会毫不犹豫地作答：“改革开放，恢复高考。”而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决定则是，“出国留学。”

回望 30 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人们把恢复高考称为中国改革的先声，把出国留学比作中国开放的前奏。而事实上，30 年间，3600 万人迈入大学，120 万人走出国门，他们鲜活的人生画卷共同构成了令世人惊叹的中国故事。

30 年，我们共同见证中国的荣耀，分享教育的奇迹。



中国普通高等教育的学校总数和普通本专科学生总数比较

转变——战略抉择改写历史

“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今天，重温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当年的教诲，多少人心有感悟，又满怀感激。

从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到把实施科教兴国作为基本国策，再到人才强国战略，中国在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战略机遇面前，作出了攸关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重大历史抉择。中国教育实现了一次次历史跨越，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正是在这一次次跨越中，中国教育的成就举世瞩目。

30 年前，在邓小平同志的主导下，以教育为突破口的拨乱反正，使教育战线率先得到全面恢复和整顿，教育的春天与思想解放的曙光相伴而至。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桎梏，教育优先发展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时代最强音。

前进的征途上，一些抉择注定会改写历史——

1993 年，酝酿 5 年之久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出台，这份被称为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最有指导意义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决策性文件，进一步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又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1998年3月,初春的北京因一项国策的出台而激扬兴奋。新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面对600多位中外记者庄严宣布:“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这是影响乃至决定中国未来前途与命运的重大国策。从1995年,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首次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到1996年,以具有法律效应的形式将“科教兴国”确定为基本国策,再到1998年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成立,用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话说,“科教兴国,一字千金”。

因为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从神五到神七……中国科学家完成了一系列惊天之举;因为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中国在不到三分之一的世纪中实现了普九,使全体国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30年前的不足5年提升到现在的8.49年。

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对知识经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提出了人才强国战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跨越——世界为之惊叹

教育的贫困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贫困。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承载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如何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才资源优势,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战略选择。

2001年1月1日,新年的曙光把一个来自中国的好消息传向全世界,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宣布:中国如期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

从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历经15年艰苦奋斗,中国初步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义务教育问题。

2003年9月,中国政府再次宣布,众志成城,实施西部“两基”攻坚计划。随后,“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两免一补’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等先后推出,到2007年底,“两基”攻坚计划如期完成,西部地区“两基”人口从2003年的77%提高到98%,我国全民教育又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2007年的春天同样令世人瞩目。从这一年开始,所有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免交学杂费,“种田不纳税,上学不缴费”,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终于实现。

而在高等教育领域,始于世纪之交的深刻变革为很多人的人生带来转机,更使中国由此走入教育大国的行列。1999年,国家计委、教育部联合宣布,在年初扩大招生规模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计划。这一年,普通高校招生从上年的108万人扩大到156万人。此后3年,中国高等教育迎来了发展最快的时期,招生人数和在校生数三年翻了一番,至2002年秋季,我国各类高等学校在校生已达16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98年的9.8%提高到15%,历史性地跨入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2007年,我国高等教育普通本专科招生达到566万人,高等教育在校总规模超过2700万人,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我国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





与此同时，“211 工程”、“985 工程”等的实施，使中国高校有了集中力量迈向世界一流的可能，从高教大国到高教强国，中国有了自己的时间表。

目标——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

“家无才不富，国无人不强”。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12 亿人口的人力资源优势一旦发挥出来，是任何力量也比不了的。

2007 年 10 月 15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响亮地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这是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站在历史和时代的战略高度，审时度势，着眼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全面继承中国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一贯倡导的优先发展教育和科教兴国战略思想，对中国未来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优先发展教育被作为改善民生之首写入十七大报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近年来，中国教育领域一系列里程碑式的事件符合民意，赢得了民心——

2007 新学年，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建立健全了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从此都能上得起大学、接受职业教育；

同年，师范生免费教育开始在 6 所师范大学试行；

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强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教育再一次蓄势待发。

作者：靳晓燕 丰捷 来源：光明日报 2008 年 12 月 18 日

深圳市多所大学设置高校计划特聘教授岗位

深圳大学、深职院、深圳信息学院及北大、清华、哈工大、暨南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有 26 个专业即将设置深圳高校鹏城学者计划特聘教授岗位。目前这些岗位已向社会进行公示。

根据《深圳市高等学校鹏城学者计划实施办法（试行）》（深府〔2007〕153 号），深圳将在市内全日制高校中实施“鹏城学者计划”。学校设立特聘教授岗位，聘请国内外著名教授和学科带头人，以促进重点学科发展。特聘教授按聘期年限分为长期、短期两类，实施周期为 3 年，其中包括 15 个长期特聘教授岗位，45 个（每年设置 15 个）短期特聘教授岗位。长期特聘教授聘期不得超过 3 年，聘期内每年须在受聘高等学校工作 9 个月以上；短期特聘教授聘期不得超过 6 个月。

据悉，特聘教授资格审查非常严格，一般具有博士学位，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工作，原则上 50 周岁以下，特别突出和紧缺的人才不超过 60 周岁；海外应聘者一般应担任高水平大学副教授及以上职位或其他





相应职位，国内应聘者应担任教授或相应职位，并具有博士生导师资格；学术造诣高深，有较高的学术声望，在本学科研究领域取得国内外同行公认的重要成就，并能胜任核心课程讲授任务；对本学科建设具有创新性构想和战略性思维，具有带领本学科在其前沿领域赶超或保持国际先进水平的能力；有较强的团结协作领导能力。

根据该计划，政府财政专项经费支持，政府提供普通高等学校长期特聘教授岗位资助为每年人民币 30 万元，高职院校长期特聘教授岗位资助为每年人民币 20 万元。但是，特聘教授的薪酬待遇最终可由高等学校与特聘教授本人协商确定，高出政府标准部分，学校可以自己解决。短期特聘教授岗位资助为每月人民币 3.5 万元，高职院校短期特聘教授岗位资助为每月人民币 2.5 万元。另外，高等学校要为长期特聘教授提供配套科研经费，人文社会科学类不低于 50 万元，其他学科不低于 100 万元。

作者：郑柱子 来源：中广网 2008 年 12 月 3 日

两年来上海高校社团数量增长 37%

2008 年上海高校学生社团发展论坛暨第五届上海大学生社团文化节闭幕式日前召开。主办方表示，学生社团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截至今年 11 月，上海高校的学生社团可分为理论学习、学术科技、公益实践、文体体育、网络信息及就业创业等六大类，总数共有 2883 个，比 2006 年统计增长了 37%。社团注册会员人数达到 26 万多人，占上海高校学生总人数的 47.0%，比 2006 年社团注册人数增长了 54%。有 90% 以上的大学生参加过学生社团举办的各类活动。

社团发展报告指出，社团发展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体现在注重社团服务社会功能，社团跨校活动日趋活跃，同时社团也越发积极利用社会资源。

此次论坛由团上海市委、上海市教委等主办，来自全市 50 多所高校的 300 余位社团管理教师、社团负责人参加。

主论坛以改革开放 30 年为背景，以“新时期挑战下高校学生社团的思考与展望”为主题，参会师生代表共同探讨、总结改革开放 30 年来高校社团组织的发展历程和成长经验，深入分析和探讨在当前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氛围中高校学生社团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为高校社团的未来发展出谋划策。

作者：龚瑜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08 年 12 月 16 日





域外 教育

世界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发展背景、模式和趋势

摘要: 20 世纪中期以来,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凸显、高等教育教育成本的提高,以及公共权力问责的兴起,使世界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得以发展和改进,目前已经形成了认证模式、审核模式、政府评估模式和自我评估模式,并在质量评估的理念、目的、主体、机制、内容、方法、技术、标准、反馈等方面显现出一些共性趋势。

关键词: 高等教育, 质量评估, 评估模式

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在 20 世纪中期以来的世界高等教育演进变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和效用,其关注点也经历了从粗到细、从量到质、从划一到多样、从量“入”到评“出”的发展过程。考察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发展进程,可以看到其背景因素、基本模式和共性趋势。

一、世界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发展的历史背景

20 世纪 50~60 年代,西方主要国家的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一些国家的高等教育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引发了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担忧和关注,加之公共权力问责潮流的兴起,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并获得发展。

1. 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与多样化发展逐渐凸显质量问题

二战后,在国际竞争、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民主化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由精英向大众化、普及化发展的历程。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蓬勃发展,新型的教学和学习方式趋于多元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大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同时也凸显了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的矛盾。在高等教育数量扩张与多样化发展的形势下,如何保障质量成为当时各国高等教育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2. 高等教育经费总额与结构的变化要求提高利用效率,保障投入收益

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教育水平的逐步提升、教育技术手段的持续更新和学生培养成本的日渐提高,促使高等教育对投入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尽管各国都面临着国家预算日益紧缩与教育经费需求持续增长的矛盾,但高等教育投入经费的总额还是不断增加,高等教育经费在国家公共开支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与此同时,由于高等教育规模过快扩张,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呈下降趋势。因此,各国一方面积极探索提高高等教育经费使用效率的途径和措施,如将综合拨款改为专项拨款;另一方面也推行了个人或家庭分担高等教育经费的政策。这几方面的因素促使政府、社会各界把对高等教育的关注重点集中到质量上,





保障和提高质量成为提高经费利用效率的主要努力方向,而家庭分担高等教育成本也要求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以保障其收益。

3. 对公共权力问责的兴起强化了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

自20世纪下半叶欧美新公共管理思潮兴起后,人们对公共权力的行使效果有了新的认识,即公共权力的行使应当具有经济性、效率性、有效性,无过错并不等于符合人们的愿望,人们对公共权力问责的意识日渐强烈。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公共财政支持的,因此,对其问责是对公共权力问责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公共经费紧缺的情况下,大学对各种资金的使用情况及使用效果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大学的利益相关者要求大学对资金使用情况及效果做出说明、解释。高等教育问责的开展要求高校向社会证明自己的教育质量水准。

二、当前世界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基本模式

1. 以美国为代表的认证模式

以美国为代表的通过认证(院校认证和专业认证)来评估高等教育质量的认证模式一般由民间的社会中介机构来实施,其设有一套认证的最低标准,只对高校的办学理念、教学、科研、服务等方面做出引导性的要求,以此判断被认证高校是否具备通过认证的最基本的条件。这一模式强调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底线,起到了质量“守门人”的作用。另外,它也是一种“目标达成”评估,它以院校根据认证标准制定的目标为根据,确定是否达到自己制定的目标,是否完成自己规定的任务,同时评估专家也会针对各校的具体情况提出改进意见与咨询建议。这一模式充分尊重高校的质量自主权,以提高质量为目标,发挥高等教育质量“推进器”的效能。

2. 以英国为代表的院校审核模式

院校审核(Institutional Audit)模式是英国首创并于近年被普遍看好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模式。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QAA)对英国高等院校展开的院校审核,是一种类似财经系统的财务审核方式,其关注点不是鉴定受审院校的学术水平本身,而是对院校保障学术水准和质量水平的机制的有效性、真实性、可靠性,以及为达到既定目标而提高自身学术水准的方法技术、维持质量的规则程序及实际应用情况进行考察和评议,进而实现质量保障目标的评估模式。

3. 以法国与丹麦为代表的政府评估模式



以法国与丹麦为代表的由政府组织实施高等院校质量评估的政府评估模式,一般在政府机构中有专门的评估组织,如作为独立行政主体直接向共和国总统汇报,不受教育部长领导的法国国家评估委员会(CNE)和对丹麦各级各类教育机构进行评估的丹麦评估研究所(EVA),评估活动经费也由政府提供支持。采用政府评估模式的原因在于,既然高等院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公共财政提供支持的一项事业,那么它就必须接受公众和政府的问责,将其自身的发展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将国家战略与社会目标结合起来,既关注自身的发展,也考虑其对科技、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

4. 以日本与荷兰为代表的自我评估模式





以日本与荷兰等为代表的自我评估模式主要以高校自身为评估主体,由高等院校内部人员通过各种评估手段和方法在校内对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各方面进行评估。其主要目的是学校通过评估,发现自身在教学、科研等方面的不足,明确改进方向,最终达到改善质量的目的。其核心理念是高等教育质量是院校自己的事情,院校有权利进行自治,更有责任进行自律。评估不仅要求院校对社会和政府说明情况,更重要的是使其对自己的长处和不足有深刻的认识和反思,这样才会不断提高水平。自我评估既是为同行专家的现场评估做准备,也是激发高等院校自我改进的动力。

三、世界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发展趋势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管理体制的差异,各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发展也各不相同。但在差异化的背后,世界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也呈现了一些共性特征和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提高评估工作的针对性与区分度是各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发展中的共同追求

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很有特色,州政府对各高等院校的办学条件有一套最低标准,据此授予各院校以办学许可;而中介机构的认证却没有绝对划一的认证标准,只是对学校的办学理念、教学、科研、服务等方面做出引导性的要求。英国采用的院校审核模式充分尊重院校的质量自主权,院校自己设定质量目标,进行质量管理,英国由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评估院校质量工作的成效。印度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别具一格,其采用的评估指标是统一的,但在具体评估中则按照院校不同类型对指标的权重进行调整,最后根据平均累计得分得出评估等级,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分类评估。据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联合会(ENQA)(2003)的调查报告显示,当前欧洲大陆最常用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方式是分专业进行认证和评估。而韩国则相反,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不管院校类型、层次、特色而均采用统一的评估基准,这种做法遭到了韩国教育界的激烈批评。

2. 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目的多重化

提高质量是评估的根本指针,同时通过公布质量信息来保障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知情权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也是评估的重要目标。美国的高等教育认证分为院校目的和公众目的。院校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高等教育质量的自我提高;公众目的则着眼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保证公共投入的有效性和公众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知情权。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则希望通过与高等教育的供给者、全体教职员工、学生、雇主等各方的共同努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在保障高等教育学术授予标准和质量水平上维护学生和广大民众的利益,并提供一个有关学术标准和质量的信息发布、交流平台,保障各方的相关权益。日本提出依据大学评价基准,通过大学定期的自我评估,保证大学教育研究活动的质量,促进大学自我改善,通过公布评估结果,让大学接受社会监督。

3. 评估的管理主体与执行主体相分离

管理主体不直接对高校开展评估,执行主体在评估人员选用、内部管理、经费收支以及评估流程安排上享有较大的自主权,但同时接受管理主体的监督与审查。在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认证体系中,联邦教育部和民间的认证委员会并不直接开展认证工作,其主要职能是对认证机构进行评估,并发挥监督、制约和协调作用;通过评估并被认可的认证机构是认证的执行主体,对高等院校开展认证工作。在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是院校审查的执行机构,在人员选用、经费收支和内部管理上都具有较大的自主权,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EFC)则以监督、审核等方式来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的评估工作进行管理。2002年,荷





兰政府成立了荷兰认证组织(NVAO)山,负责对高等教育已有专业和新设专业的认证工作。但荷兰认证组织并不直接进行认证、评估工作,而是建立基本的认证标准框架,委托其认可的、独立的评估中介机构来实施认证、评估。法国国家评估委员会、丹麦评估研究所在评估工作中,也日渐显现充分发挥专家优势的趋向。评估的管理主体与执行主体的分离,有利于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提高评估工作的专业性、科学性、客观性和公信力,在根本上保证评估工作的成效。

4. 明确高等院校的质量责任与自主权,突出高等院校在质量改进中的核心作用

2006年,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网络组织(INQAAHE)在其发布的评估守则中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及其改进的主要责任在于高等院校。这一原则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在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自1997年成立到2002年期间,主要在院校和学科两个层面开展质量保障工作。院校层面的质量保障活动称为学术质量审查,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对高等教育机构的检查,来确认各校是否具备充分、必要、有效的学术标准和质量管理程序。学科层面的质量保障活动称为教学质量评估(TQA),主要考核被评估学科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状况;但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了不少质疑,于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在2002年改变了这种直接评估院校教学质量的做法,赋予院校更大的质量自主权——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设立质量目标,开展质量保障活动。在澳大利亚,高等院校在质量保障中发挥着主体作用,各校内部一般都设有相关的委员会,来对教学中课程设置、教学过程和论文等进行评估、监控和指导,并结合学生的就业情况对教学工作进行相应调整,体现了学校在提高教学质量上的主动性和创新意识。

5. 不断加大对院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评估力度

在高等院校获得更大质量自主权后,外部评估机构开始加强对院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进行评估。2002年,英国取消了对高等院校教学质量的直接评估,取而代之实行院校审核,其核心是审核高等院校内部质量保证机制的有效性。在美国,以中北部认证协会的认证标准(2003)为例,该标准有五个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有三个构成要素:标准陈述、核心要素和证据实例。其中,证据实例是院校用来证明每一个指标核心要素的质量证据,以向认证机构证明院校内部质量工作的成效。在以自我评估为主的国家,质量评估的根本目的更是针对院校实际情况,发现实际存在的问题,评判质量工作的成效、得失与改进方向,并对外公布相关信息,接受外部机构监督与审查。

6. 重视资源的使用效率以及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成效

教育投入是高等院校各项工作开展的前提条件,传统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偏重选择教育投入指标来进行评判,如师资力量、教学设施、图书馆、教学计划、课程设置、规章和制度等,但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落脚点是教育的产出。近年来各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指标体系越来越注重学生的学习产出,如美国中北部认证协会现行认证标准(2003)的五个一级指标中,有两个指标(“学生学习和有效教学”,“知识的获取、发现与运用”)直接学生的学习有关。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在取消直接的院校教学质量评估后,公布了新的学位授予标准,该标准用近50%的篇幅阐述各级学位获得者应达到的学习成效。在院校审核过程中,同样要求院校提供办学效果、学生学习过程和成效方面的质量信息。创建于1984年的法国国家评估委员会,其宗旨也是帮助政府评价拨款产生的效益,进而增强政府对大学拨款的使用效果。

7. 围绕指标体系收集的质量信息开始注重定性描述,而不仅仅是定量统计





以美国中北部认证协会的认证标准(2003)为例;其指标体系以定性描述为主,各指标没有定量要求。而且,在认证的实施阶段,认证人员一般先与院校领导者会谈,确定需要收集的各种资料、信息以及收集方法。质量信息的收集工作,主要通过查看教师档案、学生成绩、试卷以及与院校各类人员进行访谈、座谈的方式来完成。英国的院校审核,主要从院校发布的教学质量报告、院校自述、近六年来的院校质量报告、学生代表提交的信息等方面来收集质量信息,其中对定量信息也没有统一的要求。在提交质量证据时,高等院校自主选择的空间较大,并越来越倾向于提供定性资料。

8. 评估结果全部或部分向社会公开,一些国家在向高校拨款时有限参考评估结果

评估结果的处理与使用是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工作的重要环节。一方面,在评估结果的处理上,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的审核结果都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同时设有专门网站来发布各高等院校的教学质量信息,公众可以免费上网查询。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尽管在方式、内容上有所不同,但都会有选择地发布高校的质量信息。另一方面,在评估结果的使用上,英国、韩国、澳大利亚等都会参考评估结果来进行拨款,但这类拨款一般只占拨款总额的很小比例。日本的做法比较特殊,为了集中力量建设30所国际一流大学,日本将评估结果与财政拨款挂钩,根据评估结果对排名前5%的大学进行重点投资,希望通过这一手段在较短时间内提高国内顶尖大学的教育质量。但研究者普遍认为,如果将评估结果与拨款直接挂钩,会导致高校的迎合行为,而不考虑从高校自身的实际出发来提高教学质量,这将有背质量评估的初衷。

9. 不断完善评价准则或标准,加强对评估工作的评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或保障)机构和行业协会开发了相关的评估原则、行为指导准则等元评价层面的标准,以期通过促进质量评估机构的规范化来提高评估工作本身的质量,最终达到保障教学质量的目的。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网络组织于2007年出版了修订后的《良好实践的指导原则》,即是各类外部质量评估(或保障)机构所共同遵循的准则。亚太质量网也公布了“会员资格准则”,要求所有加盟的评估机构都能遵循这一准则。美国的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HEA)本身也是元评价机构,主要对评估机构进行资质认可。荷兰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质量评估机构的协议》,对评估机构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并定期进行审查。

10. 重视开展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研究,提高评估的专业化水平

美国六大区域认证协会(NEASC、MSA、SACS、NCA、NWA、WASC)都在不间断地开展高等教育质量认证研究,对认证机构的使命、目标、机构成员、独立性、质量认证的标准与过程等内容不断进行改进和调整。丹麦于1991年组建并于次年开展工作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评估中心(后并入丹麦评估研究所),其职责是通过研究;收集和传播国内外的先进经验,探索科学有效的评估办法,对丹麦的高等院校进行评估,指导高等院校的评估和质量保障工作,促进提高教学和科研质量。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周海涛 来源:《教育研究》2008年第10期

